

王申酉文集

王申酉

- 夏夜即兴狂想 (166)
- 书信摘抄 (216)
- 给女朋友的情书 王申酉 (231)
- 附录一：王申酉被十次抄家后残留的书籍目录 (244)
- 附录二：血写的嘱托 ——王申酉和他写的《供词》金凤(248)
- 爱因斯坦的《致后人书》和他的理想 (250)
- 晴朗的天空飘来乌云 (256)
- 中国“历史将倒退至少十年” (262)
- 明灯照亮沉沉的黑夜 (270)
- 在逆境中坚持追求真理 (283)
- 一阙甜蜜、忧伤、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292)
-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供状 (307)
- 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悲剧 (315)
- 假如他今天还活着 (326)
- 反思和启迪 (330)

序一 我们的期待

钟沛璋

虽然二十年前，我已早就听说王申酉这个名字，但是在 1999 年春却我第一次谈到他的被称为“供词”的自白时，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沉痛：一位多么优秀的青年！

王申酉是穷人的孩子，父母都是工人。他曾立下誓言：“永远为佃人的翻身而努力！因为我是穷人。”他立志“为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象知识、真理、正义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他短促的一生，就是按此身体力行的。

他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他曾以 480 分的好成绩被著名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他说：“我从小用功读书，尤其进入大学后，暑来寒往，把全部精力扑在自然科学上面，收暑假又在学校过，如平日一样用功，总想多读一点，学好一点，学好本领将来多做一点贡献。”他最崇拜刻苦环境中奋斗成才的科学家。他在极艰苦的条件自学了英语、德语、日语和俄语。

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了一位自学按马克思主义世观看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不能不带着极其狂热的感叹心情回顾《资本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新起的根本性的作用。”他如饥如渴地学习。甚至在 1977 年

4月27日他被处决的前一天，还在条件极恶劣的牢房里，在恩格斯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扉页的背面用笔写下了千字读书的“内容提要”。

而最最可贵的是，在疯狂推行现代迷信，说什么他却清醒地看清这种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倒行逆使，他强烈地反对闭关自守，反对批判“利润挂帅”、批判“唯生产力论”，认为应该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的大生产，扩大社会分工，扩大与世界的交往等等。他还满怀信心中国一定会进行改革，“中国目前的不正常状态终究会改变！”王申酉的这些分析和预言，已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政策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崇文献身精神，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却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1977年，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杀害了。这是令人无法相信、无法接受的。

是王申酉进行了颠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吗？没有。王申酉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本人也一再表示强烈厌恶阴谋活动。是王申酉公开宣传了什么危险的不同政见吗？没有。他仅有的“罪行”：一是“文革”前，他在争取入团时，不肯出他个人的日记，后来被偷看告密，在“文革”中被抄走公开展览，作为反动罪证；一是“文革”后，他拒绝交出给女朋友写的申述

他世界观的信，被捕后则被勒令重写出这封信作为他的反革命“供词”。

简直使人无法相信，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竟还有以此装潢、以此野蛮的事实。这事实证明，王申酉在分析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所说的：“这样的政权必然采取特务警察统治，视人民为仇敌，最严密地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使广大人民生活最狭隘闭塞的圈子里，失去最小的思想、言论、行动自由。”由此可见，王申酉所以被认定“罪大恶极”，而必须处决，就是因为他追求思想自由，的确在王申酉的自白“供词”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罪行”：“我这一充满活动力的年青躯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

“世界上有什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人总是要认识的，无论外界采取什么最卑鄙无耻的压制也好，用虚伪的事堵塞真产事物也好，绝对也阻挡不住人的认识，真理总会被认识的！”“唉，困难啊，我们被剥夺了甚至获得充分知识的自由。”“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制，我是一头坚强为铜的雄狮。”“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象知识、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人啊，人！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我们这个星球，千万年来出现过无数生物，许多被淘汰了，许多消失了，

但是人类却留了下来。在众多的生物中，“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法〕帕斯尔卡《那天夜里，我看见了巴黎》）这也就是为什么人被称为万物之灵。有思想，才有创造，才有人类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思想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没有几千年来为此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也没有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思想家罗素说：“只有思想不受束缚的人，思想不受欲望重压的人，才可能有对美丽的憧憬。”教育的宗旨“最要紧的是教人学会自力思想，以为不以压制施之他人”，而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别人或教人学会盲从。捍卫一个人的思想自由，不仅是捍卫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捍卫人类发展的生命线，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告，共产党人要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王申酉在专政的机器下，尽管像一根苇草那样脆弱，却象一头坚强似铜的雄狮顽强地捍卫人的全部尊严——思想自由。即使是最后一条战壕——一个人的日记和给女朋友的情书，还是抗争不止，直到自己的肉体被消灭。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带着无限希望的年轻生命被消灭了。他无愧是一位思想先驱，与许多先贤一起，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解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面谈着王申酉的自白“供词”一面使我不能不想起我们民族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要思想，就没有知识，因为知识是前人

思想成果的积累。这就决定了掌握知识及的人——知识分子，在认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给社会提供精神的尺度和批判的武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杰出的哲学家断载，以这样四句话表达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千万年来，

时代有变迁，社会形态有更更迭，这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要以自己知识的创造性劳动，奉献人民、推动社会前进的情怀，在作为我们民族的良心、智慧和希望的我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中，是一脉相通的。在王申酉的自白“供词”中，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知识分子要奉献自己创造性劳动的途径是不平坦的。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总是“定于一尊”，罢黜百家，不许有不同的思想，对不同看法的人，总是实行残酷的镇压。秦代焚书坑儒。到清代，则实行更为厉害的两年。一是八股文考试来杀伐人才。满清大学士鄂尔泰奏，取士复用八股文，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这样以后，“汉族始前，帝业始因”。另一年是大兴文字狱。仅乾隆居位六十三年期间，文字狱就达一百三十五起，一年两起多。在这样的桎梏下，必然是万马齐喑，一片死沉，众多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中国不乏高智商的人才，但却乏创造性思维、理论思维。中国的四

大发明，传到西方，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中国社会却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停滞状态。这不值得深思吗？直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大炮声惊醒了“天朝”的迷梦，许多人不得不寻思祖宗之法要变一变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和以后一段时期，是中国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东西文化猛烈冲撞，百家齐争鸣，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开阔新历史时期的人才，诞生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民族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希望。很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历来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但是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生死搏斗时，没有很好顾及反封建的任务。打败了日本，接着是三年紧张的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后，虽然进行过土改，但其任务是与土地，面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和创造力的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却没有触动。在人们思想中，“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反封建的革命似乎已完成了。现在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了。于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人民，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却要把民主、自由、人道等人类文明成果，都作为资本主义的毒草，拒之门外。面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概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地要他们“脱裤子”、“洗澡”、“思想改造”，以至“知识越来越反动”，对“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批判斗争。广大知识分子，一面对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从

此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限崇敬；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出身、新受的教育，“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无不抱有原罪感。于是许多人就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不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到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更被当作“牛鬼蛇神”，一概遭到“横扫”。什么人格尊严，统统丧失殆尽。毛泽东，按林彪的说法是“四人伟大”、“一千年出一个的”世界伟人。的确，他的武功文才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但是诺大一个中国，几十年却出不了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作家，出不了能得诺贝尔等国际大奖的著作成果。与此同时，禁全国人民思想的种种封建性的糟粕，以革命的名义重重套在人们头上。从“文革”前就鼓吹充当“驯服工具”，到“文革”中“三忠于”、“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到“文革”后，还搞两个“凡是”。这种禁锢是如此沉重，尽管人们敲锣打鼓庆祝粉碎人的痛恨的“四人帮”，而“四人帮”奉行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却还依旧统治着人们的脑袋。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粉碎“四人帮”后，竟还会出现王申酉这样使人永远感到沉痛的悲剧。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深深感谢胡耀邦等政治家发动的真理大讨论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这是我们民族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试想想，如果我们还没有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吗？真理路漫漫，作为一个十五岁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老共产党员，六十年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要使人口如此众多而又贫困落后

的中国，走上福裕的、自由幸福的道路是极为艰难的。不但要搬走政治统治上的三座大山，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而且还要搬走压在自己头脑里思想僵化的大山。真理是无穷尽的，思想解放也是无穷尽的，比起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王申酉，我感到深深的羞愧，不仅是因为王申酉的悲剧发生在我也为之奋斗而建立的新中国，而且虽然我曾长期挨整，我们认识都是很慢的。因为我思想只有许多僵化、凝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愚忠的东西。说明我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王申酉作为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他用他的鲜血告诉我们，独立思考、解放思想、思想自由是何其重要。而二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文集》到今天始能出版，说明思想解放的历程还是十分艰难的。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想。”回顾过去，由于知识分子长期处于缺乏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状态，套用毛泽东关于体与毛关系的话，知识分子的毛必须依附在统治阶级、依附在权势的体上，就很难实现攀登科学高峰的任务。展望未来，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要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就须要千千万万象王申酉这样有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不为个人，而“为穷人翻身”，甘愿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申酉的热血“供词”，是为了唤起现代的青年。这也是我的期待。

1999年3月4日

序二 十年生死祭

金凤

王申酉同志，我尊敬地呼唤着你的名字。你当然是听不见的了。“同志”，这两个字，在你如囚徒般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度过那屈辱的痛苦的十年时间，仅仅一次，一位善良的中年女工曾经这样称呼你。你悚然动容，极为感动。当然，还有你的女友S. D.。她不仅把你当同志而且把她温柔、体贴的心献给你！当然，还有你年迈的双亲，他们怀着那么热烈的希望，期待着你们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将会带给他们晚年多少幸福与欢愉。不料却是漫长十年苦难的折磨，最后是那致命的一击！还有你的哥哥和弟弟，他们都是那么尊敬你、爱你。还有你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他们当然把你当作亲密的同志。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这样称呼你。此外，茫茫大地，偌大中国，你就如孤雁似地，在万里长空独自沉思和高鸣……

十年前，你不幸离开你那么热爱的国土和人间。人们为你奔走，呼号，抗议，斗争，为你恢复和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王申酉同志”这尊称，便不时挂在人们心上，挂在人们嘴里。不少人看了你的狱中《供状》，理所当然要尊称你为同志。虽然，你也许生前便知道，可能从“文革”时期便开始，社会上流行的称呼是“师傅”。不管是对谁，对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对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对一位妙龄的少女……统统称之为“师傅”。

“同志”，是五十年代的尊称。这个尊称如今好像不那么流行了。但是，你是很在乎，很重视它的。在你这样一个一直被当作所谓“反革命分子”对待的人身上，“同志”的称呼自有特殊的份量和涵意。可惜你现在是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千千万万人都这样称呼你！

王申酉同志，你惨遭枪杀，血流大地，距今整整十年了。在你牺牲三年后，一九八〇年秋天，我匆匆赶到上海，和几位同行一起收集你的事迹，写出初稿，到现在也有七年了。岁月催人，岁月逼人。你已停留在永恒的彼岸，不会再留心匆匆逝去的时间。活着的人，却要计算，要争取最宝贵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和七年？七年前，我采访的笔记，你写的《亲笔供状》，你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日记和书信都在我手边，整整放了七年。我手中如捏着一团火，这火又慢慢燃烧开去，一直烧灼着我的心。我的心真如火烧着那么疼……

你我都是唯物主义者。我自然知道，你现在再也听不到，也看不到身后的一切。你活着时，能认识你该有多好。也许，我也只能随俗地默默地同情。也许，能躲在一角和你悄悄地深谈。可惜这些都做不到了。我所能做的，是把我們知道的你写出来，介绍给你如此热爱的年青的一代。这也并不那么容易。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知道，王申酉同志，你是听不见的了。只是，你爱着的亲人，朋友和同时代人会看到和听到，这和你听到，应当也差不多。我这样安慰自己。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那传诵千古的韩愈

的《祭十二郎文》和苏东坡的《悼亡诗》，不都是流传下来，给千千万万后来人看的吗？在写的人感情上，首先是给留在记忆中的亲人和故人听的。我和你是同志，是朋友。生前虽不相识，这些年的文字交往，已使我在思想感情上居为你的朋友和同志。我禁不住要告诉你，关于你、围绕着你身后发生的事情。你活着的时是那么“卑微”，被人像草芥般任意践踏，像牲畜般随便宰割，如尘埃似地被随意忽视。你永远不会想到，也不会知道，在你身后，引起那么多喧嚣，那么多人注意。包括许多大人物，甚至有人还为你掉下忏悔之泪哩！这些，我都要一一告诉你。

那是一九八〇年秋天，人民日报两位副总编辑，给我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我赶到上海，去采写一位“张志新式”的人物。张志新，你也许不知道，哦，你肯定不知道。那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你一样，她对“横扫一切”的“文革”不满，敢于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她的命运和你一样，只是早在你之前，在“文革”中便惨遭杀害。比你幸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她的事迹公布于世，引起千万人的崇敬。现在，人们发现了你，要把你当成第二个“张志新”。我知道，逝者已矣，来者可追，采写你的事迹，至少给活着的人，留下一份血的教训和珍贵的思想遗产。我急急乘飞机飞往上海。上海几家报纸、电台和新华社分社，已组成“联合调查组”。我参加进去，大家立即开始紧张的采访。

我们赶到你当初怀着极其自豪的心情考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找了校党委书记，多次监管你的保卫工作干部，还有一些老师和

同学，初步了解一些情况。原来，你是 1963 年十七岁时，以 480 分的优异成绩（当时只考六门，满分为 600 分）考入华东师大物理系的一名青年学生，本应于 1967 年毕业。“文革”时你横遭当局迫害，竟长期留在华东师大，当了十年“待分配学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怕是罕见的独一份！

我们拜访了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和办公厅主任。你再也不会想到，你活着时也许永远不会见到这些负责同志，如今都很熟悉你的情况。他们谈了为你平反的全过程。你的姨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多次给北京写信，上海也有许多人支持。为了讨论你的平反问题，市委书记陈国栋苦笑着告诉我，市委常委竟开了十九次会！你感到惊奇吗？判你死刑，扼杀你宝贵生命时，原来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会只讨论了短短六分钟！为你平反，为你伸冤，现在的市委常委竟讨论了十九次！每次三小时吧，便有 570 小时，3420 分钟，是 6 分钟的 570 倍！古往今来，也难得看到这等奇异的事啊。王申酉同志，你能想得到吗？上海市委常委会开会十九次，说明意见分歧很大。你不被错杀，这是一致意见。但在如何评价你以及怎样为你平反，争论却很激烈。一种意见是，你是理论上有卓越成就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献身，应像宣传张志新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种意见是，你是刻苦学习、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好青年，政治上应当公开平反，但也不必大事张扬。还有一种意见是，你在政治思想上还是有“严重错误”，判死刑是重了，

却依然是个“思想犯”！你看这些分歧意见有多大。分歧意见背后，是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政治力量的较量。

我拿到了市委办公厅铅印的你的《狱中供状》和平反经过。看完你在短短六天中挥笔急书的六万字的《供状》，王申酉同志，我被你在理论上的真知灼见震慑住了。我马上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经不是“四人帮”时代，也不是“两个凡是”时代了。那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仅仅戴在一两个人头上。

按照如此荒唐的逻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怎能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我很气愤而且惊奇。像你这样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尽量收集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如此透彻地分析、批判“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方面得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基本吻合的结论。你为什么不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怀着强烈的义愤，我们要求调阅封存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你的所有原始材料。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从法院抱回一大堆。我们几个记者，在康平路一间办公室里，紧张地传阅和摘抄。你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时代写的日记就有八厚本。触目惊心的是，你竟咬破手指，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用鲜血写下立志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天真而又郑重的誓言。从稚嫩的笔迹到逐渐老练的笔迹，你的青少年时

代的生活、学习、劳动、思想、观察和痛苦、惶惑与不安……一一显现在我们面前。日记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你生前不允许他人翻阅，甚至当学院团组织要你“交出日记”便可考虑你入团作为交换条件，你也愤怒地拒绝了。“文革”初期，你的哥哥、弟弟十分担心你的日记会给你带来横祸，竭力劝你烧毁日记，你坚决不肯。多么不幸啊，这些日记，“四清”时被你同班同学的班长偷偷看了，“文革”中终于被抄走，作为“罪证”展览。你被皮鞭抽打得在满地翻滚，你被抓进监狱……现在，我们看着你这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心灵的记录，怎不感慨万端！你给你心爱的姑娘写的信有十九封，何等惊人的才华洋溢的篇章，有一封谈音乐的信竟洋洋万言。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一个攻读物理专业的大学生，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晓四门外语，竟然对音乐也如此热爱，并写出这样精辟深刻的见解！你的“思想检查”有几十万字，审讯记录有厚厚好几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卷宗……

看完这些材料，我感同身受，又愤怒又悲痛。你短促的不幸的一生，便似在我眼前闪过。我似乎看到，天真活泼的你，在给弟弟讲故事，让大家凑出钱来，去买你心爱的一本书。我看到，你一趟趟跑图书馆，夜间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你如此依恋的书。我看到，你以480分（当时满分为600分）的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大，全家和你是那样地高兴啊！我看到，你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自然科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还广泛阅读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常常饥肠辘辘，还要从少得可怜的

助学金中，挤出一两块钱给你可可怜的父亲。“教育改革”开始了，专业课程和外语教学被大量削减，每周都要花十几小时上政治课，还要下厂劳动。一心攀登科学高峰的你不理解，你惶惑不安。你参加“四清”，积极争取入团。你心爱的日记被同学偷看，政治辅导员胁迫你交出日记，才考虑你入团问题。你愤怒而又伤心地拒绝了。“文革”风暴开始不久，你便科学地预言，这是一场“灾难”，“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这是多么难得的犀利见解啊。但你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同学一起到了北京，想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却被从队伍中赶了出去。你躲在空荡荡的教室，学习第二外语——英语。灾祸从天而降，你被抄家，被打得死去活来，被关进牢房。你在牢房又学了第三门外语——德语。放出后留校监督劳动。你在“五七”干校，不准你再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专业。你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资本论》照亮了你的眼睛。你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哦，王申酉同志，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在那堆放农具的杂乱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啃着一部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你踽踽独行在南京路上，春节期间你无家可归啊。一次又一次的劳改、释放，没有消磨掉你的意志，你砥炼得更坚强了，因为你具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你愤怒，周总理的逝世使你悲痛万分。你一个人徘徊在人民广场，夜不成寐，又几次从梦中哭醒过来。天安门事件使你振奋，你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不久，一位身材颇长、面容姣美的姑娘悄然走进你的生活。她理解你，同情你，不因为

你是个“政治嫌疑犯”而歧视你，躲开你。相反，她钦佩你的学识，爱慕你的才华，崇敬你的品格。短短两个多月，你给他写了十九封热情洋溢、文笔优美的情书。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情书，有的如政论般雄辩，尽情倾吐你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有的表述你对音乐、艺术的见解。当然也有不少对姑娘爱慕的深情流露。但是，可悲而又可憎的是，万能的保卫科放不过你，居然到姑娘做工的工厂破坏你的名誉，说你是什么“政治上反动，五毒俱全”的“危险分子”。姑娘害怕了，畏缩了。你毅然退回姑娘给你的信，收回自己的信，准备抛舍那一度曾使你如此幸福而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爱情。你胸怀坦荡，不愿使姑娘与你分手时对你留下误解，你要写一封全面阐述你的世界观特别是政治观点的长信给姑娘，约定时间交给他。你正在写信，不幸赶上“伟大领袖”逝世。一直奉命在暗中监视你的工人肆无忌惮地抢去了纯属你私人的信件，作为“罪证”！你再一次被关进牢房。

我们看了关押你的牢房。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要关押十几名犯人。你在牢房仍孜孜不倦阅读随身带来的几本马列著作。你写信要求父母再给你多捎来一些马列书籍，这个完全正当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四人帮”粉碎了，你欣喜若狂，以为苦难终于到了尽头。你满心希望而且相信，能把你的学识，你的才能奉献给你心爱的祖国。你不止一次遥望铁窗外的天空……

万万没想到，在“两个凡是”指挥下的专政机器，正在无情地运转……一次次提审，你坦然回答，并在六天内写出六万字的

《供状》。我来到你书写《供状》的地方。一张三屉桌靠窗放着，窗外是两株榆树和一丛月季。如今榆树苍翠欲滴，娇艳的月季盛开。它们都是你书写《供状》的见证！可惜它们现在生机勃勃，而你却永远离开人间！

我们来到“公审”你的普陀区体育场，遥想三年前大雨如注，你被押进会场，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无情判决！你怎能想到如此致命的判决。不容你张口说话，你被立即押上“囚车”，立即开赴刑场。我们坐着吉普车，从会场赶到刑场，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钟时间。这也就是你生前走过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时间。刑场原是靶场。陪我们来的有当时执刑的刑警。他木然指了你最后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时用的手枪，还给我们看了你中弹后的照片。啊，那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哦，在法院卷宗中，还保存着你考入大学时的准考证，上面有你一张小小的照片。你五官端正，清秀的充满稚气的眼睛天真地看着我们。此刻，那张行刑的照片，只见你血肉模糊，圆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你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你养你的祖国和人间惨痛地质问：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访问法院和公安局的同志，此时他们目光呆滞，面部毫无表情。他们声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确也如此，专政机器，向来是奉命行事，哪有什么司法独立？

我们和你的哥哥、弟弟、姨夫谈了话，到医院看了你中风瘫痪的父亲，到西藏中路你家中看了至今还不知道你死刑的你可怜的母亲。那低矮的阁楼，是你的住处。我看到你十次抄家后残留的一百多本书和好几本外语辞典。你短短的一生，究竟看了多少书啊！

我们和你的女朋友谈了话。她流着泪，讲了和你相识、相爱以至痛苦地分手的经过。风雨中，她带我们到虹口公园。她讲了和你唯一的一次逛公园的情景。你们在鲁迅墓前坐了很久，你给她讲了鲁迅伟大的一生。她在你“坐牢”时偷偷到你家中去看过你母亲，求你母亲原谅她伤害了你。这能怪她吗？我想，你早就原谅了她。她奉“父母之命”又重新结婚，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她箱底至今珍藏着你的照片，她深深地苦苦地怀念着你。

我们还和在困难中帮你借书又遭到诬陷的那位善良的中年女工谈话。她文化不高，至今还牢牢记得你对她讲过的歌德的名言。

我们再次仔细地翻阅法院卷宗，又看了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讨论五十多个判决死刑案件的记录。真是杀气腾腾，平均六分钟讨论一个案子，不住的“杀”、“杀”、“杀”！粉碎“四人帮”时，全国一片欢腾。我们高兴得真是太早了。我们怎能想到，半年之后，中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我在华东师大采访，下雨路滑，摔了一跤。刚从医院包扎出来，又被一辆自行车撞翻在地，扭伤了腰。一起采访的同行好心

劝我回北京治疗。我咬咬牙，挺住了。我们一起商量了提纲，分头写了草稿。

回到北京，我拜访了当时原定“死缓”而后来却被他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原上海市法院院长。他的脸色很难看，看来心情沉重。他把他的“检讨”给我看了，还流了泪。他承认，由于他的“私心杂念”，害怕被看作“右倾”，把对你的判决“升级”了！公平一点讲，不能全怪他。我查了会议记录，在会上“升级”的有十几个。即使他不报，你也可能在会上讨论时“升级”。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几个人一句话，便能打开“地狱之门”。法制、良心、良知统统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政治态度和立场的坚定”！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初稿，打了小样，送给中央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他对我客客气气地说：“大作拜读了，写得有感情。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

一声“哈哈”，我写的文章和你一样，也被判了“死刑”！

在我一生中，因各种各样原因，稿子被“枪毙”的不少。但听到这样的回答，还是第一次。“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在当代便永无出头之日了吗？

我如此详尽地告诉你这些采访、写作以及稿子的命运，你当然是听不见的了。你泉下有知，也许只会紧皱双眉，默默无言。你早已习惯于这些冷淡的待遇和屈辱的打击！然而，那是“文革”时期和七十年代啊。如今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我忘不了你要将你

的一生写出来奉献给后来人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在你生前连同你一起被残酷地枪杀了！我有责任实现你血写的嘱托。

过了四年，一九八四年盛夏，我又把稿子改写一遍。我实在放不下它！北京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拿走了，表示愿意出版。不幸，这家出版社刚创刊的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杂志夭折，出版社负责人作检查。他再也不敢冒风险了。我知道他十分为难，主动把稿子要回来。

稿子，你的《供状》、日记和书信摘抄，又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一躺又是三年。我真的如捏着一团火，愤懑而又不安。偌大中国，难道竟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发表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篇章？难道真的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王申酉同志啊，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你。

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不是中世纪的中国。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愿意出版这本充满荆棘的小书，而且慨然应允，同时发表你的《供状》和日记、书信摘抄。我松了一口气。血的教训是惨痛的。你为什么惨遭枪杀在1977年？采访中，写作中，我一再苦苦思索。中国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长达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是少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没有深入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匆匆忙忙进入社会主义，批判、斗争的锋芒总是对准从来没有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意识反而在一种“革命”的外衣下泛滥起来。尊崇皇权”是封建意识的重要部分。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和

“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封建皇权”的变形。“文革”中有所谓“恶毒攻击”罪。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阴影笼罩着中国，连同那个“恶毒攻击”罪也照样流行。凡是所谓“恶毒攻击”，就要“狠狠打击，直到杀头，决不手软”！王申酉同志，你死于封建余毒之手，死于“两个凡是”的利剑下！

现在，你的《供状》和日记、书信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任何一个不带偏见、有正常头脑的人看了你所写的，了解你的想法，怎样也不能得出你“有罪”的结论。相反，会钦佩你的学识，欣赏你的才华，同情你的遭遇，痛恨和诅咒那扼杀了你年轻生命的封建主义流毒！

今天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毫不留情地肃清一切封建主义和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这才能杜绝像你遭到的那种悲剧的重演。

历史上有不少科学先驱，为维护科学的真理而献身。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活活烧死了布鲁诺，因为他坚持和维护哥白尼的地动说，打破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科学的真理即使遭到火焚、枪杀和种种酷刑，依然禁止不了它的传播。王申酉同志，你年轻有为的生命过早地被消灭了，但你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剖析中国社会而产生的许多想法，今天已成为中国的现实。这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编者按：王申酉 1976 年 9 月 9 日被捕，关进拘留所。这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

供词

王申酉

1976 年 11 月 18 日

我在 1976 年 9 月 7 日到 9 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

〈提纲〉

① 开场白

②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

③ 对 1949 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

④ 对苏联历史的看法

⑤ 对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

⑥ 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⑦ 对双方(我与对方)关系的看法

⑧ 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实际写出时，顺序是有颠倒，标题是有改变的)。

〈注〉在原文中，第⑤点是用攻击性字眼指向毛主席的。另外第⑦和第⑧点没有来得及写。以下是原信的回忆。(S. D 是对方名字的拼音缩写)

一、 开场白

我们结识以来二个多月了，虽然时间不长，但会面谈话的次数并不少。然而，毕竟二个月与一个人的一生相比是短暂的，因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双方也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本来，我就想透彻地向你谈谈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但双方刚接触不久，恋爱有它固有的规律，不便于一开始谈严肃的世界观问题。后来起了一些波折，也不想多谈了，但不久前问题复杂化了，闹到双方单位里去了，这使你对我的一切产生了疑问。在我看来，既然我们的一生都曾一起翻过共同的生活之页，如果给对方留下疑问就未免遗憾。到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想，不论今后我们双方关系的前途如何，都应该向你坦率地谈谈自己的世界观，谈谈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看法。

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的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的认识与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70年正式阅读马列著作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著作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总当作工具一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过它是一门科学。我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些著作中摘引他所需要的部分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服务，象万用的灵丹妙方一样，但同时又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在1970年11月去大丰我校的干校以后，我被剥夺钻研自然科学的机会时，才开始真正阅读和钻研马列著

作，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过去我也曾思考社会现象，但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陷入矛盾和混乱，最后在政治上受到制裁，所得的教训是从(此)不再去考虑政治问题。这种消极态度仍没有解决问题。只有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才能较深地看清一些问题。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说的，它包括三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分别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并结合亲身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而创造的。由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积累的全部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亲身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能创立出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十分精辟地概括阐述了马克思一生给人类思想宝库所带来的二点最辉煌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

由于我后面所述及问题的性质，因而我在这不准备全面谈论这些理论，只想着重谈论二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许多人在口头上谈论马克思主义，但认真问问他究竟什

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恐怕不少人只会扯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词句，一百个人中没几个能真正答出这个问题。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核心。人类几千年来总是用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人类的历史，总是把历史的推进原因归结到个别人的意识活动、特殊的超人智慧。例如，当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统一了全国时，他的大臣李斯提出用郡县制来代替分封制来治理国家，从而使中国二千多年来基本上维持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几次短暂的分裂时期外，没有分崩离析，社会在长期的稳定之中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什么李斯的想法不产生在以前的商朝、周朝，而只产生在秦朝，并获得了成功呢？是李斯个人的超人智慧吗？又如在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的末年，出了个康有为联系一千多个上京赶考的书生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维新，并且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居然搞了百日维新。为什么康有为的思想不早出几百年，从而使中国由封建社会早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呢？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百把个皇帝没想过要来什么资本主义的变革，直到光绪皇帝才想起搞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呢？在中国历史的这二个发展的关节点，是秦始皇、李斯或光绪皇帝、康有为头脑里的意识活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吗？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推动人们去思考。而在马克思以前，人类只能把历史归结于帝王将相、英雄超人的心理活动。直

到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才对这些问题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人类在研究历史发展时，曾经好久以来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直到马克思才发现：人类在从事任何其他活动以前，首先需要吃、喝、住、行，也就是需要必要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下来，再从事其他活动。人类必须谋取生活资料，即需要参加生产活动。因此人类的物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但人类有史以来就是社会性的动物，只能结合成团体参加生产活动，人类在这种团体中参加生产、交换和分配产品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总和就是生产关系。在人类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构成了这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每个人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他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了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存在阶级的生产关系中就决定了这个人的阶级地位与立场。马克思就这样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个别人的意识与他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另外，某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形成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这个社会的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道德的、宗教的、文化艺术的等等观点——总之一切包括在上层建筑范畴内物质和精神的東西——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产关系状况中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马克思就

这样第一次为人类透彻地解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而它本来曾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中被完全忽视过去，或最多作为文化史的从属活动一笔带过。

这里还要强调和说明二点。首先是：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矛盾组成的。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人类为了更好地谋取物质生活资料，在生产活动中第一个自然的动机是提高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状况的发展就自觉不自觉地促使人类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人类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结蒂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生产力状况。因而生产力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几对矛盾中，经济基础、生产力、社会存在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后面三方面会起主导作用。关于这些矛盾的辩证关系，马列著作中有详尽的说明，这里不多说了。

用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就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人类在脱离了动物状态后，曾经经历了好久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群居在原始公社之中，没有阶级，全都是平等的，没有剥削与压迫，这就是当时生产关系的状况。这种生产关系并不是当时人类的意识活动所决定的，而是由当时

生产力的极其低下的状态决定的。当时的人类为着抵抗猛兽或自然灾害，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而获得的生活资料极端少量，刚刚能维持个人的生存，不会有多余的生活资料供别人剥削。在各公社之间为了生存发生战斗时，胜利者只能把俘虏吃掉或杀掉，而无法把其作为剥夺剩余产品的对象。生产力的标志往往用典型的生产工具来代表。当时生产力状况可用石器时代作标志。后来，人类在实践生产活动中，学会了炼制金属，如青铜、铁器。利用这些金属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样，人类就可生产出比维持个人生存更多的生活资料。结果就为人类的剥削现象创造了物质条件。原始公社的首长开始从平等的地位上升到主宰的地位，把其他成员看作剥削的对象。战俘也不杀害了，而是强迫他们进行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人类历史由原始公社时期进入奴隶社会，这是因为经济基础首先发生了变化。接着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压迫的工具——军队等政治和法律设施，并伴随着这些形成了相适应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像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所孜孜向往的《周礼》，都典型的代表了这类观点。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自然力、各种生产工具，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奴隶是单纯的生产工具，没有个人的经济活动，像动物一样戴着锁链劳动，没有丝毫的人生自由，只能用粗笨的工具

劳动，结果没有提高生产力的兴趣，也没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被剥夺。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血腥压迫和剥削，造成了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们一次次发动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奴隶主的统治。结果，在释放奴隶、逃亡奴隶、自由民中逐步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奴隶社会在两个阶级反复搏斗的废墟上兴起了地主阶级与农奴阶级。

统治阶级发现，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照旧剥削和统治，不能对抗日益强大的奴隶们的反抗。他们发现，给奴隶以一定的自由，在自身掌握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前提下，允许奴隶占有一点少量的生产工具，并保有独立的家庭及小家庭经济，采取劳役(后来，实物和货币)地租之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的剩余产品要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并且能更引起奴隶的生产兴趣，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剥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样，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应运而走入人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用手推磨标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而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可以说是建立在这种生产力的状况之上。

封建地主阶级借助暴力镇压的工具，通过地租形式无偿地剥削农奴，但农奴已开始了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经营权利，这种经济只限于家庭范围，这样决定了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封建家长制的形式。农奴吃、喝、住、行都束缚在土地上、来源于土地上，不与或很少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活动。他们贡献给

地主的，起先是劳役地租(即到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上服无偿的劳役)或后来的实物地租，地主将剥削来的产品一般是自己享用，不去交换。因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尤其是早期的农奴是由法律规定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的。

伴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逐步相适应地形成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在他的大臣之中爆发了一场关于建立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大辩论。李斯根据历史的严重教训，力排众议，提出了郡县制的优点，分析了分封制的祸害，为秦始皇所赞成并实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郡县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巨大的进步作用。既然当时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全国各地、各市郡、各村镇都在经济上大致保持自给自足的状态，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统一的商品市场，货币经济还占很微弱的地位。经济状态决定了政治状态，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没有一个仿佛是脱离社会，高踞于社会之上的统一行政权力，势必造成各地封建割据。分封制就为这种封建割据创造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利条件，它为国家的分崩离析、诸侯混战和人民在战乱中大规模丧失生产力创造条件。相反，采用郡县制，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随时可以撤换、调动，俸薪由中央供给，行政办法由中央法律统一规定，官吏向中央负责……这样一种法制是唯一适用中国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的，也就是

说，这种上层建筑唯一地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秦始皇或李斯的头脑有超人的智力，而是当时的经济基础要求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秦始皇、李斯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对法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经济的状态作过一长段精采的描写。他谈到当时法国的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各个农民村社彼此孤立存在着，一个连着一个，千百年来没有变化，数量上的众多并没有形成质的变化，像一袋马铃薯一样，一个马铃薯碰着另一个马铃薯，彼此没有物质交换，没有经济上的来往，更没有政治上的来往。他们千百年来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参加历史的活动。他们按经济特征形成了农民阶级，但从参加历史发展活动的力量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形成一个起独立作用的阶级。他们只能让另一个独立于他们之上、高踞于社会之上的行政力量来代表他们。这样的经济状态就成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这段话大致可用在我国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状态之上。但这种封建家长制的小农经济并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唯一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在好多地方提到过另一种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这就是农村公社制，它存在于欧洲的马尔克、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村社之中。在这类村社中，并不是个别的家庭占有或租取土地，而是整个村社集体地共同地占有土

地，每个家庭另有少量的份地生产一小部分归自己所有的产品。村社居民集体地进行生产活动，进行分配和消费，没有或很少有与外界的交流。在这种村社中不一定有人格化的地主。尽管这样，但这种经济形成依旧归属于封建的经济形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经济形态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仍是封建家长制，农民仍束缚在土地上，并且通过赋税等形式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或国王、或者他们的代表——交纳剩余产品。这种村社同样成为从印度到斯拉夫等地方的东方封建专制统治千百年的顽固基础。甚至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它比小农经济更具有深刻的保守性、顽固性，更能使历史的发展停滞不前。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及其反动性。

但是，封建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一环。由于其内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这种社会最后还是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了。而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归根结蒂是由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所造成的。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大分工，尤其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必然造成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发展。人们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经营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己占有产品，自己进行交换。逐步从中世纪的初期城市中产生了城关市民，采取封建的或行会的手工业经营方式。由于市场的扩大，对自然力

的进一步利用，手工业作坊的分工更细，逐步为工场手工业所代表。这样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伴的二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十五世纪以来，美洲的发现，印度和中国等殖民市场的开辟，世界交通的发展，都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贵金属的大量发现和流通为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真正高度发展推动了机器的大规模发现和应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的解体，农奴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从狭窄、保守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失去一切生产资料、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同时，商品经济和货币也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封建村社之中，使之瓦解，迫使它也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经营。所有这些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二个必要前提：资本的积累和雇佣劳动者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封建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各地各省的关税壁垒钳制着商品的自由流通。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再不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资产阶

级逐步在许多国家中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建立了维护资本统治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斩断了束缚人们的一切封建羁绊，用公开的、直接的剥削代替奴隶社会中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在不断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消灭过时的民族工业，使生产、交换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在资本主义民族的强大的炮舰或低廉的商品的进攻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和精神的生产都成了全人类的公共财产，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日益破产，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高度发展，把一切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一起参加全人类的历史活动。它迫使一切最落后、愚昧的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不想被历史所淘汰的话。

资产阶级借助普选制、议会及共和制及地方自治制来进行统治，它不需要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建立，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形成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纽带，在生产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化的情况下足够使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了。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

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的发展。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自由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发展起来的，从它一开始产生以来就孕育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周期的生产危机。尤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固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导致愈来愈严重的生产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这样，生产关系不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就发生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剥夺资产者的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与生产的社会化适应起来，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

以上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看法及用它概括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顺便就可解释前面谈到过的那样一个历史事件。即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的问题。下面谈谈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

全人类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思想家，提出过关于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归全民所有的。人类过着平等、幸福的生活。比较早期和比较典型的如十六世纪托·莫尔的《乌托邦》，十七世纪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应该是怎样的，而在于通过何种目的和手段达到社会主义。

在人类思想史上，首先出现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的代表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与法国的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时期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蓬勃掀起并同时伴随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祸害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的经济危机、资本的高度集中与积累及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等等都使这些对人类幸福抱热心肠的先生们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幻想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既能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能避免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症候，使无产阶级免除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他们幻想不要有资本家。他们构思出一个个社会改革方案，并不惜化费巨资去实行它，或者向社会上一切阶级呼吁来实行它。他们建立移民区、成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但是这种头脑中构思出来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并在实践中失败。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态、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这种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学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和特有的任何政治活动，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须具有的物质条件，而只把无产阶级看成受苦最深，需要别人来解救他们的被动力量。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

空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启发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他们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等。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类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来越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理论根据。尤其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往往从保守的农民阶级立场抨击资本主义，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按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及生产方式，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样，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只起了反动的作用。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了高度发展，并向人类展现出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固有矛盾的运动形态，由马克思对这种生产方式作了全面的、历史的科学考察，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以后，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

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的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要使社会主义实现，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

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样，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计划、方案永远失去了任何理论与实践价值。马克思在他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本论》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只要透彻地对社会各种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过程作周密的科学考察，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依次发生的经济形态都是属于历史性的范畴，并且不能跳过或超越某种经济形态发展阶段。人类在掌握了某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规律后，虽然不能超越它，但能缩短它，减少它的阵痛，向高一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象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认为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尽它的历史作用之前彻底抛弃它，可以在它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之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要作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

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临逝世那年，在为马克思 19 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作的导言中指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尽作用以前不会发生变革，从而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竖立的上层建筑也不会崩溃。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对历史还有进步作用。恩格斯谆谆劝导无产阶级不要忙于准备夺取政权，而应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普选制等条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为未来的最后快战准备条件。这是他们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结论。1848 年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显示自己的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为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已有足够力量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在报刊上热烈地宣传鼓动革命，恩格斯则拿起枪杆，亲身参加了武装斗争。但 184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普遍失败，工人阶级也普遍遭到镇压。马克思被驱逐出德国，后来又从法国被驱逐到别的国家。恩格斯被通缉，逃亡到瑞士。后来在 1893 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作序言时，回顾 1848 年革命时指出：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阶级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

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

以上我概略地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由于我学习的非常浮浅，还只懂得一点皮毛，又由于自己生活条件与世界观的限制，很可能理解得有不少错误，甚至歪曲了原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内心深处坚信它的正确性，并竭力追求以它为武器考察一切社会问题。我上面写的，由于太匆促，来不及翻阅经典著作原文，只是按我个人的理解来叙述这些理论，更容易导致错误。所幸只是对你个人交换意见，不是拿去给任何别人看，出丑。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也能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如果你准备开始学习，我建议你从学习这样一些著作着手：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发展》，这两本书最清楚又最通俗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不至被我上述的一切议论造成对所述问题的歪曲的理解，建议你可阅读以下一些书：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哲学的贫困》及《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1848—1849 法兰西阶级斗争》及恩格斯

的导言；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二章也值得一看。

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了初步了解，阅读了一些较浅近的书，那就应该狠下决心啃一下《资本论》。我不能不带着极其狂热的感叹心情回顾《资本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这部著作的划时代功绩，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述的，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化了毕生的精力，四十多年顽强的脑力劳动，参阅了一千四百多本书籍及大量报刊杂志完成了这部巨著。主要是考察了当时为止人类社会所发展到的最复杂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历史条件、发展的变化过程、固有的矛盾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展开，并预示了它的历史发展趋向、其必然灭亡而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的结局。

这部副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并不限于上述任务。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完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

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归功于他的研究。《资本论》也同样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经济形态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那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更比较容易了解了。学习了《资本论》，绝不等于说就掌握了考察和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灵丹妙药，可以不费力气地搬用其中的辞句说明一切了。归根结蒂它只提供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观点和立场。为了研究和考察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都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按照《资本论》中所指明的方法、观点和立场，收集大量的现实生动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才能有点用处。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曾精辟地强调收集大量现实的客观经济材料对考察有关的经济形态的重要性。这里作个比方。当我们检查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时，当然不是按外表的形象或他个人的粗浅自我感觉为基础。作为一个负责的医生，他应该检查对象的脉搏、血压、心电图象、血液成份及身体中各个器官和各部分组织的客观真实资料，他在正确的医药理论指导下收集必要的材料，再把这些材料按这种正确理论作指导进行分析、考察，最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样，我们在考察任何一种经济形态时，也不能按这种社会形态的外表形象或它自称如何如何得出结论，也只能按照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考察这种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产品的交换与分配方式，考察它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历史根源和发展趋

向；在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经济基础作了首先的、全面的详尽考察后，再进一步考察矗立在这个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状况，这包括一切法律和政治设施，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精神活动；最后再考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经过这样全面考察后，才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这种社会形态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在这样的考察过程中，《资本论》提供的观点和方法是唯一科学的理论。

接下去，就是我头脑里这好几年来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主观上希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针，对一些社会问题作的极浮浅的考察。由于我实在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得太浮浅，加上主客观条件的严格限制，无法获得许多最起码的现实客观经济资料，因此考察得是十分浅薄、粗糙的，很可能有大量错误。

三、对苏联历史的看法

这里以及以下所谈到的“历史”，当然不是真的谈论什么历史，只是为了方便起见用这种标题。归根结蒂，这封信主要是环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二个论题结合社会实际考察以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其建立的必要历史前提与物质条件是什么。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流派之中，产生了各种争论，在各国的整个社会主

义学说发展过程中，都大致集中在两大派，即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在俄国十九世纪末，发生了以民粹派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场大辩论。辩论焦点集中在俄国的封建村社的历史命运上。民粹派认为，这种作为封建专制的沙皇政权的社会基础的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因为它形式上公共占有土地，形式上没有剥削压迫。他们徒然地指望这些封建村社能避免西方类似社会组织分化瓦解的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此来防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症候。但是，以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写了许多著作，对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粉碎性的打击。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俄国的村社制度的经济本质作了深入的剖析，应用了大量的客观经济资料、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这种村社制度绝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在商品经济、货币制度的侵蚀下显著地瓦解着，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侵入其中，村社的社员在不断地挣脱土地的束缚，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列宁指出，所有这些历史现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这种村社分化瓦解速度愈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占统治地位，村社社员愈快地脱离土地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造成后备力量，那就愈能加快历史前进的步伐，为革命创造更坚固的社会物质条件。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

的英明预见。民粹派的理论随同其实践一起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在此以前，有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写信给马克思，讨教过关于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82 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与恩格斯会面时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当时西方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而，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与后来列宁在 20 世纪初流放期间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一致的。

后来，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环节——俄国——首先获得

胜利，并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并在1917年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分析这次革命的成功，是在于沙皇专制政权在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后来的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软弱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有力。但具体分析俄国革命前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发挥尽其历史作用。整个俄国农村，还是一个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据很次要的地位，在城市中，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了统治地位，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程度还没有达到象西方各国那样的高度。

列宁在革命后不久就宣布把土地收归国有，大银行、大工厂、大企业也都收归国有，驱逐资本家。而且更进一步采取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在农村中实行余粮征集制，在全国建立居民消费合作社，搞按需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事实上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制度，取消价值规律的作用。显然，按照当时俄国经济的历史条件，这些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采取得还为时过早。既然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下，小生产经营、小商品经济还形成一个汪洋大海，任何生产关系、交换和分配方式的过早变革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这些法令、措施没有获得成功，伴随当时的严重内战，全国经济处于困难的状况，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紧张，苏维埃政权也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样的紧急历史关头，列宁作为一个目光深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视而不见，不久就看出了上述危险，立即改变了这些政策。在农村，将余粮征集制改变为粮食税制，取消了居民消费合作社，恢复了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允许城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种限度内得以发展。这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向资本主义作暂时的退让，以恢复经济，发展国营经济，积聚力量以便向资本主义作进攻。以后，这项新经济政策果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巩固。

虽然如此，无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来的赫、勃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少是其变化的形态从来也没有在苏联绝迹过，仍起着其应有的历史作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在苏联，城市的小商品经济、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的宅旁园地的经营，基本上仍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整个苏联经济是通过货币来展开其运动的。也就是说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资产阶级法权还在城乡起一定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上，资产阶级法权则起着特别显著的作用。斯大林对生产效率高的工人采取高额奖金制度，至于对党内外专家，更采取高薪制度。到了赫、勃时代，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里更占据了充分的统治地位，许多类似谢基诺试验、利别尔曼原则一类的经济改革归根结蒂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反映。斯大林在 50 年代初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要让价值规律在社会

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中让它发生作用，防止它的破坏性作用。价值规律归根结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规律，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着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既然它能被允许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起作用，那么只能意味着在苏联经济形态中有着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深深痕迹。严格地说，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苏联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发展到失去其一切历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起其历史作用。这极好不过地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发挥尽其历史作用以前，决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回避或否认这种历史事实，而是细心地考察分析这种生产方式所起作用的范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

四、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前历史的看法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情况，这里没有必要多谈。我只想着重谈谈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过渡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在明朝末年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城市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农村里货币地租的发展都为此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空前巨大的惰性作用，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强

固，极严重地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到了腐朽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完全成了生产力的严重桎梏。英帝国主义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用大炮轰开了封建闭关的中华帝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品的输入，加快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二千多年来第一次质的变化。尽管帝国主义列强的目标是变中国为殖民地，但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严重关节点，不同的阶级带着不同的政治脸谱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进行了表演。这里可以举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个历史人物作代表。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但这种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内部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农民起义只能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不可能把封建社会引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帝国主义国家用炮舰和低廉的商品侵入中国，这种商品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市以小商品经济经营的手工业解体、破产，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大批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来自宗法经济和小手工业的没落阶级要求原封不动的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他们对于

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原来的过时经济形态中的地位，免于灭亡，所以他们是不革命的，因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又没有成为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地位是旧社会最下层的消极的腐化的部分。相反，在中国土地上，在汪洋大海中萌发出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因素，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它要求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满清王朝为了保存封建的统治形式，尽量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统制了对外贸易，并把对外贸易的统治机关设在远离首都的广州。诚如马克思指出的，用这种办法来尽量减少外来影响。也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在两广地区更为严重，在过时经济形态的解体中出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多，所遭受的苦难也更严重，这就为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形成了历史条件。

太平天国运动既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所提出的口号必然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口号。他们提倡平等，均贫富，提出《天朝地亩制度》，其内容本质是提倡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可以想象，即使这次运动能够成功，洪秀全也最后会心安理得地坐上封建皇帝的宝座，所建立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就象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谈

到的，斯巴达克斯尽管是奴隶社会中发动奴隶起义的伟大领袖，但毕竟因为他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即使他能成功地推翻整个罗马奴隶主统治集团，他最后必然会心安理得地坐上奴隶主皇帝的宝座，加强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事实上，洪秀全在打下南京建立天朝、自称天王万岁以后，就开始建立一整套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法律设施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平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视着与他们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并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建议你一定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这本书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极其有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据大量关于中国的历史、经济材料，周密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上层建筑形式，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运动是中国滞固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典型，是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在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新鲜空气后发生解体的过时产物。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也许是中国漫长的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从此以后，随着中国历史条件的质的变化，农民阶级再也不可能按其纯粹的阶级本能发挥有效的历史作用，不能再在政治的舞台上作表演了。

象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类似，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开明人物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预感到不彻底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本阶级将必然

走向没落，甚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在整个蓬勃掀起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会被淘汰。他们不甘于在慢慢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的情况下走向毁灭，又想保持自己的封建特权。他们这时又看到 1861 年俄国沙皇政权推行的自上而下解放农奴的资产阶级经济变革和 1868 年日本天皇政府搞君主立宪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例子，既能维持封建特权，又能变革生产方式。于是这种资产阶级化的开明地主阶级推出康有为为代表，在 1898 年向光绪皇帝上了《万言书》，要求实行变法维新，也就是搞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变革。光绪皇帝赞成了这种意见，任用康有为等一批变革人士搞起资产阶级改革来。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封建主义经济形态还在全国占着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极为微弱。作为那种过时的封建经济关系的集中代表的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勾结窃国大盗袁世凯，疯狂地镇压了这场变革，使戊戌变法在实行一百天后惨遭失败。究其原因，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缺乏社会基础了。

但是，满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走向毁灭的历史命运，通过李鸿章在 19 世纪末搞洋务运动，以便使用新式的武器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客观上走向了它的愿望的反面，中国要变革的信念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而深入人心。慈禧太后尽管废了光绪皇帝，挫败了戊戌变法，但她不得不在 1905 年搞了一个假维新。虽然极不彻底，也发生了一些不以她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结果。一大批热血青年早就不满现状，乘机机会纷纷出国去西方国家寻求真

理。鲁迅就在这时出国。周总理，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也在本世纪留学欧洲，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的道理。孙中山、黄兴等人更早一些就去西方学习组织革命活动。毛主席没有出国，但这个时候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资产阶级经典著作，接受了新思想新道理。……可以这样说，正是这大批大批的出国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把中国向新的社会推动过去。这些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全部篇章。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丧失了其历史作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百折不挠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在西方和俄国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作用，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生产方式固有弊病，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等等毛病。因此他在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中，希望一举能完成三种革命。他提出民族主义以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提出民权主义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社会民主；提出民生主义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经济平等。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帝国主义列强是勾结满清王朝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可与民主革命、也必须与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是孙

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即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依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前二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关于孙中山(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可参阅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列宁的一篇论述中国民主革命的文章(文题我忘了)。列宁对这位同时代的革命家有很高的历史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理论主张的民粹主义性质。孙中山毕竟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没有能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科学的理论，不理解社会发展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性，指望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同时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样，他百折不挠地经历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又提出了规模极其宏大、详细的《建国方略》，把毕生精力用在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这一点上，决定了他的崇高历史地位。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特殊性，在孙中山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就开始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它比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直接办企业，故它比本国后来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年龄要大，资格要老，而且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苏联革命的成功传播到了中国，使无产阶级有比资产阶级远更先进和成熟的革命理论武器。毛主席在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后，接受了马列主义，诚如他在自传中谈到的，自1918年

夏季后，自认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7月1日，毛主席等12名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周总理、邓小平等人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它自己的政党，开始发挥独立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党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年轻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还不是一个处在没落的阶级。因而合作是成功的。许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如毛主席当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务，周总理、叶剑英等人担任了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及教官等工作。当时国民党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国内，特别是在城市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1925年孙中山过早的逝世，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所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列宁在1924年1月逝世)，蒋介石的上台，并在1927年4月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人、逮捕周总理，造成了全国的内战开始。中国共产党由城市工作为重点转入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历史是很奇怪曲折的。由于国民党是一个阶级成份很复杂的党，其中代表了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农村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农村又阻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不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

有其田”的资产阶级口号。结果农村的封建宗法经济仍保持着，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很慢。

结果，农村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由共产党来完成了，这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而且正因为各省各地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的不统一，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在各省边界的统治势力衰弱地区给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相反，从苏联回来的王明等一批人，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不懂得具体的历史条件要作具体的分析，不懂得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灵活地应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他也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样子，搞城市武装起义。他没有看到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的现实状态极不相同，因而他肯定会失败，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党才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37年起，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这场抗战中发挥了力量，建立了民族的功劳，但各自起的作用的

细节，我并不了解详细，没有发言权。这里想提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一事，这是因为彭德怀这个历史人物在以后的党内历史中又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彭德怀抗战中任八路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副总司令，他曾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百个团左右的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严重地挫败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功勋，当然也给八路军本身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这场威振中外的战斗大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受到了举世的称颂，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布嘉奖令。不论怎样，这场战斗发生在民族矛盾占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时期，是有进步性的，应为历史所肯定的。但毛主席当时却批判这次战斗，在党内发表谈话批判，提出 这场战争消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力量，在日军面前暴露了八路军的主力 and 动向，从而吸引日军把军事压力增加压在共产党身上。毛主席的想法显然是要尽量保存党的武装力量，以此用来为未来的内战作更好的准备。他没有看到彭德怀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增强实际战斗能力，从长远看并没有、反而会增强党的武装力量。关于这次历史事件过去我从未在书上读到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大揭发材料中了解了这件事，看到了毛主席的关于这件事发表的谈话，毛主席与彭德怀的矛盾的历史渊源还不止这点，但这点也许最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就开始了。内战的起因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关于在这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细节，胜败的原因，我还是让更了解的历史学家们去作分析吧，反正与我这封信所叙述的核心问题关系不大，这里不谈了。

五、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看法

当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获得全国政权时，它所面临的国家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外战与内战、政治上分崩离折、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在战争中把国家搞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毁灭破败的边缘。从经济形态分析，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 10%，其余 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宗法经济的束缚中解放成为一群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因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还十分需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道路。建国后三年（50—52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正也就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情况，诚如刘少奇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的时期。所有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都获得成功，并确实大大恢复了国民经济。镇反和肃反运

动对于肃清国民党残余破坏力量，巩固新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高、饶的党内分裂活动也没影响历史大局。

1953年开始的互助组和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资料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他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列宁也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论述。

刘少奇在1954年一个批示中曾提出当时实行合作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我很难知道，合作化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对的。总之，党内就合作化问题是发生了争论，但意见很快就统一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无

产阶级在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力量发动的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变革。毛主席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写了许多批语，具体领导了这场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被割断了城乡的资本主义联系、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被控制，在1956年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1956年中，召开了八大，全国一片欢腾，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以及其他八十多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出席了中共八大。总之，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使以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了。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实际经验的指导和物质手段帮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十多年国民经济的破坏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怅惘的情感。我正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开始懂事，对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多少有一点大致的感性认识。

1957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

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农村，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正在巩固之中，在生产上实行集体协作劳动，在分配上从按土地分红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实在说，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还采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手工劳动，而且工业还远不能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器给农村。而农民阶级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惯了，无论在生产经营上、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经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巩固起来。列宁说过，只有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巩固基础。在原始的镰刀铁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当时，应高度发展城市大工业，提供足够的农业机器，对农村实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使农村的生产力性质真正适应合作社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性质。

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

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什么都好办了。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1,800万吨，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1959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拼着这身

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林彪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什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象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1957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1960年起甚至再也无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什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

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并规定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6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总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带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

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这里就使人想起列宁了。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搞了很短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受损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来，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挽回局势，而且在好多中央的、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上向群众公开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历史学家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内战十分激烈，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是有客观的历史要求的。当时工业受到十分严重破坏，极少可能有足够的产品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了维持战争和工业生产建设，多少要强制地采取征集制获得粮食，因此历史会谅解列宁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

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1959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评价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从1963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结蒂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济恢复过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是进一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资本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功，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经济根源。

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 59 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身上，文化革命的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点了吴晗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 1966 年的二月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 1964 年秋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 5 月 25 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把火烧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在 6 月 1 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

我起初对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结蒂是两种性质不

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争论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在1965年5月7日在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体、形象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这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多半是采取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果

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是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要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但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恩格斯曾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大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人之间的大分工。

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等等。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

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极其天才地指出，人类的分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历史作用。他指出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一定会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在这时，集体力量的总和远远超过个别人单独劳动时的力量的总和。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也发生了伟大的作用；为着达到消灭人类的分工，刚好需要先实行最大规模的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各种经济形态的交替刚好标志着人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过程要直到共产主义才向相反方向变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分工是否要取消的问题，而在于取消分工的历史条件问题。我想谈谈在中国现时历史条件下，是应该取消分工的时候了吗？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导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自己的必要劳动”的说法，既然“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般也以农业消费品看作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有一个常识：中国的人口有80%是农民，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四个人养活五个人，或者说一个农业人口只能提供满足四分之一一个人的剩余产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吧，苏联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满足二个人的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人口约占

百分之十几，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 80%多，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五至六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美国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五，可以养活全国，同时又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卖主，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二十多个人的剩余产品。以上的数字并不精确，但不会有大的出入，至少对我所述及的问题足够了。

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中最基本的是农业劳动，这是其他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大批人力、物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才能大规模从事其他部门的劳动，再能进一步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如国家管理、科学与艺术等等活动。象美国那样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质生产活动)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过丝毫迹象，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进一步发展。更不要说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了。任何一个正视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到，随着更复杂更大型的生产工具、设备的出现，随着更大规模生产组织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要求人类更日益地发展着分工。甚至在非物质生产活动中，在脑力劳动中，人类的分工也在飞快地发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可以同时成为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权威。但是现在，在无线电科学这样一个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里，一个人也远不能穷尽全部知识，仅仅例如其中天线

这样一个专门题目也足够一个人耗费他毕生的精力了，甚至个别人还无法在这个专题上赶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只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著作和实际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典型。（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到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成学究书呆子，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些日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

员们一天到晚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客们作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讲内容无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后“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骗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道德教条，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蒂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斗私批修的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1968年1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似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

与此相对立的是另一条路线，这就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的形成条件。在马克思时代，认为象英、德、法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最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最充分。后来到了列宁时代，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环节最弱的地方即俄国发生并能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已发挥尽历史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俄国更不成熟的条件下，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尽历史作用，它一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有益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

现在，无论什么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承认象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生产以商品经济形式

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规定：商品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以等价进行。这样社会生产要得以进行或扩大，就必然要进行价值的经济核算，生产的成功与否要以利润为标志。在分配方面，必然要采取按劳取酬、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如果分配采取平均主义，那么意味着劳动效率低的人剥削效率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价值规律是充分起作用的，这样，使生产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各个资本家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率通过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趋向于平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利润的高低不全是由经济运动自发造成的，而还通过国家对收购、消费价格的有计划调整来趋向于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减低收入的差别，但不消灭这种差别。决不应象现时我国实行的那样（如青年工人或农场场员的收入几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志，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生产方式的不断社会化，商品市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扩大、分工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切生产部门包括农业生产都采用大机器大生产、农业人口不断地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劳动人口不断地相对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历的过程，都必然应该在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发生，而且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多地发

展。在中国怎么样呢?正视现实的人都能做出令人悲观的结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召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会做出肯定的结论。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除了采取过前面谈到过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外，还曾提出过其他一些更为教条主义者惊讶的主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发明了泰罗制，通过对工人在机器操作过程中的动作分析，建立更加严密的生产规章制度，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一方面指出这种制度加剧了资本剥削的强度，但又提出要在苏联企业中学习其科学的因素，为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率服务。另外，列宁甚至提出向帝国主义租让一些企业和矿山，借助帝国主义资本来开发国内的矿山、建立企业等。至于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搞高薪制问题，列宁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党纲讨论会议上，强调了党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时代，上述措施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其他不少扩大价值规律作用的措施。结果，一切历史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执政下，苏联的国民经济总值从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更巩固

强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固有规律从来没有停止、也将继续在苏联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正是需要这样考察的问题。

我从一开始粗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简略介绍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又介绍了中国历代经济形态的演变历史过程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相应变革的历史过程，又谈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对立派别斗争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叙述虽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是为了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来为考察现实服务。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什么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

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

六、我对毛主席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第五部分谈了不少，这里不详述了。坦白说，我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 and 理论能力来谈论对他的看法。只能说，我对他的世界观，他的改造世界的蓝图，他的一切言论（在文化革命中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从他青年时直到文革中的未公开刊行的著作）和作为的极肤浅的了解，只给我头脑中留下很浮浅的轮廓。他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求学前又参加过农业劳动，但后来在湖南省会长沙一师的求学时期学习了大量有益的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狂热地学习革命的道理，刻苦地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意志，在一师发起了组织《新民学会》这一革命团体，并投入了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斗争。他青年时发表的不少文章曾激动过我和许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他在长沙一师毕业后做一个小学的校长，但仍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去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经济中

心活动。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时，在馆长李大钊的启发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与一师时代教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她后来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1921年7月，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另外11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前结识了周总理等人，曾在上海南市区半淞园路地方送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人们也请他去，他认为国内的事够多值得研究了，故没有去。这实在是一大缺憾。在1927年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的官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转下地下，九月份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从此直到解放，基本上一直在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

由于出身与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在农村，使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经济要求，因此他能成功地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他对农民经济状态作过调查，但调查报告没有收入毛选。此文以前偶在一家旧书店读到过这份报告，也是很简单的，没有作归纳、整理、分析，故没有实际的文献价值。他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在文革中听说去过安源煤矿几次，但具体的活动情况不知道。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

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他一生只在解放后出国二次，都是苏联。1950年去订中苏友好同盟条件，1957年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

林彪的出身与人个经历是更单调狭隘。中学毕业后去黄埔军校读书，才几个月就和北洋军阀打仗，南昌起义时是个连长，以后一直在军队里混，由于党是靠武装斗争才能存在，他才能上升较快。从能阅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以外便是狂热吹捧毛泽东的文章，对除军事以外其他领域的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的。他鼓吹的唯心主义的首先教条，鼓吹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他在政治上只会搞阴谋诡计，只学政变经。1971年9月13日事件遭丧身之祸后，为全国、全世界人笑骂，我从未听人真心讲过他一句好话，他将像赵高一类人那样遗臭万年。死后被揭发，他搞过《五七一工程》政变纲领。不知他死的谜几时能够打开。刘少奇出身大地主，中学毕业后投身政治运动，曾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入党。他在安源工人中活动了较长时期，后在党内也长期担任工会工作、白区工作，与城市、与工人接触较多。

周总理出身在浙江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天津南开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后来与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成立中共旅欧支部，他曾去好几个西方国家活动，对西方了解很深，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在27年8月1日组织南昌起义。周总理其人，无论从才能、智慧、人品，还从毅力、精力来说都是举世敬仰的。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在近几年中不断扩大，在他临逝世以前，双方的矛盾无法弥合，几乎差点就完全暴露于世了。

以上几根粗线条也许对你了解党内斗争的背景略有点帮助。

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

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大部分谈。首先是谈关于目前国家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状况，再谈近二年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情况。我这儿要再次反复强调，由于我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极浮浅，很可能有错误，分析问题的方法很可能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其次，我由于所处的境遇的限制，了解情况很少，很片面，有些情况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我力求对情况的真实性多注意一些，把结论放在尽可能现实的基础上。好在只作为你个人的参考，我不需要负什么大责任。

1 关于现状的看法

①工业状况：形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据与外地来客们的反映，全国各省市的工业情况除上海等二、三个省市勉强能维持外

都处在很糟糕的状态。由于周总理明确提出“全国保上海”的口号，故全国各地采取割肉补疮的办法支摇上海，而外地许多省市持续好几年开工率很低，甚至像鞍钢、武钢等主要钢铁基地、洛阳拖拉机厂等大型企业的产值降到文化革命前的几分之一。原料、资金的缺乏、生产的无人管理、派性的存在都造成了生产衰落的原因。据周荣鑫去年一个报告中提供的情况，1974年全国企业的亏损达78亿元，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灾难啊！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干部很少敢抓生产，怕被批判是搞“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在生产管理上，与文革前的显著不同是，大批原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到由地方管、实际上没人管了。大家知道，对于采用大机器和大规模分工协作的企业，越是集中统一管理，按行业、部门和性质建立有机的物质联系，以利于最充分、最合理地相互提供原料、设备、技术、管理经验，是提高生产率的很有效措施。尤其对于中国的具体条件来说，在这些大工业、大矿山的孤岛周围，是整个在农业、手工劳动基础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公社经济。各企业一旦被割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它们代表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失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要瘫痪。

另外，各个工业的企业经济核算不再像文革前那样被重视，由于“利润挂帅”帽子的压力，再也无人敢过问利润问题，利润这根推动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积累的杠杆一旦被抛弃，生产处在无

人负责状态，岗位责任制、必要的规章制度被批为“管、卡、压”，更造成劳动纪律的松弛。至于工厂的技术改造，既然那些专家、技术员多半被带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帽子下放车间劳动，阅读、参考国外科技资料又被扣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帽子，自然也就成为很困难的事了。在分配上，基本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普通工比技术工的工资待遇高(在前二、三年中)，这种所谓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措施，很难调动青年工人的积极性。所有以上这些，你作为有多年工龄的青工，自然远比我感性体会了。

据我校一个党干部透露，连毛主席也在近年讲过，我国钢产量“十年徘徊”。1970年我国钢产量是2,100万吨，比1959年的1,800万吨，十一年内只增长了16%，而日本在这段时期内增长了三、四倍。记得总理在十几年前一次人大作报告时，提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要达到3,600万吨钢，也就是说1967年就应达到这个数字。谁应对这事负责呢？当然不是总理！

②农业状况：自从1962年农村公社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后，农村经济所有制基本上回复到公社化以前状况，尽管二十年来工业提供了很有限数量的农业机器，整个农业还是主要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劳动，机械化水平十分低。由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当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人口战后以来急剧减少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不但绝对增加，而且相对也在增加，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很少见的情况。每当农忙季节，城镇还要抽调大批人支援农业生产，还有各地党政和文教等机关的干部的农业生产都耗费了大批社会生产力。结果，中国人民只刚刚能维持住温饱。十几年前提出的《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没有如期达到，已无形中消声匿迹。1970年粮食产量是24,000万吨，据说只达到1957年的水平。报纸上一直以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作笑话，当然，苏联农业是糟糕的，但我一想到我国的农业情况，就只有苦笑。近几年苏联粮食产量在20,000(万)吨水平波动，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每人只分得300公斤，而苏联可分得800公斤。如果按每个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计算，中、苏分别为375公斤和2,400公斤。我想不出这种比“五十步笑一百步”更愚蠢的做法有什么意义。

中国经济的要命之点在农业上，解放以来，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异常缓慢，与工业相比更令人难受。解放初，工农业生产效率是一致的，即农业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与农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相当。但发展到1970年，据周总理向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供的数字(工业总产值900亿美元，农业300亿美元)看，每个农业人口的生产率竟只为工业人口生产率的1/12。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另外，国家又用行政权力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在最低不变的

水平上。而工业商品的批发价格并没有相应降低(工业生产率相对地比农业在增高)，结果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是受苦最深的阶层。

1974年秋我随同五七干校的教师们去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了半个月，我被允许参加社会调查，我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访问了大队和生产队会计，与社员们交谈，听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情况介绍，还去参观了大队办企业。通过生产队会计获得了近来十年该生产队生产和分配的详尽数字统计表，这样，我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社会机体的细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收获是很大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做客观分析，可以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从它一年的收益情况看，40%用来支付成本，50%用来作社员分配，7%左右作积累，用作扩大再生产或公积金，3%缴农业税。另外，大队和公社再收到一定的大队、公社基金。我们先看40%的支付农本，即生产性消费的部分，其中的有机肥料、种籽、机器维修、保养属于生产队的内部交换，占70%左右，只有农药、化肥等30%左右才向生产队以外交换。在50%的社员分配中，其中90%左右是通过实物形成分配的，仅10%以货币形式分配给社员，到市场上交换工业消费品。结果是，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80%发生在生产队内部，20%发生在生产队外。社员收入多年来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变化，没上升。

这是上海郊区的情况。如果考察外省，那么生产队的自然经济性质就更明显了。从生产力状态看，郊区每个生产队基本上可有一部小型拖拉机。可对队内数百来人、数百亩土地而言，这种物质技术装备还是很不够的。事实上，社员出工绝大多数是手工劳动的。到江苏省，只能大致每个大队才有一架小型手拖。至于内地省份，就更不行了。广大山区是更没法谈了。有不少社队能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器，但大工业远不能跟上需要。

在这样的经济共同体里，农民的自私心理绝没有丝毫减少，任何一个到农村呆过一点日子的人都可深切体验得到。他们渴望离开土地，对青年来说，参军是唯一的指望，复员后是决不肯下田的，非得获得县办以上企业的位置才罢休。社员们只了解本生产队的事情，对公社范围内的大新闻还略知道，对公社外的情况就极少听说了。甚至婚姻配偶也多半限于本队之内，少量在本大队内，出公社是极稀少的，因为自留地象一根最坚硬的铁链一样把社员束缚在土地上，自留地在20年内是不准动的。

关于队办企业，由于分配仍在生产队范围内，故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队办企业的发展。社办企业一般取固定工资，为公社积累资金，但它要发展也要经过道道难关。原料、市场、人力、国家的限制政策、技术装备都是这种难关之一。

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已对这种生产关系失去任何希望。

③关于科技战线状况：解放以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多半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这次文化大革命冲击更重大。许多问题这里不谈了，你阅读一下邓小平、胡耀邦去年的大量报告、谈话就可比较清晰地明了现时科技战线的概貌了。

几句典型的说法是“进口资料没人读，耗子读”，“科学院每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有个传达中指出，在70年代初，中国一年的电子元件产量是4,000万件，但同一年日本生产了12亿件。胡耀邦的一个科技汇报提纲中谈到日本一个3,000人的工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板，我国十几万人只生产了这个数量的几分之一（具体数字忘了）。1972年北京几个科技界元老联名写信给主席，呼吁中国科技队伍后继无人。七二年北大的周培源在《光明日报》著文要求加强基本知识，引起了全国多方响应，但被当资产阶级土围子打了下去。

④关于文教战线状况：与科技界类似，可阅读去年邓小平、周荣鑫的大量谈话、报告，不必详述。我在高校呆了十四年，对学校里的重大变化有亲身经验，这儿不多谈了。值得一提的是毛远新在辽宁省搞的朝阳农学院这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毛远新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就对学校发表了数篇讲话。老实说，要是没有后台支持，这种怪物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个所谓农学院，“新”就新在学生“社来社去”，回公社后仍参加社员分配。迟群对这点“新奇之处”大吹特吹是“新生事物”，他还大骂文革前17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不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在拆“社

会主义”的墙脚。他这种公开与几百万大学生为敌的态度当然是因为有后台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我校许多教师听了只是哑口无言而已。毛远新这个哈军工66届的毕业生现身说法，把自己脸上抹灰，称自己是标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听了这位主席的侄子、大学班级里党支部书记、班长、多年的三好学生到头来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敢说自己是。朝阳经验在全国大肆宣扬，很少人响应，连上海那班与他一条路子的人也只是空放几炮，没去实行。但如果以后毛主席下令强制在全国推行朝阳经验，那叫人难以想象今后中国文教界的可怖面貌。呜呼，江青搞样板戏要成名，另一个搞农学院样板要露头角，婶侄俩倒是一对活宝！

⑤关于外交外贸状况：关于外交问题，这是极大的问题，我实没发言权，无法评论这个需要大量我无法获得的材料、我对之又无感性经验的复杂问题。但对外贸的问题可瞎吹一点一般的看法。

外交关系是政治关系，归根结蒂是经济关系。我们谈这问题首要的是抓住我国与国际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经济关系又以外贸关系为重点（中国不接受外援）。如果我们把150个左右国家看为一个经济组织，我国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只能从《参考消息》提供的第二手材料得到点头绪。据1972年访华的意大利外贸部长的谈话，197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占全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0.5%，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一年的中国进出口绝对数字分别为 20 亿多一点，总和约 43 亿美元！仅仅 0.5%，多么叫人吃惊！据此和外国比较，八亿人口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竟及不上仅 400 万人口的香港！我去查了这一年的别国的数字，美国是 12%，日本 6%，苏联是 4%。可以设想，如果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啊！日本、苏联也会起明显影响。但把中国抹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能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吗？就是从世界经济范围来说，如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闭关自守的民族了，每个中国人每年只 5 美元与外国做交易，而苏联用 130 美元，美国用 500 美元，日本用 800 美元与外国做交易。因此，就一国范围而言，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远未进入世界市场，中国民族从经济上说远未显然地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以上数字有较大出入，但与所述问题关系不大）写到这里，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30 年前描绘的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与中国现时的在世界上显露出来的经济面貌多么格格不入啊：（全世界各国的工业）所加工的已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广泛的国际联系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

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化。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性的历史活动。然而 130 年后的中国现时的状态，如被上帝那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往情况是多么可怜，那么精神交往的情况就更可怜了。中国人民何时能脱离“自给自足和闭关状态”而能与全世界人民自由地“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啊？！难道中华民族有一种民族特性，永远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各民族必然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趋向相对立吗？！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趋向本来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和推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难道我国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和推动这种历史趋向吗？！是谁把我们用无形的万里长城与世隔开的？！

⑥关于国家机构的状态：1974 年初开始搞批林批孔运动，后转入搞儒法斗争的学习运动。人们被告知，学习儒法斗争史，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现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现实的意义，马天水的报告中就直截了当这样提过。毛主席在 1969 年的九大上也明确指出，选举只是个形式。从此，普选制无论在党内党外都

连形式也不搞了。地方党政军官员由中央统一任命，随时可调动或撤换，从上到下的任何一级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或撤换。宋太祖发明的地方军事长官的调动也在军区司令的调动中被采用了。结果王洪文在中南海成天读法家著作(他1974年被选定任主席接班人，一起接见过蓬皮杜等外宾)，而上海图书馆一时间出现了希奇的景象，成堆成堆的青少年捧起一叠叠线装的法家著作死啃起来。王洪文大学法家著作当然有两大目的，一是将来用此作统治国家的理论，二是把矛头对准所谓“党内最大的儒”，妄图打倒总理及总理的亲密战友们。

⑦关于三大差别的状况：我总感到我国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不在缩小。在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城乡生产效率。

先看一些措施。毛远新在沈阳提出沈阳市农副产品要领先郊区达到自给。这个口号形式上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为目的，但仔细看来，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使经济上形成大城市自给自足状态，农产品不通过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也不利于工农生产部门的进一步分工。在政治上势必造成大城市与整个国家的脱离孤立状态，为搞独立王国造成条件。因此这种口号和做法是倒退的、反动的。上海市显然也在按毛远新的做法办(目前通过郊区和蔬菜上还能勉强自给，但在粮食、肉类方面还未达到自给)，结果为造成上海搞独立王国的物质条件，

显然与总理的路线是对立的。文革(以)来,上海与各省市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激烈的紧张状态之中。

在上海这几年来还提出了一些形式革命、实质反动的口号,如王洪文提出青年工人进厂后先去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商业部门职工下工厂参加生产劳动、菜场职工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做法也很有问题。甚至在农业内部,也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等反动口号,取消分工。毛远新搞的那个朝阳经验则打着所谓减少体脑和城乡差别的幌子搞的反动措施,连上海也实质上没人听。

文革后的城乡差别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儿只要看看这个外观表面好了。全国以京、沪、杭为第一等大城市,各省会城市其次(其中也有分等),再其次是专区城市,再县城、村镇再到广大农村。居民的迁徙自由只限于从大的居民集结点向小的集结点,农民是极难脱离土地移往市镇的。这种城乡差别引至配偶选择等等的严格差别。张春桥的宪法报告公然连遮羞布也不要了,把人类自有宪法以来几乎毫无例外写入的“迁徙自由”也去掉了。

工农差别也没有减小,这是与城乡差别决定的,这一点无需多谈。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被搞得如此混乱,以至出现了上述这种怪诞的现象。我校还出了二个在上海被捧起的缩小三大差别的标兵。有个生物系的程立标毕业后分配在南昌,硬要改分配到农村去。另一个政教系毕业,啃马列主义书

籍不少的平新乔毕业留校当教师后向党委连写几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报告，要求每年长期去嘉定农村落户，参加农业劳动、参加社员分配，每年再回来几个月“参加教育革命”。我实在不能理解，他脑袋里装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与他实际的作为有多大一致之处。结果上海报上介绍了这二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标兵的“先进事迹”，当然是没有人会想起去效法的。后来官方舆论又宣传大学毕业后要到“资产阶级法权最小”的地方去的口号，我叹为奇观，因为到封建社会农村或奴隶社会的农村去，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更小了，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就最小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原理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原理是有本质差别的。前者认为：只有高度地采用大机器生产、大规模经营、高度发展人类的分工，这种分工不仅发生在生产劳动与管理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各个不同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一个物质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过程之间，而且发生在同一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装备的各个严格不同的岗位上，并且高度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这种分工的进行。通过上述分工，而且只有通过上述各种分工才能高度地发展生产力、创造大量的物质产品，最后把人类逐步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最后使人类的各种必要劳动减小到最低限度分配给一切人，使人类全都可以另外再从事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管理、科技、文化等等)，这样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后者采取相反的措施，只会导致相反的效果。当然，我这里

并不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对生产管理人员为了达到熟悉生产、改善与生产者的人与人关系等目的去参加一些必要的劳动生产。但这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口号、措施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借助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不使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由于分工而造成的差别发展成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不过在我国具体情况下，这个问题远不如分工的不足那样严重。

这里想补充一下第②个关于农业状况所述的生产队状况。那个地方只谈了生产队经济的交换和分配情况，应该再谈谈生产情况才较为完整。就以我所考察过的那个生产队情况为例子吧。

生产队在进行生产经营时，资金的运用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二部分，一般以一年作一个周期。固定资金指拖拉机、脱粒机、马达、抽水站、仓库等大型、长耗的机器或装备，大约占全部资金运用的10%左右，流动资金包括人力消耗、有机肥料、化肥、农药、种籽等等支出，约占90%，如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应提法比较，后者是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表示的，其相互的比例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从分配的角度来考察生产资金的运用，可大致分为四部分：社员分配、上缴农业税、农业成本和积累（包括上缴社和大队一级），可以大致估计分别占生产资金运用的60%，3%，30%，7%。由于积累一般作为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后

一部分比例不大)之用, 在我所考察的问题上, 可纳入农业成本来看。故简单归纳为三部分 60%, 3%, 37%。结果, 生产资金需要用 60%的比例化在人力上, 来推动整个资金的运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相应的概念是活劳动所推动的整个运用资本比例。另外, 从生产队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积累来看, 就是 3%的上缴农业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相应的概念是利润率。

我在上述考察中忽略了许多因素, 例如储备粮、各级公积金、公益金等, 但与这儿所考察的问题的结论无本质影响。另外,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生产本质是根本性质不同的。因而在生产中各种经济范畴也是不同的, 上述相比较又是为方便起见, 既然二种生产方式在形态上有某种相似之处, 价值规律在起不同程度的作用, 就可以这样比较说明一下。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分析, 资本的有机构成, 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由于大型机器、大型厂房设备、复杂的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不断增加, 这种固定资本的支出在整个资本运用中的比例就增加, 结果是用在原料等方面的资本相对减少, 即使由于生产率提高, 原料用量也增加, 但人力减少得更快, 结果流动资本在总资本中比例不断减小。至于用在人力耗费即工资, 或称活劳动所能推动的资本(或称死劳动)的量越来越大, 这是更明显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工资相比较)也迅速增加。

再来看生产队经济，与上述情况相结对照，可发现，生产资金的有机构成是一与九之比，人力耗费占资金的比例是 60%，为国家积累资金与社员分配的比例是 5% (这与剩余价值率的概念相对应)；这些数量概念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正因为前二个数字表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造成后面这个数字——即公社社员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创造积累的能力——极端低下。当然，由于国家通过提高工业品批发价和农产品收购价之间的剪刀差来取得公社社员的劳动价值，实际上述这个数字要大一些。但正如在第②点中指出的，由于国家和公社之间的交换是不多的 (约占生产队经济的 20%)，故总的来说，中国农村的公社社员为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很小的。

再加上前面流通和交换及分配情况作的考察 (货币经济仅占 20%)，可以得出结论，生产队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较时，应如何评价。

这里还附带提一下我国农村不到 10% 的国营农场经济。我在大学期间曾去郊区国营农场劳动过，后来在大丰干校或奉贤干校期间，附近都是国营农场，通过访问和休假时路上与农场场员的交谈，另外通过与亲戚、朋友中的农场工作的人的交谈，也大致有些概念。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交换的商品形式和分配的倾向形式来看与城市国营工业的形式是一样的。但生产管理上、劳动形式上与公社社员差不多。机械化程度一般比公社高，但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由于分配形式的不同，没有公社社员那样的自私心理。

但正因为分配形式与生产收益没有关系，故场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远比公社社员漠不关心。这就造成生产效率反而普遍比公社还低，我还没有听说过有 农场不是亏本经营的。当我询问青年场员的田地亩产情况时，他们往往张大眼睛反问我：“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情况已越来越能在城市工厂中同样发现。因此，可以从工厂情况的考察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归根结蒂，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要变革，这是肯定的。要让价值规律在经济中发挥其历史作用，这牵涉到在生产、交换、分配方面大量复杂的问题，例如劳动组合的规模、分工、多余劳动力的走向、与工业的交往、分配制度等等。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变革，而在于让价值规律在各个方面起作用的范围、幅度和形式以及作用的速度应该多大。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毫无发言权。这需要十分认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学习中国和外国经济历史发展的情况，研究目前国外的经验，收集大量必要的现实经济资料，通过试验、摸索，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⑧关于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一定的观念、文化、艺术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既然我国的经济基础在文革后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自然需要使文化、艺术等观念领域里的东西适应这种变化。这儿可随意举几个例子带过。象京戏《龙江颂》这出戏宣扬农村公有观念的“龙江风格”，正好是证实在现今的生产队经济活动中农民严重自私心理的辩证法衬托；电影《欢腾的小凉

河》从反面揭示了农民渴望脱离土地束缚的愿望。在大批文学作品中也可类似找到大量的例子。

与此同时，大批文革前出版的文学艺术作品、放映的电影、演出的戏剧都经批评而打入冷宫。与国际间的各种文化艺术交流被切断了。中国人民不仅在物质交往上很少参加全人类的历史活动，在精神交往上更被切断了与这种历史活动的联系，中国人民比文革前更与世界隔绝了。官方的论点是要防止国内外、帝修反意识形态的毒害与侵蚀，以免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

马克思对人类思想领域的特殊贡献在经济学领域，即使再过十个世纪，人类也会以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学界的巨匠来纪念他。但他的伟大贡献还不止如此，他也对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文化艺术有精湛的研究，特别对人类有价值的是他指出了文化艺术与经济基础的真正关系。他指出文化艺术这些人类精神领域的产品的发展变化归根结蒂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它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在观念领域的反映。反映新的经济变革的文化艺术能反过来巩固和促进经济的确立。但是反过来，当经济形态发生变革后，原来的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切东西都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应该抛弃吗？这是一个在文革中被弄得极混乱和糊涂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像国家机器，包括一切政治和法律设施、军队、警察、监狱等等东西，一旦不适应经济形态的变革，不仅应该抛弃，而

且应该打碎、砸烂。在精神领域里，如法律观点、宗教观点、道德观点等等也必须随着上述的东西的砸烂而用新的精神武器加以毁灭性的批判，以免旧制度的复辟。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方面，例如文化艺术，包括音乐、美术等等则可能成为人类永久性的精神财富，为世代代的人类所享受、欣赏。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像文学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一旦从经济基础中反映到人类的观念领域，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经济基础，产生它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随着人类经历几千年漫长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这种经济形态的越来越复杂，结果像文学艺术一类东西也相对地越来越远离经济形态而发展，按它固有的规律发展。当然它从每个历史的经济形态中吸取养料，不断地丰富自己，但它决不会像道德或法律、宗教观点那样带有特定经济形态的深深刻痕，以致往往有不少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很难判定应把它追溯到那一种经济形态的深渊中，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事实上，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可以从好几代经济形成中吸取养料。就象在数学上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数学来源于现实世界的数和形，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一旦成为独立的科学，就会相对脱离现实世界按独立的固有规律发展。

马克思曾经无数次带着狂热的赞叹心情欣赏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肯定这些作品能给世代人类带来无尽的美感和享受。例如他曾多次提到在奴隶社会里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伟大文学作品《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的不朽艺术价值，经常

背诵其中的长篇诗句作为生活中的崇高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艺术》中，列宁在《论艺术》中，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唯物史观》和《没有地址的信——论艺术》中都曾多次阐述文学艺术与经济形态之间的上述独特关系。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小说读者，对各国文学的造诣极深。他极欣赏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普希金、谢德林等诗人，极欣赏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等等世界知名作家。他向女儿劳拉表示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莎士比亚，他在50岁开始学俄语后，才六个月就能欣赏普希金的诗，常对客人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片断。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远比当时一切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好地描绘了当时法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列宁同样十分喜爱文艺。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列宁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强烈兴趣。你在我以前信中已经知道了他是多么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不朽乐曲啊！

普列汉诺夫在上述作品中曾发挥过这样的辉煌思想：根源自较高级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能够对较低级经济形态中生活的人产生影响，甚至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反过来，则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这就是说，一种高一级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必害怕根源自低一级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的破坏性影响，只有一种落后过时又十分保守的经济形态害怕发生瓦解才会固执地排斥根源自高一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普列汉诺夫曾举例作了说明。既然文革后的经济形态比文革前发展，那么文革后的文化艺术作品应更有吸

引力，相比之下文革前的文化艺术的影响力会自然消失，不必采取什么行政措施排斥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既然经济形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集团国家的经济形态高，那么即使国外的文艺作品自由流入(当然不包括反动、黄色的坏作品)，也不会使人民发生多大效果的。问题的矛盾应如何解释呢？

⑨从国际社会来看我国现状：当中国在凝固的状况下渡过这十年后，国际社会却在迅猛的发展。在国外年产量达二千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始出钢，海洋上出现了四十多万吨的巨轮，化学纤维的高速度增产已大规模代替棉花，每小时二百多公里的高速火车已经运行，各国实验室里的氢聚变试验正在向着放出比核裂变大几千倍能量的过程发展，第四代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已在广泛使用，宇宙飞船登上了月亮、火星，……总之，生产力以空前未有高速度在发展。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也以空前规模发展。从生产组合来看，联合性的大工厂、大公司、大银行等已越来越跨出国界线成为国际性的了，生产规模、销售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西欧共同市场、东欧经互会及全世界各地区性的经济联合组织越来越发展，使生产、交换、消费越来越走向统一。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已能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和欧洲销售才生产，意大利的汽车在世界各个角落奔驰，中东的石油流向全球。一个在荷兰侨居的南斯拉夫工人可以在一家用英国贷款、西德的技术和用澳大利亚矿石

炼出来的卢森堡钢铁作原料的机器厂里生产销售到非洲和东南亚的机床，领到工资后在一家西班牙人开的餐馆里喝苏联的伏特加酒和法国的牛排和面包，再通过卫星转播站看一场日本电视公司转播的中国杂技团表演的电视节目消磨掉黄昏。而我这个在世界闻名的大城市上海里的一个居民，这几年来唯一只看到过一样外国商品——巴拿马香蕉，迄今还没机会看一场国际体育比赛（这算是唯一的国际文化交往吧）。事实上我已多年没吃到浙江金华的火腿、福建的桂元和陕西的核桃及买到广东的丝织品和东北的毛皮衣服了。一个在罗马尼亚的城市居民要和在新加坡的亲戚通话，只要几分钟，但我与你定一个公园的约会要在公用电话前等一刻钟打半小时电话。当全世界居民聚集在电视屏幕前观看美国阿波罗登月舱的驾驶员踏上月球表面的实况转播时，中国大多数农民还相信月亮里有嫦娥和吴刚在生活。

我列出几个不精确的数字来反映一下中国在世界性生产和交往中的情况吧。1971年，中国8亿人生产了1,200亿美元的产品，平均每人生产150美元，1亿日本人生产3,600亿美元，每人3,600美元，2.5亿苏联人生产了6,000亿美元，每人2,400美元，2亿美国人生产了10,000亿美元，每人5,000美元。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每人生产200多美元，中国人的生产率竟低于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水平。

每个中国人仅用 1/30 即 5 美元，去与国外交换商品，每个苏联人用 1/17 即 140 美元交换；每个美国人用 1/10 即 500 美元交换，每个日本人用 1/45 即 800 美元去交换。

但即使这样贫穷，中国还要慷慨解囊，借好几亿美元贷款给印巴战争中濒于破产的巴基斯坦，以稳住处于西部印苏夹击战略地位的国家的心，甚至付出一大笔款子送给经济上远比中国强的罗马尼亚作抗灾费用，以建立抗苏的统一战线；中国还把好几亿英镑的贷款和四万名工人送到坦桑尼亚建造长途铁路以打开非洲的局面。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还使用大量原料以及要花费大量劳力的手工艺品出口到工业发达国家去换回工业成套设备，由于生产效率的悬殊，外国资本家的剥削率大得惊人，幸好中国劳工的工资十分低廉。中国为了每年二、三亿英镑的外汇收入还不提收回清朝留下的殖民统治遗迹——香港和澳门，历史会怎样看此事呢？当世界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性预言在形成更加密切、相互更加依赖的统一市场时，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且希望各国也是这样，成为一个个互相孤立封闭的经济体，甚至援助经济落后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这样。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外交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集中反映，也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和外交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因此我们看国际政治就要从国际经济关系着手，看外交政策要从对外经济政策着手。但外交有它固有的特殊规律，我十分不懂，不应乱评。

2 关于近二年来党内斗争状况

我是抱着十分灰暗的心情提这个问题的。由于消息来源很少，有些不一定确实，故只能作你参考。我当然力求从历史的渊源谈，根据尽可能可靠的事实谈。由于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的风云，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虽然没有丝毫力量去影响这场斗争的结局，只能袖手旁观，但实在因为这场斗争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

在林彪垮台以后，毛主席曾一度打算培养姚文元作接班人，但犹豫了一段时期后放弃了这个打算，原因有种种，我不能乱说。但可提一点，姚是复旦大学旁听生出身，典型的知识分子，很难设想会被选中。后来就看中了王洪文。毛主席在1967年在上海与王认识并长谈了二次，并目睹他批砸了《联司》，这成为王洪文后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起因。王农民出身，参军入党复员后在国棉17厂当人保科干事，他的农、兵、工经历成为他的一张王牌。1968年2月江青、张、姚在怀仁堂得罪了二位老师，二位副总理(陈、叶、李、谭)，王未介入，故王能上升得更快，九大成为中央委员，十大当上副主席。大概到1974年下半年的时候，毛主席选定他当接班人，一起接见了几次外宾，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但据传说出了洋相，他伸手时，外宾不理睬他。故从此又丢开了。林彪势力在1972年至1973年间从中央到外地被清洗，换上了起先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这是默默进

行的，但步骤是稳定的，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干校隐退了几年的邓小平回到了中央。

总理在 1972 年得病，这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他选定了邓小平继承遗志，这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也许是总理一生最长久最亲密的战友了，在半个世纪前的 20 年代初就相识并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当时一起的有李富春、蔡畅、蔡和森、陈毅等人。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邓小平学识渊博，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总理每次出国访问，全由邓小平任代总理，代管国事，事实上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是党的总书记，统管着全国党的组织、人事，组织能力极强。当老干部们在全国各地代替林彪势力执政后，邓小平来京是有稳固基础的。

不过，邓小平执政前就经历了一场斗争。1974 年初，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一方面固然为着肃清林彪的影响，因为林彪一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的余党江、张一伙总感到极“左”派帽子像头上的疮疤，别人一骂就痛在自己头上，故要通过这场运动把林彪搞成极右派，再把矛头引向总理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法家人物，把总理打成“儒”家。到了 1974 年年中，就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上海市委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明，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秦始皇的统治法制对他们的统治有现实意义。从孔老二到董仲舒、司马光

等一大批儒家人物被大肆诋毁。当然，宣传历史斗争纯粹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过这种舆论听众甚少，到年底就逐步沉落下去了。毛主席让邓小平出来，但斗争还是在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任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总参谋长，党政军有了权。只是八亿人还无法想象这位在文革初期横遭污蔑的人物后来竟会那么不顾个人委曲、极有魄力地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李先念副总理也明显突出，与邓副总理交替出来接待外宾。李副总理同样是总理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在总理手下当了长期的财政部长。文革初期，林彪一党操纵“五·一六”等一帮爪牙，捏造李副总理当过叛徒的谣言，罪恶滔天。我67年年中去北京时亲眼目睹长安街上炮打他的大批标语。后来总理亲自出面保护，斥责那帮家伙对别人政治生命不负责。因此，我总感到形势不错。加上叶帅任国防部长，更使人感到安心。四届人大的国务院名单上，不少都是总理的老同事、老部下，几十年来是忠实贯彻总理路线的。我作为教育界里呆了多年的人，看到周荣鑫任教育部长，特别高兴。他跟了总理二十多年，长期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上递报告、下达文件的必经渠道，是总理的心腹的心腹，由他任教育部长，教育事业是有指望的。我读过总理50年代初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使我极为感动。总理在中央一向分工管知识分子工作。因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贯彻总理的路线，能改变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局面。

1975年3、4月，张春桥、姚文元突然亲自出面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所谓“林彪一类”的概念，把极“左”派脸谱描成极右派，把矛头对准总理，攻击其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攻击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方针。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工业会议上公开唱对台戏，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并着手抓起工业问题来。这一个月，在他极有魄力的指令下，在极短时间内就打通了全国长期被阻塞、干扰的铁路交通线，保证了全国交通命脉的畅通，为恢复工业建设创造了极有利条件。

1975年6月，毛远新在辽宁炮制出所谓“朝阳经验”，与清华的迟群一吹一唱捧为全国大学教育革命样板。上海宣传机器也遥为呼应，广为宣传。但是上海闻风未动，在高校里被人们暗暗地冷嘲热讽。全国各地响应极少。

1975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中中央形势大变，起因是江青事件。30年代上海滩上末等黄色电影演员（职业是话剧演员）江青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国际上建立声誉，为日后“大业”作准备，就与一个美国记者谈了几次话，叙述个人生平历史，内容极为下流，还努力吹捧自己在文革中的特殊功绩。结果该记者写成了书在国际上发行，销路极好。主席听了后大怒，急令中国驻美联络处用外汇高价收买该书版权。并发布中央文件，对江青问题作了三点决定。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但国际间偌大一件

丑闻怎能堵尽天下耳目?这事在国内也不径而走。江青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邓小平对庄则栋、马天水等明确指示，以后一切工作不要向江青、张春桥请示了。王洪文、姚文元灰溜溜回上海活动，只想稳固老巢的阵脚。国庆节王洪文缩在上海过。

周荣鑫为了打开教育界的死气沉沉局面，授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此人文革前就是该校党委副书记)写信给主席。信由周荣鑫转邓副总理，再转给主席。主席大怒，但当时形势不利，暂时按捺了下来。

1975年9月，陈永贵副总理提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二级所有制过渡的问题的报告后，主席批示“请各路诸侯议一议”，要邓副总理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讨论该报告。邓小平召集了12个省市自治区(上海、辽宁不在其内)来京，在京西宾馆开了十几天会。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五位副总理出席，邓小平讲了三次话。会开到十月份才结束。周荣鑫受患病住院的总理委托破格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远不只讨论了陈永贵的报告，而且讨论了全面整顿全国一切工作(九大方面)的题目。12省市的领导全是老干部，全面揭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不怕“高举骨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来收拾全国“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局面。邓副总理十分清楚全国各行各业的灾难性局势，指出再不“扭”转局势，“我们大家全都得完蛋”。邓副总理还表

示要“赌咒发誓埋头踏踏实实干它20年”，还向中央表示，不迅速扭转局势，就集体辞职请罪。

9月初，全国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华国锋副总理作了长篇报告。邓副总理也作了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他两次离开了讲稿，指出这次会议的意义可以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意义相比较。这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大家知道，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人为灾难性局势向形势改善转变的关键。邓副总理明确暗示文革造成了灾难性局势。

毛主席看出了由于江青事件，形势极为不利，邓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钻进国务院搞破坏活动的张春桥丢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干部们逐步围绕团结在总理正确路线的周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自己身边则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浒》作题目，在八、九月间发出了开展评《水浒》的运动。指示发表《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社论，把矛头直接对准总理，指出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问题的焦点是：主席指责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以外”，并去受“招安”当投降派。

读过《水浒》的人谁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后从未想屏晁盖的意思（至于他受招安等事姑且不论），他一上山，晁盖就提出把首领位置让给宋江，宋江坚决不受。晁盖再三让位，宋江拼命拒绝，并表示晁盖再不收回这意见，就要下山不来了。在吴用、林冲等人一致劝导下，晁盖才收回了辞让之意。二人在梁山上相处一直

十分和睦，宋江绝无鄙视晁盖之意。后来晁盖在作战时，被地主武装的头子史文恭射死后，宋江大力为他报了仇，最后被众人推为首领的。况且，晁盖活着时，梁山好汉总共不过几十个，远未达到 108 人，故要屏也不会屏在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见主席借批林批孔、借搞儒法斗争来整总理都没成功，极不得已，只能捏造小说的故事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太计穷智尽了。

然而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奋斗、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总理，直到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国家为人民操着心，派周荣鑫部长去宾馆出席会议，不断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作指示。另外又指示七月份去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搞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委托邓力群起草《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还指示搞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件》，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理还感到我国当前教育战线上处在奄奄一息的严重局面，特别要求周荣鑫部长加紧工作。在总理指示下，周部长召开了全国性或北京市各教育系统的干部会议或座谈会，讨论面对的局势和改善的办法，准备提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请中央批发。十二省市负责人会议结束后，各地负责人分头回各省，召集大规模干部会议，传达总理指示及邓副总理的报告精神，并讨论具体贯彻执行措施。

1975 年 10 月、11 月，主席加紧评《水浒》的运动。鉴于更严重的利害关系，主席被迫赦免江青，重整旗鼓，开始反击，先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搞起。发了一个中央文件，提到主席

的批示说，刘冰的信表面上攻击迟群，实际上矛头是对准主席的。信是由周荣鑫授意写的，经周和邓小平转主席，而不是直达主席。中央文件点了周荣鑫的名。从11月起，我校发了大量周荣鑫的报告和言论，也掀起敢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10月份，在总理关怀下，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邓小平根据总理指示，强调要把文革中下放到地方的大企业收回，由中央统一管理。王洪文、张春桥等指使人唱对台戏。

1975年12月，上海加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校发下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叫大家批判。后来发下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南昌三级干部大会上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未点名，大家立即猜到是邓小平）的报告，要大家批判。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在9—10月召开的十二省市领导同志会议上作的三次报告的内容。

上海报纸上大肆宣传所谓批判“奇谈怪论”，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人报告的内容。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国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但上海报上无只字反映人民的悼念心情，人们纷纷自发组织召开悼念大会。15日召开中央的悼念大会，邓小平作悼词。人们感到茫然。不久上海街头和复旦校内出现要求张春桥任总理的标语，各单位狂势进行评《水浒》的运动，到处都是关于宋江的漫画，极度丑化宋江。我校编印了关于宋江的所谓罪行的材料让人样批

判。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当时关于江青的丑闻在广为传播，批宋江的矛头是对准总理的。

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的关于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报导，显然是迟群按主席意思搞的。此文的矛头明确指向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在文革中被整的干部。上海掀起了相应的批判势头，但全国大多数省市闻风不动。复旦、师大校园大开，接待大批单位的大规模参观活动。同时，张、姚等在上海再次加紧搜罗亲信，物色爪牙，摆出一副夺权架势，准备去北京大规模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我听得中央文件说，叶剑英因病解除了军委主持工作，心中万分难受。经证实后我在人民广场彷徨了一个黄昏，无法平静。1976年3月，中央文件传达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讲话12条。全国各地被迫搞起批邓运动。但尽管总理逝世，还是决定要打倒总理（总理过早逝世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人们相信是有疑问的。因为11、12月份就掀起搞周荣鑫、搞邓小平的黑风，仿佛知道总理即将逝世似的）。

3月5日，文汇报在纪念雷锋的报告中，删去了总理对雷锋的评语（外省市皆未删），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公然写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谁都知道指邓小平。关于前者，矛头对谁，也不言自明了。文汇报社电话铃声及访客不断，询问背景。此事引起了全国民愤。南

京街头贴出大批标语“揪出文汇报3·5和3·25事件的后台”，常州、无锡也如此，许多沪宁线上的来车用柏油刷类似的大批标语。上海各处反复刷出悼念总理的标语。

同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国务院好多副总理和部长都被攻击、批判。在复旦大学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漫画和大字报。有许多迹象表明，矛头集中在总理身上。

1976年4月，这个月的大事是震动世界的。由于南京事件闹大，月初中央发布电话通知，声称要追查南京街头大标语的背景，不许再搞张春桥。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追悼总理的群众性活动、集会。南京雨花台也召开大规模追悼大会。上海市委预作布置，关闭了烈士公墓。在首都则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详细过程不清楚。但从各种传说中看出，场面是够伟大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发集会，恐怕五四运动的场面也远不及这样伟大。北京各单位选出最优秀的群众代表前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向总理遗像鞠躬致敬，发誓继承总理遗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悼念的花圈日以继夜送来堆积成一座座山。大的直径有五米，用铝作支架。许多单位由领导亲自带队前来，全厂出动。从三月底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拥来，无数各地的来京出差人员也为这种场面所感动，积极加入。人们慷慨激昂陈词，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歌

颂他对中国人民立下的巨大功劳，数说他为中国人民安排的伟大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痛斥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无耻诽谤。同时也歌颂了邓小平作为总理的亲密战友，忠实执行总理路线的功绩。广大人民群众还抬着陈毅遗像进行哀悼，同时还追悼了杨开慧烈士，矛头直指江青。

这是一幕多么悲壮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图景啊！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 1958 年以来，除了 1962—1966 年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桥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就是说要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 20 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但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写什么传世的著作，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多次通过各种阴谋手段陷害总理，想打落他的威望，打倒总理，总不能得逞。总理洞察这一切，却逆来顺受，胸襟无比宽广，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任劳任怨，一直日以继

夜、夜以继日地、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个头脑里考虑着国际国内的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并且安排了能忠实继承自己遗志的战友作接班人。而邓小平受了总理嘱托，毅然担当了重任，挑起了国家的重担。邓小平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侮辱，大多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曲。很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萎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干，短短一年来就打开了局面，气象一新，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然而……然而当总理遗骸的灰烬散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江河里还没有冷却，就遭到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陷害、攻击，他的事业继承人就被无辜押上审判台，他的遗志也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了。中国人民在总理的灵前感到无穷无尽的悲愤、失望，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但中国人民已不再是愚昧落后的人民了。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历史背景。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在王洪文指使下，一个政治小丑马小六指挥受蒙蔽的群众镇压了这场事件。当然事情远不这样简单，让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详

述一切吧。但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的。天安门广场上流满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例如，在事件以后几天，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总理的白旗，当然，在上海悼念总理是犯法的。升白旗的人立即逮捕，抄了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被包围的广场里的人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失去了自由，死难的人一概被定为反革命。但是，人们都背地里有声有色地流传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消息。我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的柜台里面暗藏着不公开出卖总理大幅遗像像片，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每每有空就满眶热泪凝视着。你决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在1967年初得知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卷入了炮打他的运动，1973年底我第二次被审查结束时，在揭发别人的材料里加了自己的想法，把张春桥痛痛快快地彻底咒骂了一顿。预定他不会有比林彪更好下场。总以为自己早晚要离开上海，脱离他的魔爪，他要报复也抓不到我，谁知道我长期不得解决问题，一直疑心他在捣鬼，不让我毕业走掉，我深知我一生的政治命运，是不会有太平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在过几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正式把“党内最大的”这个桂冠第一次加在邓小平头上，使他的帽子成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原先根据3月25日的文汇报，是打算把这个桂冠加在总理头上的。

当然，以后批邓的恶浪越掀越高，一切舆论工具都环绕着批邓，实际上环绕着总理的路线进攻。我不想多谈这几个月的情况了，反正形势越来越叫人感到一片灰暗，前不久印发了那三个文件《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叫人们无休止地批判。这三个文件实际上全是由总理指示制定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其中凝结着总理的最后几滴心血。而上面传达称，这是主席亲自指示要全力加以批判的。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朗，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帅被解除军委领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人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无生机和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像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现状。我们只有了解了历史和现状，才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正确的估计，我想在这里描绘一下，因为这对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下去(不管双方关系发展如何)会有点客观的依据。在工业方面，由于总理提出的将全国许多大型工矿企业集中到中央统一管理的方针被指责为搞“条条专政”，今后这些工矿企业将继续隔绝起来，彼此

失去统一的有机联系，纳入到地方性区域里，这将加剧各地经济上的保守、割据形势，造成经济上的独立王国，企业也不可能管理好。既然利润作为企业活动运行的杠杆作用被取消，生产管理事实上处于混日子状态，成本核算最多只成为单纯的业务工作，不再成为刺激改善管理的手段了。今后在分配制度上将要搞平均主义，使青年工人失去劳动积极性，对生产成果漠不关心，艺徒进厂也不会努力学好技术。根据王洪文的批示，青工将轮换去农村参加一段公社集体劳动，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改造思想。商业职工也将定期去工厂参加劳动。工业分工将走向取消。规章制度越来越松弛，劳动纪律将散漫起来。

在农业方面，将越来越衰退。生产队越来越保守狭隘，成为封闭性的自然经济组织，分工进一步取消，医务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和分配，连教师也要半教半农，参加集体分配，连商业部门的农村下伸店，也逐步由农民管理，取消农商分工。甚至文艺工作者也搞“乌兰牧骑”式的花样，半农半演戏。在农业劳动内部，既然提出了“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必须会有“粮农不吃商品菜”的口号，一切类似的口号和措施都会出来，把生产队经济形态带到越来越原始、野蛮、闭塞的状态中去。婚姻只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因为自留地把人比世界上最牢固的锁链还硬地束缚在土地上，少数相隔较远的夫妻，妻子必须经常来回奔波去娘家种自留地和收获。农民的自私观念在这种经济形态里越来越严重。《列宁选集》第一卷，有一篇引述索罗金俄国村社考察报告

就描绘了这种自私心理。由于农村生产效率不会提高，会相比工业品生产效率而继续下降，工农产品剪刀差会越来越大，农民将一直成为我国最苦难的居民。

在科技文教卫生方面，也将每况愈下。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医生将继续陷于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去不得安宁，除此外还得去物质生产部门定期长期劳动，去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科研人员将不再去搞基本理论研究，教师将不教基本知识，搞什么“用典型产品组织教学”。总之，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将永远处于心有余悸的心理状态下混日子。而学生们在学校里将参加大量无益的政治活动，出校门搞大量的单纯的生产劳动，文化知识水平将越来越低。青少年中流飞习气将更加蔓延。青少年犯罪率将不断升高。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将以毛远新的朝阳经验为样板。工科以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为蓝图，结果，理科综合大学就要被取消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也将取消。大学招生将主要靠开后门，出去招生的人口袋里有一张名单，而招生地区也提出一张名单，协商解决。大学教师将成为社会上最动荡的职业，必须与学生开门办校到各处，又要当普通工人、社员，又要去干校，搞函授……

在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枯燥，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将绝迹，代之以最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粗制滥造品。文艺工作者将以“乌兰牧骑”为样板，取消专业工作者，半工半演，半农半演……，总之，文艺将失去它固的价值，成为单纯政治灌输的工具。

在国际交往方面：物质、精神交往将被切断一切渠道。最后，中国变成怎样的怪样子呢？中国将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封闭体的组合。每个大城市与它郊区组成结合体，粮食、副食品自给，不再吃商品粮。每个村镇同样割取周围一点土地搞农产品自给（1968年人民日报头版宣传过这样一个市镇的样板），而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结合体。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将减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样的经济封闭体中，分工将越来越取消，每个人要从事许多种劳动，结果什么劳动也搞不好，非物质生产性劳动将越来越取消，脑力劳动也将逐渐取消，劳动生产率将随分工的取消而降低。农业性劳动将抽取更多人才能满足需要。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居住点选择纯粹与个人要求脱离。人们按所住城市大小，生活在严格确定的社会阶梯里，农村在这个阶梯的最低一级，很难跃上一级。人们的社会交往将越来越小。既然这些组合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彼此间交往很小，故要把这样的结合体统一为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非要有一个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成，这个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使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这种统一。这种政权建设当然排斥自由选举，必须用秦始皇式的郡县制，官吏由中央任命，并能随时撤调、调换，收入来自中央。这样的政权必然要用屠杀来维持生命，如林彪在1969年4月九大上取得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地位时，这一年杀人也最厉害。（上海杀了几批人，最多一批51人。）这样的政权也必然采取特务警察统治，视人民如仇敌，最严密地监视

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最狭隘闭塞的圈子里，失去最小的思想、言论、行动自由。

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然要彻底根绝一切不适应这种封闭经济体经济基础的精神领域里的东西，无论是国外、国内的一概排斥。

这样的政权必然像 300 多年前采取锁国政策的日本德川幕府那样，或者像 100 多年前采取封建闭关政策的满清王朝那样把中国一道万里长城与世界各国隔绝起来，尽可能减少一切经济和精神上的往来，害怕外来的高级意识形态进入各封闭体后发生瓦解作用。结果，这样的国家将越来越专制、野蛮、落后、愚昧。我只是粗糙地勾画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轮廓，你也许会以为描写得太可怕了，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只要邓小平、实际上是总理的一整套世界观、路线、政策被攻击诋毁下去，而按文革中出现的一大批打着“新生事物”（实际上早在人类很久前的过时经济形态中可以找到其痕迹）幌子的口号、样板搞下去，势必至于把中国搞成这样的怪样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你相信并掌握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用它仔细考察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就必然得出类似的结论。并且会建立一种坚定的信仰，使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坚持这种信仰。确实，一想到中国未来的可怖图象，我的心情无限灰暗，常独自在广场上盲目地散步、思考，半夜醒来仍是不断思考、难过，家中人又不理解我，只有对着总理像暗暗垂泪。好几次睡梦中听到

总理逝世消息，哭醒过来，泪已湿枕。但难过有什么用，得分析一下为什么总理路线这样难以贯彻，竟这样悲惨失败。

我回想起马恩选集中《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谈到过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些先进的革命家，他们有着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当他们介入现实政治斗争时，往往陷入极大的矛盾中：现实政治斗争的利益与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对立的。如果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要损害现实斗争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现实斗争的利益，就要牺牲自己的理想。该文描绘了德国中世纪农民运动的状况。当时，农民处在封建宗法经济中，他们渴望脱离封建束缚，获得私有土地，成为一群群小私有者。一个大概名叫闵采尔的革命家加入了这场斗争，他的理想是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与当时农民战争的利益是有冲突的。闵采尔就陷入这种矛盾中，无法自拔。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在既不损害现实斗争的利益情况下坚持先进的理想。

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就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坚持这个理想奋斗了一生。但是在他刚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时，他绝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这尤其表现在他年青时任《莱茵报》编辑的时代。当时整个德国还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全国还分裂成几十个小邦，国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还处在革命的上升时期。马克思所工作的报纸，刚好是

莱茵省城科伦市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马克思是完全是以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斗争着，同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教导无产阶级懂得自己未来的阶级使命。恩格斯在 1849 年甚至亲身参加了德国的护法运动的武装斗争，为当时在德国实行资产阶级宪法而奋勇作战，但历史决不会称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1851 年 9 月 15 日，在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俞利希—沙佩尔冒险集团指责马克思右倾，不积极投入当时的无产阶级武装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对这种极“左”派的污蔑，马克思作了坚决的斗争，指出自己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做出的牺牲不会比任何人少。但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还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言论、结社、出版、集会的自由，再通过这些自由，教育训练无产阶级，以便日后与资产阶级决战取得政权。

历史表明，马克思正确地处理了远大的政治理想与当前运动利益的关系。俞利希—沙佩尔集团最后彻底失败了。历史表明，马克思才是真正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

19 世纪末，在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问题的争论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社会环境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俄国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农村村社必须要经过瓦解后来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但头上戴着“社会主义者”帽子的民粹主义者疯狂攻击列宁，说

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攻击列宁用心险恶、道德冷酷，硬要俄国村社农民从美好的田园诗般的村社中跌落到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陷阱中惨遭破产、贫穷的祸害。他们徒然地妄图制止村社的瓦解，挡住历史的车轮，在这种作为封建专制的沙皇政权的基础的村社里搞社会主义。历史已证实了列宁预见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维护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利益，同时也真正坚持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历史同样证实了俄国民粹派以极“左”派面目出现，口着上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上是真正的右派，反动派，他们力图阻止当时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车轮的前进，把社会倒退到封建制度去。当他们用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招摇时，头脑清醒的人们会看到他们臀部上的封建主义纹章，便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是否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呢？我坚信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终身为了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全心全意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同时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历史环境，深切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经济形态十分落后的国家。列宁谈到胜利后的俄国经济状况时曾说过，俄国人民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足。那么，对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资本论》，反反复复所说的无非是证明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依次发展交替，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生的历史过程，

各个经济形态不可能被超越、跳过，至多只能缩短、减少痛苦；而且只有在认识到各经济形态转化规律才能缩短、跳过。

总理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还基本上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村是一个小私有制的汪洋大海，经合作化后，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虽然经过公社化，但回到生产队核算制后，基本上仍回复到高级社规模。依据生产力状况的性质，生产关系还不能变革，而且要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适度限制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事实上也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规律起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创造物质条件。在城市地区，虽然小生产者已占很小地位，但大多数工厂企业规模狭小，整个工业生产离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还遥远得很，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而，象在农村中一样，也要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使工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在适当的限制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经历许多形式上类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演进过程，达到高度的生产集中，最细小的分工。而且要在上层建筑的帮助下，使这种演进过程尽量缩短时间、减少痛苦。周总理、邓小平正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于是，一些极“左”派跳了出来，打着“社会主义”的牌，气势汹汹地进行污蔑攻击，什么“修正主义”啊，“党内资产阶级”啊，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啊，什么“保守派”啊……不一而足。其实听其言，观其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武器剖析

他们的本质，结果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极右派，他们力图阻挡社会经济形成正常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向反方向扭转过去，拉回到旧制度去，把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硬塞进过时的经济关系的框子里去。他们吹捧秦始皇，吹捧法家。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到比对了，他们确实是法家、不折不扣的法家。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仅仅在二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才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毁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一丝一毫的进步意义了。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还丝毫没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样子，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可憎可恶了。他们攻击总理是“党内的”，这是最无耻的污蔑，只有世界上最无耻的政治无赖才会相信总理与“儒家”之间有丝毫联系，会相信总理与宋江有什么联系。他们政治品质的堕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历史看来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使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1976年11月18日至23日)

(完)

关于今年9月7日给吴××信的补充交代

△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以后就取消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各企业也不抓利润，今后生产力怎么能提高呢？中国的经济关系还很落后，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的，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规律，如价值规律等还要起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物质刺激、利润和奖金。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

列宁、斯大林在革命胜利后，面对的苏联经济形态至少比解放后的中国好些，也认识到苏联人民的困难与其说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还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足，因而在苏联经济建设中采取不少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政策。列宁就强调要在工人中实行奖金制度、物质鼓励制度，工作任务完成得出色的工人颁发可以领取特别物质鼓励的证明书，斯大林搞了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更把物质刺激制度推向了高一步，结果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对专家、教授搞高薪制度，就不必提了。列宁曾提出，先进社会制度要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归根结蒂是因为前者的生产率比后者高。表现在形式上，衡量企业生产率高低的标志是利润高低。因此，列宁、斯大林是非常重视利

润问题的。只有利润的迅速增长，才能迅速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前二年人民日报上介绍了辽宁省沈阳市的报导，说沈阳正在努力发展郊区的农业生产，正在逐步做到大城市粮、副食品等农产品全部自给，争取大城市不吃国家商品粮。这显然是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意思搞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向高度社会化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会造成各大城市政治、经济上的独立王国，对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发展都不利。就拿美国为例，它是由经济上的有机统一才能造成政治上的自然统一的。它的生产和消费已大规模地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例如，汽车城市底特律生产的汽车满足了一大半全国和出口的需要，它只有与全国各地保持统一，才能获得原料和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州则满足了全国水果和蔬菜的40%以上的需要，它同样需要全国，就像全国需要它一样。关于这一类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及其集中发展的趋势，可以找到大量的具体例子，在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等等各个方面也同样迅速，发展着这种趋势。而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全国经济上的有机统一关系，就如一个人体，你不能说眼睛重要还是腿重要，是心脏重要还是肠重要，只有各种器官、组织的一致运动，才能使人体的新陈代谢正常地维持下去。

像美国这一类生产、交换和消费和社会化的历史趋势，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毫无疑问是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进步现

象，因为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着物质基础，这种社会化程度愈高，未来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就愈紧实。而反过来，使生产和交换、消费的规模愈来愈小，愈来愈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态发展，同时使商品和货币经济愈来愈退化，那么不论这种经济打着何种招牌，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观察和判断，它总是在倒退，总是在背离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绝无丝毫共同之处的，而且刚好是对立的。

从政治角度看，像美国这种经济形态的国家，由于经济上已高度的统一和集中，全国形成了一个无法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决定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联邦制等地方自治制度绝没有造成政治上的割据、分裂问题。我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国内有过这类问题闹大。相反，对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经济上的分裂割离状态决定了政治上的分离、松懈状态，不论中央政权怎样利用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中央集权，采用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等等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存在着，有时发展到对立、内战、军阀割据的地步，地方始终存在着搞独立王国的倾向问题。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大城市搞自给自足这类办法，无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毫无进步作用。

△主席在九大上提出选举不过是形式而已。看来今后中国连这个形式也将取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之一还表现在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上面，等到最后广大农业也用工业方式经营，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与城市居民完全一致了，城乡差别也就消失了。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很大。西欧国家的农业人口减少得较快，一般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东欧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但中国的农业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在绝对增加和相对于城市人口)增加。而在1950—1970年间，世界上不少国家人口在急剧减少(我举了美、苏、日、法等几个国家的数字，现在忘了)。就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印度，也减少了2%，从83%减到81%。而中国农业人口始终保持在80—85%左右。

△我在信中还列举了一些国家的土地集中趋势，提到美国的农场数目从1950年的900万减少到1970年600万，并继续在减少，而经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的情况，还可能提到法国、日本、西德的情况。最后提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营形式逐步趋于统一，由于规模并不有显著增大，故农业发展也不快。至于中国，公社和生产队数目未变，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慢，也不能变。

△关于利润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各生产部门的利润水平通过价值规律、自由竞争的规律，自发地趋于一致，使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趋于一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之一。在苏联一类计划经济国家

里，边通过对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商品的批发价进行调整，使各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提高水平而形成的不同利润水平趋于平衡。总而言之，这些国家都使利润成为为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杠杆。在中国，由于文革后利润已失去这种作用，造成生产力提高很慢，甚至造成不少企业大量亏损，不同部门的利润水平差距愈来愈大。表现在农业上面，既然农业生产率很低，国家也不相应调整价格，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在美国，国家通过农产品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防止农业过于衰退，在苏联，农业也不好，但国家通过降低工业品价格和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多少减少了剪刀差，对农业生产率有刺激作用。

总之，如果不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中国在文革中形成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改变。由于不断批判“利润挂帅”的口号，事实上没人敢抓、敢提利润了。

王申酉

1976年11月27日

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谈话与书信的补充

△有一封上我说：现今我国搞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的机构瘫痪了，只有专政机器仍在高度运转。

△我兄弟一次来信说：这次批邓，我们这儿从干部到群众都无法理解，都倾向于邓的意见。据说总理是在病床上听一个医生谈到评《水浒》的运动的，知道批宋江就是搞自己，说自己的病三分是真病，七分是政治病。总理十分生气。

△今年年初，我陪他去南京路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回来后，我开收音机给他听，听短波时，我开到苏、美、英等对华广播，向他指明这些电台的国籍，并指明苏联有《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电台》，美国是《美国之音》，英国是《英国广播公司》。

王申酉

1976年11月27日

亲笔供词(二)

1976年11月24日

今年6月底，由我小学同学林××(上海××××厂工作)介绍认识上海×××厂女工吴××谈恋爱，至今年9月初，共会面约二十余次。我写信给她十余次(回信二次)，我信中有关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内容回忆如下：(用△表示各别的段落)

△我非常坦率地说，我对现实社会丝毫没有感情，这个社会像满清王朝一样，采取闭关政策，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隔绝起来。然而满清王朝也比现在开明一点。那个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在扼杀了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后搞了一点假维新措施，允许人民可以出国留学，结果本世纪头十年开始，有一大批向往文明的青年出国留学。像鲁迅、孙中山、周总理、邓小平他们全是这个时候出国的，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熏陶带进来新思想。就是这些青年在新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观点等)武装下，发动了革命。诚如马克思作的比方：满清王朝像一具僵硬的木乃伊尸首一样，接触到这些新思想的新鲜空气后开始解体，这是不以满清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然而，中国没有开放很久，现在又关闭了，文革后关闭得更紧了。我感到越来越窒息。我们这些接触过现代科学技术和西方精神文化的青年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社会形态的。中国一定要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加入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变并迅速发展。

△我曾听有人背后这样评论我，说我“是黄鱼脑袋，平民百姓去考虑应该由总理考虑的问题”。我总不同意这种话，决不能说平民百姓考虑了国家大事就是有野心。我本来是搞自然科学的，过去从未想考虑政治问题，我中学时的评语就说我“不关心政治”。我总感到国家很好，政治形势好，用不到我去关心。但进大学后，慢慢感到政治情况不那么好，甚至就不允许你静心读书，搞自然科学，结果就考虑起政治问题来。后来写日记写出大祸，曾几次发誓不过问政治，埋头自然科学，但社会不允许你搞，自然科学的书也一次次没收、干扰，迫使我从自然科学领域跳到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目前状态下，搞自然科学没有出路，也根本搞不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候。例如鲁迅原来是学医的，但后来想到搞医对国家没大作用，就改搞文学。我当然渺小得很，丝毫不想与之相比。但总感到既然没法搞自然科学，糊里糊涂过日子就太没意义了，应该至少认识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活了一生，恐怕还不知道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发现社会上有些青年注视着这批在文革中由于有变革思想而被整的青年的动向和思想状态。他们听说我们中有些人精神不振，消沉了、庸俗了，感到担心。我常想，如果我们这代青年再消沉、腐败下去，下一代青年更单纯、不懂事，中国的前途就更渺茫了。我们总多少得有点使命感。我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很渺小的起码目标，至少在经过漫长一段时候，有机会时把我们这一代青年所经历的生活、斗争的一切用笔记录下来，告诉我们

的后代，使他们在回忆前一辈人的悲剧时，理所当然地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使生产更美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依靠剑和笔，我希望能最低限度地用笔来做点有意义的有，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你曾谈到你对人与人关系看法是悲观的，总认为人与人之间太残酷，相互不能信任。如果在十年前我与你相识，我会同意你的看法，并且有很多共同语言。但现在我不同意了。现在才认识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蒂属经济关系的范畴，是某个特定经济形态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人与人关系是不同的。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残酷的，相互勾心斗角，这是社会现实造成的。就是政治斗争的形式也是由特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因为我国经济形态还很落后、不文明，决定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必然是残酷的。我永远也不会想去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我的本性不能适应这种斗争的残忍性和血污性，而政治斗争总夹杂着无数血污和垃圾。

在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由于有了共同的信仰，深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因而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确立的人与人关系就成为非常纯洁的同志式关系了。这种关系就与你所想象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本质。我总感到，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理论信仰，那么我们的关系是不牢靠的，甚至恩爱夫妇到头来发觉对方是一只咬人的狗。当然根据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不相信你像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那个对丈夫下毒手的女特务，你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坚定世界观，会给你

造成悲剧，而给我带来更大的悲剧和灾难，因此，我很可能会孤独过一生，这不是随便说说，确十分可能。

△我发觉你总抱有对我的怀疑态度。我已经在第二次接触时就向你表明，我决无搞什么政治阴谋的动机，虽然我对社会现实是强烈不满的，是无法适应的。社会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变革决不是能人为(造)出来的。我已经作了许多牺牲，人们不能再指责我对灾难性的现状丝毫不负责任、袖手旁观了。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其生活经历有过很大的转变。在19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积极搞密谋(共产主义同盟就是一个密谋组织)，以为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成熟了，但结果失败得很惨，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几乎终身不能返国，而恩格斯被通缉。结果一大批流亡者在国外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畅想执政后的滋味，妄想再搞。马克思对他们一概不理睬。不论他们怎样辱骂，什么“右倾”、“保守”、“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之类，也无动于衷，埋头研究社会科学，几十年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完成了有史以来真正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变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了真正有利的事情。而那帮夸夸其谈的流亡者，历史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小丑罢了。马克思在《流亡者文选》中曾尖锐地讽刺过他们。

我当然绝无丝毫奢望想同马克思相比。但我有一点：深深地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并不是生来接受它的。我读过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学著作，如中国古代的或外国的，读过基辛格的、

肯尼迪的书，各种各样的书都读，只有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才被真正说服。我希望自己今后也用许多精力搞点社会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收集点社会资料研究社会问题，这样才能透彻地了解社会，并根据这种正确的理解，看看我们在这个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能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一生过得对人类最有价值。我讨厌出头露面，更讨厌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在我看来，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政客多半象丑角在出丑，被台下的观众笑。而且他们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往往必须说谎。

△你谈话中谈到，你对搞社会科学不感兴趣，当然，在我看来，如果你能与我一起钻研社会科学，我们成为一种战友式的磁盘，那自然是我很大的幸福。但是如条件限制，我也绝不奢望。我理解现实困难是很多的，你整整八小时体力劳动，往返路程不短，休息时间不多，又有大量家务操劳，因此要你一起钻研是不太现实的。但我期望你至少能做到，理解我的做法，并在道义上、精神支持我。如果二个人目标一致，就能发挥出比二个人分别努力时更大的力量。

△其实我近几年来思想也消沉了，只是你初认识时的鼓励，才萌起了我想继续搞社会科学的兴趣。其实我近一、二年来早就不搞了。去年上半年搞了半年电视机，下半年起学德语，今年年初起开始翻译这本德文小说，《到哪里去？》。坦白说，搞社会科学，我是很缺乏条件。首先是需要大量书籍，像我这种没有特权的小百姓是得不到的，即使得到也是机会极少。以前做了大量

笔记和资料收集，结果一次次被没收，连经典著作笔记也没收，根本没办法搞下去，毅力再大的人也没办法。这不是我个人的责任，历史不应责备我，我已尽了自己的力量了。（注：当然，这一段话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是为了暂时迎合对方，指示以后慢慢说服她。）

△你在谈到复旦那人时似乎认为他属于有野心的人。根据我所见所闻，没有证据证明那人有什么卑鄙的野心。分析一个政治人物时，要如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看：一个政治人物是一个历史时代倾向的代表，他的固有政治特征往往要从这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去看。

听说复旦那人曾预感自己的命运，说过：历史上追求某种崇高理想的人往往总是陈尸路旁。我可能命运还不至于这样糟糕，但今后一生命运总注定是艰苦的，要受折磨的。你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怎么办？》一书（此书列宁在14岁就读了，并极为欣赏），只崇拜罗布霍夫一类人是不够的，你应该能理解和欣赏拉赫美托夫这样一种人。许多革命家曾从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得到借鉴。

△由于我的政治经历，显然使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危机。我很难理解你当初对复旦那类人的欣赏态度是否是真实的。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正是这类人时，你又害怕了，退避了。记得你在虹口公园透露你曾想参与他们的圈子。如果你以为这类事像《小城春秋》中描述的浪漫故事，那就错了。如果你想介入，而又没有作

好坐牢吃苦一类的思想准备，那你肯定要做不了的。当然，我是坚决反对搞阴谋活动，耍弄诡计的，因为这正好与我所追求的信仰和目标对立的，会玷污我的信仰。

△你的父亲为生活所迫走上了那条路，而我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宁愿抛弃自己正常的生活，怎么能把我看成和你父亲一样的呢？这使我感到非常辛酸。

△我把自己的履历告诉你，虽然你并没作这种要求，但我感到有必要向你彻底说明自己的历史，这是对你命运负责的表现。但我没有预想到会给你带来这样大的震动。态度会变得这样快。特别是我那段曾被拘留审查的历史使你震动尤其大。这使我极为悲愤。你可以为了另外我个人原因与我决裂，但我没预想过仅为此就使你不能容忍。

鲁迅的文章我许多已忘记了，但无法忘却的是他的一篇小说《药》，故事中写满 清王朝末年有一位革命志士夏瑜(瑜)在抗清斗争中被擒，推到刑场受刑，但无数精神麻木的老百姓围在周围伸长脖颈在看着热闹。当刽子手挥出刀，头颅在地上滚、热血从胸腔里喷出来时，老百姓们仍伸长脖颈来看，情绪高涨起来，甚至有人用馒头去接那热血，用人血馒头去医治痲病。

这是多么血淋淋的事实，多么麻木的民众啊！他们不知道那屠刀砍下的不仅仅是一颗头颅，而是砍下了他们所依赖的幸福。这位夏瑜(瑜)就是秋瑾女士的化身。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有些要求改革的志士在政治上被砍头时，许多老百姓正是

麻木地伸脖颈者，而且还拍手叫好，咒骂被砍者是强盗土匪是害人虫呢！俄国革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拉上断头台遭受侮辱时，还有一名女青年向他扔鲜花。但在中国，恐怕还不会有这种事吧。

△现在高校里学习质量普遍下降，我可以同时读十个班也不会感到困难。

△现在的大学教师，是世界上最动荡的职业了。既要与学生搞开门办学，工厂、农村去，又要定期去干校，去工厂当工人，去农村当社员，还要到外地搞函授，轮流去西藏二年，还要到中学搞调查，还要轮流参加人防工作，还要到农村设的分校去当教师，还要校内搞科研，再要去工厂搞科研。就是在校内搞教学工作，每周一天劳动、二个半天政治学习，一个半天看电影，临时的政治突击运动还不算，一周三天搞教学算好的了。

△前几年(约1972年)人民日报出了初澜的文章《无标题的音乐没有阶级性吗?》攻击西方古典无标题音乐。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文学艺术的价值问题的大量批判文章把问题搞得很乱。其实只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我只要收集一些必要的资料，就可以从学术上彻底地反驳这一切批判文章，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问题的真实面目。列宁本人对西方古典音乐是个热忱的欣赏家。我与我表妹谈恋爱过程中，她有一次谈到有人以她有我这样的男友而欣赏她，我立即兜头去信泼了她一头冷水：“你有没有思想作好准备：将来我隔离审查时，你能忍受一切巨大的压力吗？我

如果坐了牢，你肯为我送衣服到牢里来吗？……”当然我谈论这类事不是在闲聊，而是放在我面前严肃的现实问题，是你在关于我们关系作最后判断时十分要紧的依据。你如不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你会后悔不及的。当然我主观上不想搞冒险勾当，不想再出事，但他们硬要搞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与这个社会现实的发展趋向是无法融合的。

△我总有一种预感，我这一生是劳碌艰苦的，我不习惯安闲，就是平静下来也一直在考虑复杂的问题。我感到我一生要吃苦。得磨练意志，我整年用冷水洗澡，三九寒天也咬着牙用冰水沐浴洗澡。劳动时尽量光脚，以磨练意志。

△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人为地搞得非常混乱，所以在人们中间失去了许多固有的光辉了，它的价值模糊不清了。其实如恢复了其真正的面目与价值，像你这样受了许多西方精神文明的熏陶并且又在现代化大工厂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工作的工人最接近、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而那些来自封建愚昧的农村那种原始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产关系中的人要远离马克思主义得多。

△你表示，你与我一样，对社会现状是不满的，但不赞成我的办法去表现出来，我受的牺牲太大。但我想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就不会改变现状了，每个人都害怕牺牲个人既得利益，谁来奋斗呢？你认为我牺牲太重实在太不值得，而我感到不算什么，坐点牢也增加了人的一生的丰富内容。后来又去大丰流放，

拖了好些日子，比经济上看，损失了上千元钱，但我正是在流放时候，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使今后一生生活得更有意义得多，因为懂得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了一点人类社会的本质，有了奋斗的方向，使一生今后的生活有了真正的价值。与这些相比，经济上的损失就渺不足道了。

△我所以长久不得解决问题，毕业离校，就是因为我从来不愿玩狗咬狗的把戏，丧失人格去咬别人，做狗的勾当。就你而言，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不正当的行动，你当然应该揭发我，抛弃我，这不是狗咬狗，因为对不正当的事进行揭露是正直人的行为。在正义的压力下昧着良心咬人家，才是狗咬狗。

△你应该看得出，那个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是决心带着她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了，她的本性一生中不可能改变了。而走改良派道路的康有为已注定在中国行不通了，非要走多数派革命的路不可了。不论我们关系未来的结局如何，你在如何选择未来的生活道路时，你应该看清历史的发展趋向。

△我是被这个社会宣布为敌人的人。当然，我从来不相信我是社会、是人民的敌人。我相信我所想的和做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而不想损害社会，我永远也不承认我犯过什么反革命罪。过去写的日记不过是一个热血青年面对灾难性的现状而发出的出自内心的忧愁罢了。我认为我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日记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但至少能启发人们多想一些问题、想广一些问题，里面总有一点真理的因素。

△你虽然不过初中毕业，但由于是文革前毕业的，总读到了一点书，其实现在许多中文系的大学生挂着大学生牌子，没读到什么书，远及不上你呢！

△我想向你谈谈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的思想发展过程。

我决不是出于个人的物质利害关系走上这条路的。从我家庭出身看，父母亲都是工人，父亲是闸北区委办公室的工人，母亲是火柴厂的老工人，几个弟弟全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我父亲中风偏瘫时，闸北区委第一书记刘龙江曾亲临我家探望，一个来自军队干部的区委书记也看过，区委许多领导干部轮流前来。我家实在没有与现实社会抵触的地方。就我个人而言，从小学读到大学，是国家一手培养，尤其是读大学，在同年龄的青年人中只有1/720的人才有可能读大学，可以说是有不少既得利益了。

我从小在安稳平静的生活中长大，感到社会很好，国家很好，用不着我们去考虑国家大事，只要一心读书，将来好好建设国家就成了。因此我从小用功读书，尤其是进了大学后，暑来寒往，把全部精力扑在自然科学上面，寒假暑假也在校过，如平日一样用功，总想多读一点、学好一点，学好本领将来多做一点贡献。

但慢慢发现，社会并不那样好，甚至不允许我们好好读书。64年主席春节对毛远新的讲话，强调学生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从此后，学校就没法安宁读书了。文革后把我们的奋斗目

标完全破灭了。我们被迫转入政治运动，我们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了，结果，就发现了现实的许多矛盾和缺陷。从63年起我在日记中开始谈论政治问题，考虑政治问题。结果在文革中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由于我还没有真正接触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对社会现实本质不理解，因而从监牢中释放后发誓不问政治，仍一头钻到业务书中去，想用业务来充实头脑，用消极的办法来逃避现实政治。

但现实政治却要过问我，一次次找我麻烦，一次次没收我业务书，强加我罪名，硬上纲批判，最后送我去大丰干校流放，最终迫使我从业务领域转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去。我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观点，我的世界观就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像一盏明夜的灯，照亮了整个深沉的夜。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了。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一生的转折点。

△我是对现状不满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误。人类历史就是由不满于现状的人们推动的。如果人们都满足于现状，不追求革新、发展，那么人类至今仍还住在原始的洞穴里过猿人的生活。

△我承认我缺乏社会生活能力，对目前繁琐的生活漠不关心，不懂许多起码的生活知识，这一点我不及你，得向你学习。例如，我从来不关心穿着，几十年来我母亲为我做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对做饭烧菜什么也一窍不通。我总感到我们这一代青年是应该吃苦一代，不要去多考虑个人的小事吧，老实说，在我

们这一代，你要追求个人的幸福也无法追求到，一个人总得追求点生命的价值吧！

我头脑中确实一直在考虑的是别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甚至在很原始的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为什么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仍不能发展起来，从封建社会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西方的封建社会一般只经历一千年或几百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强大有力，能维持那么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还在考虑西欧共同市场的货币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形成货币的统一、彼此关税取消、劳力自由流通的过程如何向统一发展的过程，考虑我国的经济形态在向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倒退的过程及其在上层建筑里的反映。还有许许多多类似问题，太需要人们去关心考虑了。我确没有余心考虑个人的小事了。

△现在青年男女在选择恋爱对象时，往往以对方的工资、房子、住宅、家具、职业之类作为衡量对方的主要条件，而对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是由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个人的品质和才能在这个社会中既然没有什么价值，就必然会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关于与吴××谈话中关于政治问题的内容，数量很少，绝大多数是谈生活问题及一般性问题，就是谈政治问题，也远比信中所谈的范围要狭小、内容要简单得多，不出上述信的范围。至于有一次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并非有意攻击，而是她问起我

过去日记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回答，最大的问题不过是这个“癌细胞”问题，别的没什么大问题。是轻描淡写搪塞过去的。

总的而言，我很少在谈话中谈严肃的政治问题，毕竟是在谈恋爱。与我兄弟谈话也是这样。往往通过信件才谈严肃的政治问题。实在是因为，我脑海中一直在考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问题(如交换、分配、生产集中之类)与现实生活相距较远，在日常谈话中，听的对象较难领会，只有通过书面表达才精确些。

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通信和谈话

从今年年初他从内蒙古回沪探亲时起，我与他开始谈论政治问题，他回内蒙后，我曾写过三、四封信给他谈论政治问题。关于信的内容经回忆如下：

△对于我们国家现状来说，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是不赞同的。经济基础在农村方面，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这使农业生产水平一直陷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下无法提高。在工厂，由于取消了利润的推动作用，物质奖励取消，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很低，结果生产也不容易发展。

△我出身在工人家庭中，本来不应该与现实有所抵触的，我家庭没与社会有根本利害冲突。但在现实中发现，社会的阴暗面很多，这促使我去思考问题。许多人不能理解我。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现实，就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中国人民太闭塞，其实中国人对本国的真实情况还不及外国人对中国了解。我们生活在 20 世纪，应该摸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中国那么闭塞，因此弄一个半导体十分重要，使一个人能真正了解时代的脉，随时代潮流前进。通过半导体可以了解全世界的各国人民的生活，了解我国的情况。当然，每个国家对中国态度不同，他们的宣传归根结蒂是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听信，而有分析地去听，自己要有坚定的正确信念，才能不会受错误宣传的影响。而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立场，才能对外国对华宣传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我寄来一个条子，写明了一些国家对华广播时时间和频率（有苏联、美国、日本、西德、台湾、印度、北朝鲜和南朝鲜），你可作参考，这是 1971 年手册的，现在可能变化了。

△我希望你能真正学习和钻研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树立正确的观点，学会用它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能力。如有可能，将来我们能一起工作，钻研一些社会问题。

△你一人在外，劳动很吃力，又有各种琐事，要集中全部精力读马列著作是太困难的。为了树立一种坚定的学习愿望，建议你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物传记，如《马克思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传》等等，这会使你热爱起马列著作的，会确立坚定的信念和意志的。

△我决不主张搞密谋，历史有它固有的发展规律。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是想要了解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将来社会上会出现一些观点、思想。我们并不企图自己创造什么思想、观点，只求能对别的思想、观点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不使自己一生走入歧途。

我也讨厌搞政治，介入政治斗争。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不文明性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决不想介入。在我看来，政治舞台上的政客是像演戏一样毫无意义，像小丑一样。

△这次天安门广场事件，规模非常大，大概五四运动也比不上。人们在前仆后继地斗争，为了国家灾难性局势的扭转而流血。

我们既然没有机会去流血，就应该另做点有价值的事，在我们一生将来有机会时，用笔来把我们生活过的时代记录下来，让后人了解我们这代人，更好地建设未来。

△邓小平打倒后，我总感到国家的前途很暗淡，总理逝世得太早了，他一逝世，邓小平就被打倒了。昨夜梦见总理逝世，哭醒了过来。上海是不准纪念总理的，有些人搞了纪念活动，就被当反革命抓，如人民广场有人竖总理遗像就被抓了。

△你由于文革的影响，读不了许多书，造成知识上的缺陷，这实在是悲剧。这造成你学习马列著作的困难性。你碰到许多典故只能暂时跳过去，以后反复读，要经过艰巨、百折百挠的努力才可能真正读懂马列。

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谈话，确实谈的不多，他回家休假时间短，有许多事情要料理，至于讨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大致与我9月7日写给吴顺娣信中第②段差不多，有些对形势的看法，也多少谈了一点。至于谈党内斗争，是用过“欧洲派”、“苏联派”的词句的，但只是作为简略称呼，关于党内斗争的看法也如同9月7日那信的第⑦部分中第二方面“关于近二年来党内斗争的看法”来谈，但简单得多。

(完)

王申酉

1976年11月25日

关于与我兄弟王解平的谈话

主要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用它解释从原始共产主义怎样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

今年年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把邓小平、周荣鑫、胡耀邦等人的言论零碎地对我兄弟谈了，并抱着称赞的态度谈。对这些人的言论这儿不转述了。我还说主席批宋江是对着总理的。我与他的谈话内容就是如上所述。并非系统说过什么，是平时零碎谈谈的。确实没有值得成文的东西，也没有明目张胆的攻击性言论。我当时认为他人小不懂事，没多谈，后来他去内蒙古才开始信中谈政治了。

王申酉

1976年11月25日

报告(几点请求)

①由于政府承办员和管教人员在环境、饮食方面的照顾和关怀，使我得以顺利地写完这份交代，我深切感激政府的照顾，我的交代完全是符合我实际想法做法的。

②我向政府保证，已决没有任何重大罪行隐瞒了，如今后发现还有隐瞒，愿接受从严惩处，绝不责怪政府，特此书面留证。但在关于与别人关系方面，虽然大致都已全面交代彻底了，但有些细节可能遗漏，愿协助政府彻底搞清。

我认为，我的思想面貌已完全坦露给政府了，可以说五脏六腑都坦露了。我决没有、也决不想在政治上搞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世界观决定了这一点。因此我期望政府可以决定处理我的方法了。

③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深切地拥护党中央为人民立的大功，我深切在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每天看到报上报道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一批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

因此，我也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党和政府能再给我一次挽救机会，不判刑，戴个帽子，管制几年考察我。我一定会一个人发挥二个人的力量好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全部力量。我保证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改造自己世界观，把自己改造过来。决不再以反动思想毒害别人。

我出身在工人家庭，父母对党有深厚感情，决无利害冲突，全家都对党、对社会主义没有利害冲突，没有仇恨。我就个人而言，在个人利害上、物质利益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绝无冲突，相反，蒙受了很高的待遇。我渴望还能有为党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的机会。我会感谢党的，我全家会感激党的。我希望从宽处理。

④我还希望加快处理。这儿监房内日子十分难过，周围全是流氓行凶犯、轮奸犯、盗窃犯等，我实在无法在其中生活下去，经常受侮辱，这里不详述了。我希望早日回到社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现在长久这样下去，人是会堕落的，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啊！

⑤如果目前还不能处理，还要审查下去。我恳求政府让我保外劳动。首先我有力气，勤劳，能尽力做好政府要求的工作，在拘留期间为政府做点事。而且我没有同案犯，我与这里的罪犯们决无共同语言，绝不会发生纠葛。也决不会发生其他意外。老实说，即使牢门打开，我也不会逃走，逃出去我是没法生存的，我只有靠政府才能生存。

⑥如不保外劳动，能否允许我单独监禁在 19 号空房内。我实在怕与其他犯人生活在一起了。

⑦我渴望能借这个时期读点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思想。但我三次接济单上写了要求家中买书送来，都没有成功。我家中实在没人肯买，父亲又没法买。是否恳求承办员动员我母亲去买。请我母亲去银行提我的存款(已到期)，再按我列出的书名去福州路河南路图书发行公司去买一下(恐怕不能全买到)，买了后请母亲送来这里。这一点我极迫切地恳求承办员协助我办一下，因为我将来判刑后总要阅读的。这个要求我要一百次反复恳求。我特地写了下面信和书目，恳请承办员麻烦转达一下，如书面不能，就口头转达一下，请我母亲按书单去购买。

⑧我再恳求政府让我保外劳动。一定会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我素来饭量很大，保外劳动就可以吃饱一些了。而且能有机会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了(在集体监房内，一天到晚咒骂争吵或听下流无聊东西，根本没法看书)。恳请政府照顾!!!否则我在这儿像动物一样过日子，太没意义了!!!

父母亲:请你们用我 10 月份到期的存款买以下书籍(剩下的钱供家用)，可去福州路、河南路图书发行公司购买，务必买了送来，一定要买来。(另带一套《毛泽东选集》来)。《资本论》第 1—3 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3 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列宁选集》第 1—4 卷；《马克思传》；《论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

《列宁回忆录》；《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再买一支钢笔带来。

(以上有平装本尽量买平装本)

报 告

我确实没有其他问题可交代了，如有隐瞒甘愿从严惩办，决无怨言。关于与黄、史、薛等人关系，已在1973年审查时讲清楚了，决没有隐瞒什么东西，现在决无什么补充或变化了，后来也多半不再来往，没有新问题了。至于与黄的来往，因为他半导体是我装的，经常损坏，要我负责，就继续往来，最后我收买了这架半导体(即在家中的那架)。后来接触中也只是为了生活上相互帮忙买东西，其中关系确没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

我恳求政府能早日加快处理，恳盼政府宽大为怀，让我回到社会上去，与父母同享晚年，好好侍待父母，决不再走过去的路。改造思想、埋头劳动，争取为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替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当然也作好判刑准备，也求宽大为怀。

恳望政府允许我目前保外劳动。还要请家中接济书来。

王申酉

1976年11月25日

紧急报告

承办员：昨天的审讯结束后，我已处在新的阶段，我再次表示，我已彻底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现一方面在认真学习，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也迫切期望政府能从宽处理，并尽快处理。在处理之前，由于自己案情已清楚，我迫切希望承办员与管教组协商一下，允许我出监房做一点劳动工作，为政府办一点事，保外劳动工作。

或者允许我去造纸或木一厂劳动，等待进一步处理。

我监禁已近五个月，由于饭量与过去拘留前相比，急剧减少，加上久坐，缺少活动，体质已急剧衰退，而且生了一些久坐的疾病，如坐疮、痔疮(每次大便要流血)等。我渴望能通过参加劳动，做一点适当的活动，使身体适当恢复，这样无论将来回到社会上或在其他的赎罪形式中能早日适应环境。

另外，成天与这些监房里的社会上形形色色刑事犯罪分子呆在一起，受欺侮尚其次，而成天听那些下流难忍的东西实在对我难以忍耐下去。

我十分诚恳地请求承办员满足我的请求，我一定在劳动中接受管教训导，好好办事，决不做不允许的事，在劳动中将功赎罪。把这看为政府对我的人道的照顾。

再次恳求承办员与管教组根据我住在这几个月的监房表现考虑同意我的请求。

案犯：王申酉 77年1月27日

日记摘抄

(1959——1967)

王申酉

第一页写道：

从3月20号开始起我每天有什么心得体会、事情等等……我一定要同申同哥一样毫不保留毫不羞愧地记在这本日记簿上。

1959·3·24 天气晴

我痛恨旧社会，认识到现在社会的幸福，这一代，再也不可能，也不要再看到一个死尸——旧社会的标志了，这将更使我热爱新社会了。

1959·5·27

第一页画页后面抄录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1959·6·17 抄写：

“光荣不会给予一个寻求它的人，然而它自己会走向一个不想望光荣，但却能诚恳地和自我牺牲为公共福利而劳动的人。”

——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

1959·8·5

扉页上血书：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1959 · 9 · 23

今天我开始为班级工作了，起先在黑板报上画报头，画天安门、红旗等，使有些老师、辅导员干部说画得很好——这是我莫大的高兴，很信任我，就为有金色点儿的绿纸，带回去写了十八个美术字——“党和毛主席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锦绣前程”。我写到十一点钟多整整写了3、4个钟头，才写好，但我由于太兴奋，不得不把新事记下来。

1962 · 11 · 24

我好不容易地度过了这艰辛的十二年，我必须下决心生活下去——有意义的生活下去。我要坚持我正确的道路。顽强奋斗，奋斗吧。啊，生活是美好的，但它时刻考验着人。据说，罗蒙诺索夫伟大在于他的知识水平超过了所处时代的六十年(?)是的，一切在于觉悟。我觉得我是个有觉悟的人，是的，我并不是不懂得生活的危险。生活的路是危险的，但我会过去的。

1962 · 12 · 13

看了一本“科学家的名人传”，极有体会，大大地促进我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自然科学上奋斗的决心。

科学家孜孜不倦地个人奋斗着，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而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果实(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的、有限的一部分)。这种人才是伟大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们将永远被千百世的人类传诵着。虽然随着科学的发现，他们的名字也许要湮没，但

是，他们的成就及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人类发展的高塔下面作着基础。

我非常鄙视投机的政客，我最鄙视用鲜血来擦干晋身路的政客。

我崇拜科学家，我非常崇拜有“个人奋斗”的科学家，我最崇拜在刻苦的环境，在流泥中自拔，永远谦虚、勤奋中培养出天才的科学家。而我便将从这方面永恒的奋斗。

1963·3·2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美而不劳。丈夫为志，穷当益坚。

1963·3·14

现在不但要克服行动，克制行动，还必须克制思想。

别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瞧不起人家，看不惯人家。要特别善于找寻别人的优点，并吸取作为自己的营养。心情也应该开朗起来，待人热情真诚，不记人过，多记人优，量气大。

只有自己光明磊落，就会象石像一样，不必向人低头。

1963·3·27

通过这次下乡，我最重要的收获是进一步的将知识分子由于其环境及社会地位影响而存在的软弱性的体会深刻化了。他们虽然懂得怎样改变其现状，但却缺少应有的勇气去改变它。我深深地体会到雷锋同志所说的：“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

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有力量。”

1963·5·4

马列主义越来越穷，修正主义越来越“富”，连牙膏、草纸都凭票，只有我们国家才做得出来。

1963·6·23

我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概念已被他们这批野蛮的家伙弄混淆了……他们依照自己的头脑来理解一切东西，又把这些强加于千千万万成万成亿人的身上……我沉溺于自由，我沉溺于里昂、孚希万特的小说《戈雅》、德国的《公民们》、高尔基的《克里木·萨木金的一生》、《阿尔诺莫夫一家》、《无用人的一生》、左拉的《娜娜》、《卢贡家族的命运》、《崩溃》、《劳动》、海姆的《人质》、《十字军》、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火》、《潜流》、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天才》、《堡垒》、捷克的《原子狂想》、莫泊桑的《我们的心》、《俊友》、《温泉》、《如死一般强》、《人生》、《她的一生》、蒲松龄的《聊斋》、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宋代的《游仙窟》……活的充满血的热情、肉的灵感、心脏的跳动、活泼的形体激动了我这一充满活力的年青的躯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

我的心是回荡的，我不知进入到污泥中去呢？还是以身自洁。但是我经过反复的思想考虑，还是进入到污泥中去锻炼。像白莲一样，越是周围的淤泥肮脏，越显露其光洁美好。

我必须入团，为了更伟大的目标——为人类贡献自己并为自己造福而奋斗。现实，我实在并不愿损人利己。我希望别人能受到我的益处。我要做一个有功于别人，使别人感激的人。但自己也必须尽可能地创造美好的生活，使一生不至虚度。

1963·6·26

我真诚地认为：我对这个上层建筑并不绝望而抱有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应彻底改一下。他们整改的第一步，就是大量开放自由，使人民取得应有的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有字号的东西却绝对行不通的……

我特别同意在国家里实行平等，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一切看历史、看经历、简单履历，强调历史、家庭成份……历史是无情的，将无情地碾碎，它毫无情面地考验着一切事物。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有无数东西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也有不少无所事事的东西随时间的过去而悄悄消失，从历史上洗刷掉。而可悲的是也有不少遗臭万年、千古长恨的东西，只会引起人民摇头、叹思、悲叹罢了！

你的一生将是奋斗的一生，将无时无刻不在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生活。

1963·8·6—10

夏夜即兴狂想

人们都爱早晨，因为它是“灿烂的(?)”一天的开始，而是黑暗的夜的结束。而我，绝不！我深深地爱上夜晚，因为它结束了压抑的一天——世界上有什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它结束了充满残酷的人间斗争的一天，而迎接着美丽的、静穆的夜的到来，它是和平的象征，无数无数的辛勤的人们享到了和平，而一小撮疯狂的人也进入了温暖的被头中做它白天未能做完的恶梦——若有人打扰了他的恶梦必将受到其可怕的咒骂。多么美好的夜，我愿意永远做夜的崇拜者。

世界上一切疯狂叫嚣战争的人啊！别从人类的身上抢走他一半以上的面包而疯狂奋战了，乞求和平吧！战争意味着饥饿寒冷、残酷、毁灭，而和平意味着温暖、饱足、博爱、文明……

1964·6·2

关于上次申请之事(63年12月14日“今天我完成了《入团报告》”)，嗟乎，直至现时杳无音讯，显见十有八九无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我现在正处在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狐狸的场合了。既然得不到，只能说又酸又生了。天乎！显然，他们现在紧紧扼住了我的头颈，我已被他们捏住了致命的东西，我呜咽，我痛哭。他们的心肠难道是人的心肠吗？！我象屠宰场上的牛羊，在等待着他们的屠宰，而我为了那一点可怜的饲料，不能不

待在屠场里，没有勇气脱离，脱离意味着更残酷的对待。窒息，我几时窒息而死?!?!

1964 · 6 · 5

近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号召，什么口号，一切又照常了。我觉得似乎有点自由化了，譬如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了，平时晚自修寝室灯不关而允许自修——不像以前那样赶到教室里去了，灯泡也由 40 瓦特改到 60 瓦特了。教学内容减少了，但愿继续改善。

1964 · 6 · 23

.....

我忽然想起数月前申荣所谈的关于学校一件事，他与某些同学偶然翻到他们的团支部书记的日记簿，里面记的什么呢，完全是有关班上同学的平时的言语行动等。自然，记坏的比记好的这需要。原来所谓“团干部”扮演的是如此的角色，使人恍然大悟，又闻此类角色平时功课如何，原来是倒数几名，英语吃零分，十几分(百分制)，见不得人。中学尚且有如此角色，何况大学。一切所说明的问题不言自明矣!

1964 · 7 · 1

万万想不到《外国名歌二百首》及其续编已列为禁书，今往图书馆希借得续篇，但已没有卡片……有什么可多谈呢？望洋兴叹。

1964·8·1

我却一直所考虑的是将来，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将来”，这也是每个年轻人普遍的思考方面，但到了现在这种历史关头（约指当时的越南战争）……成千上万、不，成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成千成万上几万万的人在为生死存亡而奋斗，难道还允许那大学极乐园中的不识人事世故的二十几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沉湎于爱情催眠曲，困卧在恋爱温柔台中么？！不！确实是绝不允许的——虽然将会在内心产生强烈的本能的抵触情绪。当然也是可以抑制的情绪。

将公布四个学生发表的反动言论!!!

将公布八个听黄色音乐的学生的“悔过书”!!!自然将进行讨论!!!

如果我这本日记被他们拿去，我将是什么结果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加我为反动分子的帽子。如我的言论可以认为是反动，那我既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亦没有受过非法的教诲，所说的不过是社会上的现实或是我的推测，我想这不会以此值得加我罪名吧！当然为了自己的信仰，我愿意坚持我自己的意见，这里的一切得我自己负责！

1964 · 8 · 8

半年来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觉，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在回顾某一段时间时，觉得学到的业务知识与社会经验，比前一时期多，但行动在新一时期少，原来这段时期成为旧的时，又觉得新的时期收获远比以前大。人大概总是这样的，以加速度认识事物，而且人总是要认识的，无论外界采取什么最卑鄙无耻的压制也好，用虚伪斩事物堵塞真实事物也好，绝对也阻挡不住人的认识，真理总会被认识的!!!

人类的历史必将向前发展，历史的车轮绝不会向后退。事实证明了这句真理，历史在发展着，人类在发展着，并将永远在发展着。

当然，也许人类历史上的某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甚至是几百年有过暂时的停留，甚至倒退，但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历史旅程上极微小的挫折，时间上不过一瞬罢了，代替这种现象的必然是前进，必然是前进。本来就是这样么：车子在过河要停留一下，过小山要退两步再向前猛推，因此，历史的车也必将无疑地前进。暂时的倒退不过孕育着更飞快的前进。正像人们认识一样，他可能一直被虚伪的东西充塞了头脑，但一旦有一日他认识了真理，他必然会更迅速地抛掉这一切，而极其迅速地接受真理，正因为他曾有过虚伪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比别人更快认识真理!

事实证明，世界历史正将会这样发展！而且正在这样发展，我欢呼这样发展。我疯狂地高举双手同意：世界这样地发展、发展、发展——即使我下一秒钟即使长眠，永恒地长眠!!!

1964·8·11

我现在觉得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是相当密切的，政治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往往一个新的政治起初是推动经济的，但不久就会促退经济。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发生矛盾，又得形成新革命。科学又与经济形成类似的关系，因此科学与政治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以前就往往很少看到这种关系，就如这本日记的首先几项所述的，以为这两事物是平行发展的。

科学的发达，对政治有极其大的依赖性，当然科学的发达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化。不过主要是前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科学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呢〕??????

1964·8·13

学习是艰苦的劳动，必须下苦功夫，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望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谁害怕下苦功夫，谁就别想，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真正的成绩。

1964 · 9 · 6

我在大学两年级过的生活的艰苦性几乎是不大会使人相信的，我根本对物质享受失去了兴趣，我将全副精力投入了学习，我要求裁减助学金，并获取了还可见人的学习成绩，然而他们……

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我的热情，总是以极其阴沉的面孔瞧着我……

人生就是这样，必须早些看穿，呜呼，对于一个二十岁未满的青年，厌恶人生也许太早一些了吧！但我相信不会早的，以后将有更多的人比我还早地走向这条路。

1964 · 9 · 19

中国现在是一个极其艰苦的但也是极其强大的国家。毛泽东的天才的领导艺术促使极其巨大的六亿中华后代子女团结在他的周围，保持了中华民族二三千年的独立的、光辉的民族尊严，他使停滞了数百年的中国历史重新得到辉煌的发展，他恢复了中国人民失去了几百年的民族尊严，中国二三千年的文明历史得到了继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最纯粹的民族，而且是最有理性的民族。”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重新兴起，并将更巨大地兴起，为世界上起支配力量的民族。

但是，取得这崇高的、辉煌的成绩是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的。六亿人民完全必须受到空前的思想及行动上的压抑，要不顾一切地拼命立起来。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身上凡是抽出的有价值的东西都须被并几乎已被集中起来了。人除了获得最低的生活条件以外，一切剩余价值都被点滴地集中积累着，以便将这点滴的东西汇合成大量的资金，从而通过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径去使用，获得更多更大的物质基础材料。用来建设，用来保卫自己。

这一切都是成功的。成万成亿的人民，无论是扫垃圾的清洁工，炼钢的工人或者田里的农民，或者市长、省长，都要求清廉、洁白，使用某种的理论要求人民忍受精神与物质上的窒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的最大成功的妙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不是我实在说不出）是在共产党统治区与非共产党区之间筑起一道新闻封锁线，这是一道据《Inside Red China》作者所说的“无形的但是极其牢固的长城”，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通讯事业极其发达的今日要求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世界隔绝起来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但这被成功了。举国上下只能存在一个思想、一个政体、一个力量。当然这是巩固政权的、不至崩溃的极其必要的步骤。

困难啊！中国共产党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以至在成功的道路上，牺牲了成千成万的生命，但今后的道路绝不意味着好走，时刻担忧这个政权的崩溃，官话则曰：“资本主义复辟”。主要与存在于六亿人头脑中的种种非纯洁思想作无情的斗争，要

求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一个思想、一个目的地抛弃自己一切而忘我工作。同时还必须花出巨大的精力与世界上其他四分之三的人类作斗争。……显然，在中国共产党发展中为了建设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国家(事实上我对新型这词的理解不深，有时看不出什么新型)曾经因经验不足而遭受过许许多多惨重的挫折，但是极其有幸的是使毛泽东与他们一群亲密战友更深刻地提高了领导艺术，接着而来的必是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人的脑袋。这恐怕是完全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自然，这一步骤对积聚六万万人的力量、齐整六亿人的思想步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是比较可以更弄得完美些，共产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概念往往在变迁着。……(接9 20日记)

1964·9·20

(接9 19日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方面的许许多多政策。……总的来说，一是多变性，二是变动幅度大。官话云“形势多变”，故“人若不随形势前进，则为形势所抛弃矣。”整个中国在中共统治下十五年来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矣。然天地之大，非区区三十五年可变化的。旧思想旧势力有极大之势力。凡人观察周围形势，须客观方能窥透其本质矣。如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富人之财产尽剥夺矣，数亿穷人翻身。……中共使中国贫富平均，对富人极少、贫人极多的中国来说，自然能获得巩固的政权。

1964·9·25

但往往自然或社会之发展相互牵制，往往非人力所能为。几万万受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一旦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成为自己的主人，就产生了巨大的生活动力，生产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了。但当实行全民所有制，要求在共产主义的思想号召下无偿地或报酬少的劳动，则又大大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以致于使生产落后。据我看来，在新政权取得以后的十年不到之中的生产直线上升，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觉悟还与社会所有制相合的缘故。但在以后的三年中生产上的失败是因为人民的思想面貌被估计得过份夸大，以至于所用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及上层建筑超脱了限制，发生了不合拍的情况，以致产生了经济上的巨大的困难……

显然能够全心全意遵循党的一切政策，献身于党的事业是很困难的。不是吗？千千万万由父母千辛万苦抚养大到十八、九岁的青年永远脱离了父母的怀抱，去到最艰苦的新疆——锻炼人的熔炉中——作原始的劳动与生活，千千万万人民所得到的只是刚能维持蔽体糊口的生活，尤其是年青的一代拿到的只是只能维持一、二个人生活的费用。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一个清道夫（当然

工龄较大的)工资差不多,千千万万家庭送出了自己年轻的儿子、丈夫、兄弟、父亲,在操场上练杀人本领。千千万万人已经历了三四年肚子半饱的日子,在穿着日用上也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千千万万高中生、初中生由于适应像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不是原先准备的实行工业化的形势而抛弃知识分子道路而投向农业啃泥土,千千万万在那里为争工分、争超产粮,千千万万工人在那里夺月评奖、超产奖……千千万万青年为被压抑对异性的兴趣而烦恼;千千万万……实在是痛苦的。

我坦白说,我绝对不知道究竟只有实行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华民族兴旺,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中国一千多万军队近几年来军队有增无减,大多兵士是超期服役的多,脑子里只有一个观念:打仗。举国上下在树立备战思想,大办民兵师在跃跃欲试。

政权,我时常想起克雷洛夫关于“青蛙找国王”的寓言,我并总是以此为安慰,在主观世界上需要阿Q精神,而在客观世界上亦须阿Q精神。

人是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的,我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如果共产党政体就通过上述话对我判罪、流放、督促劳动,劳动改造甚至坐狱,那我认为并不恰当。事实上,我对世界上的一切还是在极其幼稚的看法来观察世界的——我坚决地相信在我银鬓斑白的时候,不,甚至再过二十年,或者十年就会觉得我现在对世界的看法是多么幼稚。我现在的世界观还处在极其动荡的状况,坦白说,我在上面所写的一切东西也不是我的绝对真实的看

法，而往往是在变迁着，往往随着环境的不同，思想状况很快地变化，或者对某两种对立的问题分不清是非，往往一会儿这样看，一忽儿这样看，时常迷糊于两者之间。我实在认识得太小了。世界是多么辽阔、多么复杂啊！

我现在准备花一些时间了解一下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形势。……世人不明不白失去政治生命或躯体生命的又何止千万呢？

今天(9月25日)上了两节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为《资本家是如何进行剥削的?》通过对“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变成商品”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等问题的阐明，确实使我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坦白说，这两节四十五分钟的课也许比以前即使是花一星期一天到晚脱离思想的空头说教“为人民服务”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啊，“马列主义万岁”啊，“学习毛泽东思想”啊要有益得多。我和大多数同学都听得极为得意，深深为马克思美妙的研究成果所吸引。而相反，对枯燥无味的说教又显得多么贫乏。我坚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印象——虽然这也许要杀头的。

这两课使我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看透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臭的”，这一观念深深在我脑海中刻下了印象。“社会主义制度是香的”我还没有体会到，难道千千万万人妻离子散，千千万万人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人必须过三十岁的黄金时代再结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吗?……

坦白说，我实在弄不清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制度。

1964 · 10 · 10

我对英语正怀着狂热的爱。我现在处在刚刚到这个世界知识宝库之大门口开始窥视——贪婪地窥视那无穷无尽宝藏的时刻。我想即使觅宝者在通过艰辛万苦，觅到了一个放满奇珍异宝的宝窟时的心情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多。矿石机中传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拥有六亿五千万庞大数目人民的政权今天爆炸了第一颗 atomic bomb，如虎添翼，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地升了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显露其真正的锋芒。中国已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坐到同一座位上了。

1964 · 10 · 23

如果说：搞恋爱，看西方小说中国古典文学，看古装戏，看外国电影，听西方音乐，唱外国名歌，甚至溜马路、看橱窗，和朋友聊天、游玩，吹一下风、多回家将因为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共产党的忠诚而被斗争、被取缔的话，我弄不懂为什么多钻一些业务知识，也可能影响对共产党的忠诚程度而被轻视和反对。我相信，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劳动的分工是标志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历史愈发展，人类的社会分工将愈细密、愈繁复，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参加体力劳动已是必须的，我们必须付出五分之

一左右的时间于无谓的体力劳动，我想不出它对中华民族的兴旺有什么好处，千千万万(但占六亿人中却是少数)脑力劳动者必须抽出他们宝贵的光阴而被迫去参加体力劳动，这只能这样理解：要么脱离体力劳动会影响共产党政权的稳固性，要么国家过于贫乏，其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难道参加了劳动真会使自己思想不变质么(所谓变质便意为不忠诚于共产党)。

也实在不懂为什么他们不了解用人的有限生命去掌握科学的某一领域的完整知识要通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千锤百炼而形成，须要的时间多么宝贵。难道他们为了政权的巩固而不需要科学么。

1964 · 10 · 24

毫无疑问，中共在十五年中所有的建设方针并不多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五八年在经济上，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在思想上直接造成了三年的举国灾难。甚至从1959年起(大约)连产量也没有脸向世界公布了，反右有利于今后政治上对人民的压抑，但不能不产生消极因素，使大批知识分子丧失了发挥智慧的兴趣，不过总算过去了，中共在跌得很重的这一跤中得到了极大的经验，正在恢复起来，并齐整步伐发展。

——(在国棉五厂十二天劳动受到批评)。

1964 · 12 · 15

毛泽东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一个事实：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每个老一辈的革命家不能不按照自然法则的支配，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十五年来，有名的革命家如林伯渠、罗荣恒、陈赓、李济深等向人世告别了。因此，无论毛本人、或者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朱德、伍修权、陈云、林彪……都得成为过去。

1964 · 12 · 27

……我一直在想那条路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想怎样度过我的一生，一直在想……鲁迅以八十万字的杂文向旧社会投下利箭，而鲁迅现在若是活着，他将怎样呢？本来就是这样，对一切人物，雷锋，若不在二十四岁的年纪夭折，绝对也想象不到为成为六亿中国人的做人依据吧。同样如白求恩，要不是在抢救伤员中毒死在中国，而回加拿大，恐怕也绝对不会成为恰当的典范吧。譬如向秀丽、刘文学之类……

社会，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是玩命伤。二十世纪了，人类的脑袋已高度发达了，绝对是黑化不了的。

我发觉我是在向一个万丈深渊滑去。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的灭亡。

1965 · 1 · 1

今得一书《向科学进军》，妙极，妙极，准备好好摘录一点。我不能不再一次坚定地为自己立下誓愿：献身于科学。

我知道我今后的一生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即使如此，我决心努力。决不气馁，尽最大的力量来努力……

我完全相信我有能力致力于科学，给我学习科学的机会吧！我愿努力，我能努力，我一定把整个成就贡献给你——亲爱的人类。

1965 · 3 · 15

每周十小时毛选学习，一有空就学毛选，越忙越要学，现在越来越吹猛了，总有一天会成个什么样子呢？当然我不能不说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是有史以来空前的。他是一个头脑最清醒的政治家。他知道他的事业是几代、几十代甚至几百、几千代的，因此他乘还没有死，要求有千千万万个毛泽东来接替他。

他为什么如此强有力呢？因为他真正领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将他的事业完全依托在人类历史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劳动者身上。并且，这样做了。于是，唯有他懂得了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难以摧毁的，是无敌的。我准备学习他为什么会从满手满脸是污泥，双腿沾满牛屎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灵魂的美、灵魂的纯洁，而我为什么看不到？我争取要看到。

1965 · 4 · 3

有些人想学习又怕学习，星期日不敢看专业书，偷偷摸摸看。怕别人看见用功而被套上白专帽子。

整个星期天参加劳动，补衣服没有时间了。

1965 · 4 · 7

听王林鹤同志的政治报告。一个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革新闯将，一个反应很老实(是内心老实的表现)的宁波人。1947年当无线电厂的艺徒，是一个拥有老师傅的老板的十一个艺徒中的一个。老板和老师傅用英语讲，不愿讲授技术，怕砸破自己的饭碗。从晚上十点钟数到次日早晨五点钟还数不完一只电源方棚的高压绕圈。在三年学艺期满前被踢出去。

解放后有了读书的机会。在党的领导下进步。高压电桥的失败次数太多就在文化上吃了亏。三十岁读科技大学。

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工人阶级的大事情，是文化大权掌握到什么人手里的事情。

只要有一颗火热地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决心，我们就欢迎，而不管是否留过洋，出过国。

我们要一百之一百的懂，而不允许有百分之一的不懂。

1965 · 4 · 30

前天晚上开学习讨论会三小时，我第一个发言“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实验”。昨天晚上又开学习毛选交流会，我又发言。我在一切时事中花去了大量的时间，难道说：我的政治生活突然旺盛起来了吗？

.....

不过，跟毛泽东走下去正确的，有前途的。

1965 · 5 · 9

我好几个单位时间花在毛选上，甚至开了几天夜车，我确实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那天早晨跑了十二圈(赤了双脚)，几乎全班传遍了。

我处在 徨之中，我不知道那条路更适合。

申荣快入困了。

一切原状，一切又不知如何做才好？

如果每天许多东西在学习毛选中被遗忘，那末一生将很少意义。就为此原因，特地花五角二分买了两管电池，用来在寂静的夜晚中回忆、思索、探索人生的哲学。

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育是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本学期学的东西，不夸张地说，如果一概省去浪费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学习效率远不及一二年级。学的深度、广度实在叫人心酸。大学五年，学到的是啥东西呢？

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是有价值的，越上去越差。总算感谢上帝，教学改革来晚了二年，如果早来了二年，那我五年大学几乎等于白念了。

今年肯定要下乡，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个月的教育实习，三个月下厂搞革新等，意味着最多只能有半年左右纯粹的学习时间了。

同学们大多数已明确了这一点：社会给他们的总与他们追求的不同。大多数已经消磨了自己的壮志，大多数同学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硬要从表面现象去看，当然是看不到的。同学们大都开始将自己的心思放到如何为自己装架最美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上面去了。跑无线电旧货店几乎是疯狂的嗜好了。他们既然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爱好，只有唯一地将兴趣集中到这一方面。

毛泽东的改革是很困难的。他的事业将怎样呢？

1965·5·11

共产党尽管口里大喊平等一切出身的同学，但同时让工农子弟在实验上给了优先权。我要说，我们这几个工农子弟如果厚着脸去享受这种额外权利，内心是不安的。而其附近三十个同学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那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无声无息中。凌特别注意到工农子女受到的特别的宠幸。

共产党在执行的方法是团结和争取少数，孤立和打击多数。这政策将会对他们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由于这种歧视对待，百分之九十的非宠幸者将忘记被送入大学的恩德。

多数人根本是处在死心的状态，只求混个毕业。

我的思想并不是趋于明朗，而是逐步模糊起来。

世界啊，太难了解你了！我只能在你的错综复杂下面唉声叹气！

1965·5·12

令人伤心与愤怒的是，我几乎在一个月內，由于连续出黑板报，花掉了许许多多时间，起码有四、五个单位时间及四、五天中午休息时间及更多的晚饭前后时间，使我的学习大踏步落后，几乎好久没有好好复查一下了，只能将作业赶完成。

唉，困难啊，我们被剥夺了甚至获得充分知识的自由。读什么呢？

今天谈人民公社，又想起了七、八年前吃饭不要钱的食堂，而今落得遗臭万年。三面红旗一举出，三年困苦来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本学期七周的学习，全学年的学习。学些什么呢？怎样学呢？唉，当我看到那边挂着的“半工半读”牌子时，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我生活在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上海，它的生活水平最高。而我所得到的生活待遇又是最高之一的大学生待遇。我的大学又

最美。照道理，应该万事如意了。但我对现实却终是充满讨厌甚至愤怒之感。可想而知，其他人又将怎样了。

1965·6·18

今天下午政治报告中，小组长以上干部与普通老百姓被分在两个地方听。前者在礼堂，我们在小教室。这一点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激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造成的心理影响实在是不可忽略的。其中大约包括五、六名团员和二名工农子弟。……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划分人员？我不知道这一事情中学到一些什么，为今后的做人发生什么影响？

1965·7·1

工农出身的同学要坚决忘掉“自然红”包袱，决不忘本，弄不好也会做资产阶级接班人。不要变质。这一政策有利于无产阶级。

1965·7·26

我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我已成人了，必须换一付姿态去见工人群众了，谁能相信不久前在工人面前羔羊般地驯服的我，现在竟指挥起他们来了。

共产党在做什么？我总算今天第一次真正地有点领悟了。共产党是对的。要和共产党做贴心人，要和共产党走同一条路，有

同一颗心，这是我开始打定了的主意。对，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真正地懂得人世，而且只有共产党有改造这个人世的决心。

我懂得了：这个世界在需要好好改造。

我实在要充满感情地高声唱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真的，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一位大救星，实在值得中华民族自豪。有了他，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来世界列强欺侮的局面，自立于世界。有了他，中华民族恢复了自尊心。有了他，中华民族繁荣兴旺了起来。

我有什么原因阻碍我不前进，不跟共产党毛泽东走呢？他是强大的，他是巨人，必须跟他走。我很幸福。

我要充满感情地高喊：我愿意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献身到底。我要跟全中国、全世界红遍、红透、红深。我要永不忘本，永不变色，红透红透。

党啊，我要暗暗向你宣誓：我要做您最忠实的儿子。

1965·7·31

我不需要权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永远也不要有什么有驾驭在群众之上的倾向，永远保持谨慎谦逊的态度。我下决心多参加劳动，要拣最苦最脏的劳动来做。

1965·8·31

永远记住在我廿一岁的第一天许下的誓言。永远为穷人的翻身而努力!因为我是穷人。

1965·9·17

“我要永远朴素，在这一年半中，只要有补丁的衣服，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我越来越相信共产党了。我要推动这个事业前进而决不做这个事业的障碍。我们党的事业越来越兴旺了……

1965·10·1

团的大门尽管对有些人充分地敞开着，但对我来说，不知为什么狭得一条缝，太难进去了。我这人生道路上的极高的一步难以跨上去。它是多么地高攀，我有多少次在你面前低头叹气，望洋兴叹，望而生畏，知难而退啊。

我现在处在好似考大学等待通知前夕那种境况，那种焦急的心情不比那时稍减。

我既希望团的大门好进，但又希望难进，就像大学的门既希望好进，又希望难进。

1965 · 10 · 5

我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甘于现在所处的最落后最下层的地位，要求翻身，要求改变现状。他在顽强地奋斗，他已基本上付出了全部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在他上面势力如此强大，他们力图贬低他，因为抬高他等于贬低他们自己，对自己不利……老实说，在政治上还没有几个使我服贴的人。

1965 · 10 · 17

最近团刊与中国青年报在头条位置花极大篇幅宣传扩大团组织成员是当务之急。但是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坚决把我拒在门外呢？我究竟在那一点上还有疑点还未审查清楚。

总的起来说，人世是艰难的。当我中午午睡醒来时就会觉得做人十分艰难。

奋斗下去！我就不相信我不可能达到目标。政治上必须努力，而且这个政治是正确的，值得奋斗。

奋斗才不枉人生，没有奋斗也就没有人生。共产主义制度是好的，时代也只能允许我走这条路，奋斗，奋斗，必须奋斗!!!

1965 · 10 · 18

中国何日能走出这高高的困境呢？

1965 · 10 · 21

现在拼命揪住职工不放，要他们交待。钱不交待或交待少了就是工作做得不到家。我从来没想到搞四清会搞到这种名堂。有什么必要呢。白白浪费人力物力。

1965 · 11 · 1

但是又奋斗不起来，那份通报永远塞在我的那份应该烧成灰的档案里去了。

1965 · 11 · 5

看李的神态，他一定是翻过我日记簿了，那一切真的完了。人失去勇气去做人。

难道他们不考虑我了吗？他们这些家伙简直要弄得我急死了。

他们这样坚决地排斥我这个穷人的儿子，反映的只能是他们卑劣的心理。

1965 · 12 · 23

可以肯定，每个人在参加四清时，虽然得到一点思想上的所谓“提高”，也必然会失去一点政治上的原有的一点“锐气”。

王杰的成名在于他是班长而不是师长。

报纸上，拚命大力宣扬在我看来等于宣扬某一种新的珍奇商品一般。

1966·2·6

近观焦裕禄另一方面，确实令人感到，多年以来，当政者曾列出多少“英雄”，比下层寒酸之辈。毛主席云：无产者最愿变其地位。王杰、雷锋、麦贤得，一无名，二无利，赤手空拳……故忘我之辈虽多，皆仅限于下层人物。特别出于非党非团人物。然一旦他们踏上高官厚爵之路，他们身上的革命气息逐步逐步消逝殆尽。

1966·2·13

苦的永远是劳动人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前天我参加了一天劳动，在沉重的汽泵前在拚命。人生在这里才有一点意义，才被人的惭愧心理得到半点抵消。

1966·3·4

夜读丁学雷《为谁请命?为谁请命》，这是迄今以来文艺界人士最露骨的痛骂，而受骂的对象则是国歌的作词者田汉。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反正当我走在田野中，望着一群群人在机械般地耕耘时有什么感觉，是明显的。但，我对农村

了解还太少!这是令人 既感到遗憾又感到快慰的东西。不过前者的成分多。

1966·3·5

知识分子最值得怀疑其忠诚程度，知识分子中最易出修正主义，这一——这一小撮人时刻在各种程度上想颠覆这个政权，最易动摇他们的宝座，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很远的历史中的开国王朝里……

1966·3·9

即使入了团，老实说，我也是与组织貌合神离的，他们因我坚持保存日记而不放心——在此世上，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舒(抒)发我之真情了。

我的心境迷乱，但见前途一片茫茫……

我是自由主义者。我讨厌任何组织的约束。

我又是一名功利主义者，我为了个人名利不惜放弃我部分的自由。

我又是厌世主义者，我讨厌人世，粪土一切名利思想，看尽人间炎凉世态。

我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看到世人拼命争个人之眼前蝇头小利，不图国家大业，就十分鄙视。

在我前途上，这几条路并列着。还有更多的路并列着。我实在不知走那条路好。我也许走另外的脱离红尘之路，走享乐主义者的路，走……主义的路……

当然，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地方走什么路，做一条变色龙，这一路走走，走不通，走另一条路，另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路，交替地、反复地走，也许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1966·3·16

近几日我心情十分沉闷，我坚决相信，我一生将永远会沉闷，一回到师大，我将变本加厉地回到沉默当中去。

他们在利用我强烈的名利观念这一致命弱点，试图敲开我的思想梦区，进而在思想上击溃我。但我在权衡轻重后，终于暂时放弃了前者，宁愿放弃进攻机会来固守阵地。

1966·3·27

夜观《攻克柏林》，这确是一部很美的片子，它大概是我唯一选择了看两次的影片，当然许多很美的影片实在不少，可惜永远难看到了。《奥赛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生的权利》、《晨星》、《百万英镑》、《复活》、《三海旅行记》、《白夜》、《乡村女教师》、《三剑客》、《红与黑》、《她在黑暗中》。

由于美国政策的僵硬性，形成了中共僵硬的脑袋瓜子，难道将永远这样吗？

我这个青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应该说是……的！我们这一代青年在经受怎样的压抑啊！青年，青年！愈来愈控制严重。

1966·4·13

我很迷惘：给自己打怎样的一个等号呢？是的，我对这个社会曾有过危险的叛逆思想，现在怎么样呢？

在大前天（4月10日）师大作“突出政治”为题的整训，给蠢蠢欲归的学生打最后一次气，我本来不想作发言的，但在下午的讨论中还是发了言……总之，一无是处，苦闷时出去游荡，不配工作日当夜，李汇报给他们听了，次日下午与老杨又作了一次严重的谈话，老杨对我的对工作组“乌烟瘴气”的说法便说“如像58年的反右斗争中将立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要将过去的思想作彻底的暴露，你吃亏就吃亏在不肯暴露思想。”“你不要以为我们一点数目也没有，一点也不了解你的一些情况！”

“个人主义思想还不是很要紧的，对你来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可以检查自己的立场问题。可以挖更深的思想。”当我爽气地承认过去对党抱抵触情绪时，他大概是呆掉了。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我坦然承认了，他要我描述具体的情况，我说我过去早谈到过这些事，他表示怀疑，我是否已谈过了？！我说都谈过了，实在再谈不出什么了……”

总之，过去他在离开的时候总反复叮嘱了思索，而这次则非常特别，他很沉默地离开了，在最近百公尺之间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僵，他一言不发，我亦一言不发，就这样……

此心已灰矣！

1966 · 4 · 22

前日观影片“陈毅答中外记者问”，感人极深，这位军人外交家是硬的，反映了中国人的骨气。

1966 · 5 · 14

本月十号中国爆炸了颗氢弹。赶上了早在七年前就爆炸原子弹的法国，在全中国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看来这个时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斗倒“我”字，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但是面对着自己的暗淡的前途，常令人不寒而颤，回忆曾走过的人生道路，叫我难以做出评价：过去的路是值得肯定还是值得否定的？……我的反复无常本性与不稳定本性，能使外界对我建立了应有的警惕。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复杂使他们逐步形成了对我这种动摇者的警惕性与斗争方法。我应该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我不适合这个社会。现在的结局也是合乎情理的。也许将永远固定下这种状况不变。我无力改造自己使之适应这个社会。

世界就是如此辩证地存在着，世界各国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反而激起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决心，反而造成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相反，中国放弃原则图好日子，反而有朝一日再成为外国的殖民地，六亿中华民族的子孙就要做人的牛马。从这一点来说，我十分感激毛泽东，全中国每一个人也应该感谢毛泽东，是他缔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他唤醒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万分感激你，崇拜你，愿你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的繁荣全靠你，你是中国繁荣的象征，希望你永远活着，领导中国越来越向强盛迈进。

1966·5·25

自去年以来，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极其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许多所谓老作家、历史界权威之类甚至有权的学者的政治生活和艺术生命都成了刀下之鬼。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它把中国引入一条与全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带着不知所措、惶惑的心理看着它将如何发展下去。我很知道，在这场“革命”中，我也是罪劫难逃的分子。我这个在新社会成长的表现经济地位上、政治思想上应该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不多的，最主要的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受了很深很深的影响，很深很深的毒素，以至我难以抬起头来面对这个世界，

我总以忧郁的眼光面对周围的人群，我总是闷闷不乐，对同志总是冷冰冰，提不起甚至装不出一丝笑容。

谁知道这场“文化革命”几时开始来革我的命?!

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办不可吗?从此以后，中国将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除非征服这个世界。中国除了杂技团还在外国找到一点市场外，就没有一个地方了。当然中国为了换取外汇，拚命做火箭皮鞋出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点灯”的丑剧到处都是，又不许别人批评，只是要压服人绝对地盲从才罢。

1966·5·25

这几天闲得很，但又无东西可记，要记的又不敢记。

六一年以某人为首的邓拓、廖沫沙、吴晗等高级人物在不少报纸杂志中用杂文评论时政，老实说，他们是大胆，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思潮的。在当时几乎是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他们很乖觉，不去揭露他们的放肆攻击，而放到四五年后开始走向社会经济繁荣的时候来算总账，这并没有表明他们有力量。当然，要建设这样的混乱的国家也常这样做是必要的。

1966·6·2

昨天晚上猛传来消息：运动将延长到七月底……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较少准备的、特别是这两个月将搞所谓“思想建设”及

“文化革命”，我更是难以想象怎样渡过这难整的二个月。我宁愿打二个月铁，也难干这种角色。

今日广播云：北大七个哲学系的人贴出了一张声讨该校党委书记及副书记的大字报，看来，这一次“革命”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场斗争又将席卷整个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争的声势又将重现了，高校已出现停课现象，中等学校也是如此，也许这将牵涉到更广的面，谁能估计到下一步将再发生什么事。

1966·6·11

我感到一种狂暴的心情在袭击着我的心。

难道彭真、邓拓、吴晗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贺绿汀、田汉、夏衍、周信芳、陶雄、许思言、邵董麟、秦兆阳、宋硕、陆平、彭云、李琪、廖沫沙、万里、周谷城、杨献珍、翦伯赞……

前天晚上，我走进昏黑的储仓，坐在一条狭小的木椅上冥想，希望本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

我有权力藐视一切人。

1966·6·16

从头看到末尾，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文章与批判文章都给我一些感觉，我敢于说说自己的发自内心的话，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

我相信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可以看出，他们对现实是怀有极强烈的不满情绪的，对当前的朝政是十分厌恶的，对当前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刻毒的咒骂，无论是邓拓也好，周信芳也好，他们不能公开地发泄这种恨意，只有在杂文或戏里暗暗地骂骂，有时忍不住骂得十分厉害，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是懦弱的，像鲁迅他们的人物究竟少数，有多少鼠头獐目的人物的心藏着卑鄙的目的，但口是心非，口上拚命吹捧现实，吹捧当今，以求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爵。“人云亦云”，毫无骨气地盲目崇拜，我相信这类人越来越少的。搞政治工作的人有不少就直接对当今提出了直接的对抗，更不要说广大民众了。我相信“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恶劣影响是严重地弥漫着中国的。

邓拓那一些人的论点是否错，我不能肯定。这需要今后的社会经验来扩充认识再提出结论，我不愿在这里不说良心话：一些别有用心的批判者别有用心地拼命咒骂邓拓等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骂出最刻毒的词句，对他们的文章提出难以想象的解释和歪曲了原意的引伸。

我一个廿一岁的青年，就敢于对现实提出怀疑，我是一个血性青年，不是无聊的应声虫，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有魄力的刚强的人。

1966·6·25

无论是什么系的大字报，都把最高的所谓“学者”、“权威”批判得很臭很狼狈，简直有一脚把他们踩在地上的感觉。物理系的斗争目标放在陈涵奎身上，郑一善、章元石、张开圻后来跟上，几乎人人有！

1966·6·27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是电影《桃花扇》的一句引诗。近来，中国正在向史学界作狂热的攻击，中国几个有名学者吴晗、翦伯赞、李平心、吴泽等正在遭彻底的批判。

我很想研究历史，如果要我念文科的话，我愿意念历史（当然外文与中文我亦割舍不下）。我很想掌握数千年来古今中外历史的演变来洞察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社会。我所以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就是因为历史多懂了一点，但是我很情愿走这条路，为了走得更有意义更快一点，我要多懂些历史。

据说除“二彭”以外，陆定一、罗瑞卿、蒋南翔都快要滚蛋了。国歌的词作者，东方红的作曲者眼见得结束了政治生命了。

世道要大乱了，一切人在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中国人别的不会，“骂”和“棒”是最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中，现在这一段历史将怎样载入史册呢？

我是大胆的怀疑派，我一切都不怕，为了维护真理，个人的一切又有什么可考虑的呢？顶多是去打铁，拉粪车。

1966·6·29

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

我很悲痛，自从62年入学以来，读了两年安穩书，学到了一点真正的东西，但自三年级起就破坏了这种平静的生活。在生活道路上走的是朝三暮四的道路，前途，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每天被逼花两个小时读当今天子的圣旨——古今中外第一件如此暴虐的行为。

在当今天子的两侧，又有不少“功臣”要被杀掉政治生命了，陆定一、周扬往日何等荣耀，但却成为替罪羊了。

唉！我拼命在动脑筋写大字报，对那些人作人身污辱，但这有多少出自内心的呢？不这样干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6·6·30

看来，我们更糟糕，表面念五年书实也只念三年。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省力的，但对国家、对民族是不幸的。破坏一样东西是容易的，但建立一个东西是很困难的。

1966·7·3

我即使终身因不愿披露日记而不能入团，入党，我亦毫不怨言，这一点决不会损伤我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相反，由于自己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穷白面貌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将永远促使我革命到底。

1966·7·5

看来“兴文字狱”还算是好的，现在拼命在“兴话语狱”。凡说错话的都可揭发批判。平时话多的也就更倒霉。

周扬、陆定一、袁水拍、林默涵等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将被斩首示众。就是这样，他们在成为替罪羊。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现实的悲剧。

近观《燕山夜话》五集，有一则描写近来台湾萧条的景象。但……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兴文字狱”吗？

这些都是在图书馆的所谓“锄草室”里看来的。

1966·7·10

昨借得《唐宋名家词选》、《宋词选》等，又不敢公开看，昨晚在教室里看到十一时，今上午又看了一些，看了一又四分之一本，准备抄写几十首，许多词太好了，有“相见何太迟”的感觉。

最近看了二集《燕山夜话》及李平心的一些“罪状”，懂了一些东西。

秦牧的《艺海拾贝》已列入毒草。

近观作家协会、文联的一批元老的命运，已剩下不多几个没有被指名腰斩了。不少与共产党共过患难的艺术家的都落到了打入“地狱”的命运。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很欢喜雨。雨恨云愁，在渺茫的雨色中很能为飘渺的心情发生共鸣。

1966·7·11

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整个文艺界、意识形态界、文教科科技界进入了瘫痪阶段，当然也蔓延到其他各界去了，三年前这些部门相对稳定已又遭到了破坏，相反，三、四年前萧条的经济则到了比较稳定的时候？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走入稳定的状态，难道就是这样循环下去么？！

中国这次从上到下的大清洗运动看来是必要的，中国在国际上受到越多的刺激，越严重的孤立，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必然越担心国内发生的颠覆活动，许多曾是不可一势的宠幸者的颠覆活动在破碎，也有许多做了陪葬品，那些人自己也不了解罪状就被结束了政治生命，平时话多的人首先将被“腰斩”，心直口快的、有头脑的人都是这场运动的祭品，这难道还有终么？有的人只因为介绍了几个历史典故，记述了几个人，如果恰巧与现实相象，

就遭到攻击。做贼心虚此言是也。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大衰退难道不是一个在中国六亿多人，不，世界许多亿人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大污点么？要想揩也揩不了，越躲赖越暴露。我们这一代青年难道会忘记么？！

嗟呼！近几日我数小时钻在宋词堆里欣赏避世的词语。我愿终身飘泊于荒山野岭、青山绿水中，驶一叶扁舟，荡在碧波中。我对一切皆失去兴趣矣。对名利心已淡极淡极。

我知道我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实在迫使我向这条路上滑去，使我这个应该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失去对生活的兴趣了。我难道是不爱国、不爱人类么，不！真不懂道理么！懂得。我并不是反对党的，我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和救星，他们使中国人找到了失去几百年的自豪感，实在是无可非议的，只是我这个人吃不消这种现实，明知故犯罢了！

1966·7·12

今日中国人民大学七个学生的声音，又把中国文教史的革命推进了一步，要求只念二、三年大学就到社会中去。这一消息肯定将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中产生强烈的骚动。师大校内已锣鼓整天价响矣。理科学生也要求削减学制。

当然，这不算是最“革命”的，这算什么“革命”呢？要彻底“革命”，不如干脆打碎高校，立即解散大学到工农中去。

人大的几个“左派”学生，类者究者有几个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8年的“共产风”不是争了朝夕么？

我要看看毛主席怎样收拾这局势。

我实在弄不清中国究竟要走什么路。可以想象，中国在这样空前的浩劫中将会出现怎样局面。外国人评论云：这场清洗把中国带向更咄咄逼人的方面去，把温和的苗子斩尽了。但是，我请这些外国评论家相信，中国及世界最终终趋向温和、平衡。

郑一善留美六年、陈涵奎留美三年，许国保留德，章元石留法，他们这批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将被像垃圾一样被抛到废物箱去，恰恰走与苏联相反的道路。

他们不是加重脑力劳动的负担，而相反硬要减轻负担，从业务上脱出身来去“红”，去参加体力劳动。能解决问题么。我就是不同意，就是抱怀疑，我希望：

①加重脑力劳动者——学生、教师，一切脑力劳动者的负担，采取淘汰制，使体脑劳动都同等着力，不使脑力劳动者发生优越之感。

②减少和平衡体脑劳动者待遇上的差距，甚至逐步使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超过脑力劳动者。

③学生和教师与一切脑力劳动者都规定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须尽可能密切结合自己的业务。

④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但要重在表现，脑力劳动者要以德智并重。要工农入学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现在的学校中任何人进去思想当然会发烂。

.....

我想他们不会重犯 58 年的错误吧！再犯是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中国经不住再这样遭受摧残了。

那些连一点功课也吃不消，狂呼要打碎所谓文化桎梏、精神枷锁的“左派”，“革命”青年好汉们怎么能想象他们能在车间里与工人、风雨里与农民浴汗苦战呢？都是一批热得发昏的狂人罢了！

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我不是反共人物，并不仇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是希望劳苦大众真心得到解放。

1966·7·13

总之，骂这些“老不死”的老教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大草包、骗子是没有关系的，甚至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杀人魔王、牛鬼蛇神也绝不会有人批评你，相反说明你革命性强。这一幕剧难道不可笑又可悲么。

老实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全中国这批精萃人物受到这次痛击，那一天能恢复过去的情况，肯全心全意为这个政权服务呢？

他们硬是要工农群众在一天辛苦后坐下来灌输圣旨，恨不得他们不要喘一口气，就怕他们变心，但结果终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发展科学，减轻工农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而对脑力劳动者则相反，大力削减工资，增加科研学习任务，应该把人类的生活从低拉向高，而不要从高拉下低，但过高的也要削。

现在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信任”、“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谈“无限迷信”呢？今后看来，每天要读二小时以上的圣旨，是的，干部、知识分子整天学毛选，但工农对不住，照常劳动，业余时间学毛选。

今后将成为什么世道呢？可以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言必论圣旨，看必是圣旨，听到的必是圣旨，到处是圣旨……

中华民族今后将是怎样的呢……

1966·7·14

中国正处于迷惘中，这头巨狮是醒来了，但不知所措地徘徊着，怎样走呢？到处都是陷阱。

“中国是最喜欢追求真理的”。我的这一句没有政治性的话看来引起杨燮龙的兴趣的。

我已经暴露够了自己的“思想”，甚至逼迫说：“我是对现实发生不满的，对党的方针是有过抵触情绪（特别是教育方针）。

但我实在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到这样地步：“想欢迎蒋介石来。”这是我非常真实的表白，但他们就是不满足，又有什么办法呢？

终身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味道。……那时人为了生存，就不能不为生存，而这是群众觉悟不高么？不！是干部觉悟不高么？不尽是！最根本的还是犯下了一个极左的大错。有点良心的人都是看得到的。有些人说些真言，功劳再大也被削职为民了。

我看了无数张大字报，什么姚力啊、王亚朴、刘佛年、李锐夫啊……对我今后的做人懂了不少道理。老实说，大字报对统治者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正是成事不行，败事有余。……

碧天白云，炎夏开始了，我常凝视着长风公园前密密的高高的垂柳，校园中各式奇花异草，这可以说是人间仙境了吧……我希望能拍几张照。

1966·7·18

唉！中国搞得越来越不象话，会见风使舵，会拍马奉承的都越来越有势力，稍有一点与上面出入的都被扼杀了政治生命。昨天我见最近《数学通报》、《英语学习》等前半本，都成为政治性文章了。先是一篇“圣经”，再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据别人说，《大众医药》、《无线电》等等一切杂志都是这样，甚至每篇文章都用上了“毛泽东思想”。……可以想象必然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任何古今中外的、文史的、理化的、医药的、文化艺术的、戏的……东西都要充当“圣喻”了。本来

“毛泽东选集”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价值的。但这样一来却使之庸俗化成为“陈词滥调”……

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966·8·7

近一星期来竟天天气温 38℃左右，汗一天到晚不停的留，以致我对回家放弃了。

天时不正矣！明即立秋也，竟如此炎热滴水不下，终日赤日炎炎，时常万里无云，即使坐着不动，汗也如注，现在写这几行字身上就是汗水淋漓……

人事亦不正矣！

那日（指八月四日）那些六七十岁的老教授遭到了一次古今中外耸闻的肉体摧残，事情看来是这样发展的……（下详细叙述了八月四日在师大校园批斗老教授的全过程）

1966·8·9

形势很乱。六日下午听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的录音报告，了解到北京高校更乱。

昨晚，16条公布，看来概括了录音的内容。

他们已决定让我们自己去乱搞一通了。谁也不知道将搞出什么名堂，反正将是一塌糊涂。老实说我逐渐对这个政局在失去兴趣，本来还想为了自己的出路来求他们，而现在，如果他们在将

来要我控诉对“旧”教育制度的愤恨，我一定比较彻底地暴露自己，我一点也不怕。

他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将走绝路，作茧自缚。

许多跟着他血战的好功臣一个个被罢免削职为民，或者做一些闲职。

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繁而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合他们的想象。

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他们叫打破一切框框，但事实上下了一个最辣手的框框。

如果再执迷不悟(看来极可能)那世道将更乱下去，历史将倒退。

可叹，四千年的文明将丧于一旦！

文件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可惜，老教授们已吃了许多拳头了！

秦始皇“坑儒焚书”的劣绩、千古难消的恶孽在二千年后的今天重现了。一切书店图书馆已禁售、禁借许多禁书了。我知道过去的发展趋向是这样的，但终很难想象，不料今天成了现实。

1966·8·17

十二日在复旦，我还对冯志祥说常(溪萍)的好话，不料十四日晚回校我惊呆了。常被揪出来了。我捧着钢精锅子看了半夜大字报。全校沉浸在动荡中。半夜仍人群不散。

呜呼!曹荻秋要睡不着了，杨希康也被点名了!

这一次搞过后，要使他们触目惊心!吃这口饭难吃啊，走上了这条路有什么好下场呢?

* * *

8月4日事件后的三四天，我们被命(8月7日)在师大一村、二村巡逻，实际就是防止有人自杀，我就整夜坐在吴泽的小洋房门口.....

死不得啊!为什么要死呢?既然坚信自己的信仰，为什么要死呢?

1966·8·19

总之，这场“革命”一结束，中国将出现最黑暗的时代。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黑的，但它象征着光明立刻将要到来。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国际国内的人们越来越对他失去信任，少数只看鸡毛蒜皮的鼠目寸光的人也许一时

被迷住了心窍，但广大的知识分子的耳目别想遮尽！这场“革命”被埋葬的时候不远了，现在已在奏出序曲了！

1966·9·3

（前天上午七时半，北京红卫兵去市委前静坐，要求曹接见，我昨天零点30分起床到校门集合，去市委慰问他们，整整在市委门口坐了九个小时。

我坚信我是对的，我们是全胜的，我回忆了自己一贯以来的世界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出自何种动机？！

我感到十分悲愤!!!

……经过激烈的行动后，我又照样回到空虚的生活、空虚的地位中去！我在这样的社会中，受不到任何一派的欢迎，我加入任何一派，都被这派因此而感到遗憾，认为我玷污了他这一派，这是很可悲的事，我看到我今后的一生的基本轮廓。

1966·9·15

现在我真是心乱如麻，在七时多去准备列队参加接受毛主席接见时，我被逐出了队伍，也就是说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了。这才是我一生真正的转折点，年级里赶出的都是黑五类的最不良分子，我班是我和协大祥小开孙维强是唯一两个被逐出的。这是第一个十分明显的迹象。我知道我一生已是完了。怎么办呢？……躺在宿舍里等他们一天回来……

现在下午二点多吧，一直是热闹嘈杂的北师大像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了灭亡前的恐怖，我的心完全像死灰一样灭亡过去了。天气十分好，北京几天来总是万里无云，风和日丽。

我还热爱人类，热爱世界，为什么要不得不离开这个人类，这个世界呢？

1966·9·20

晚十时半至沪，回校，次日回家。母见我神色不对，曾对我云：汝弟一回来就呼：“姆妈妈妈，我见了毛主席了。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我大惭。

又问我是否是红卫兵(弟是红卫兵，他班十二人)？

我大惭。

晚，父回来第一声，问我见了毛主席乎？

我大惭。

1966·9·21

晨回校，又写信给红卫兵。十时许，范令我去呵责我，命令我不许去京见毛主席。他们对我真的动怒了，因为我对他们提出了抗议，而且为阻止我见毛主席事，骂他们是混蛋。他们自然咬牙切齿恨我。

苏最后应我问：“我今后怎么办？”时答：“你一方面要触及自己灵魂，要交待过去的一切。重做新人，另外则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于是乎！我知道我成了这次政治大屠杀的陪葬人。

1967·4·16

1959年，用林彪取代彭德怀，把枪杆子握上了，这是一个关键！

……约在1961年起罢！在全国掀起学毛著作的高潮，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种运动在林的推动下，几年来一天也没停止过。而且一阵一阵加紧……

现在，我疲倦了！本来，我是完全可以从此卷入到政治生涯中去的，这场赌博中，我从一个欠了许多债的穷光蛋押了一大笔注以后，一下子翻了身，可以把注押上去，也许再可多赢一些，但是我退了！

1967·4·30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是一致的。

国家现在是怎样了呢？

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究竟如何来评论目前中国发生的这一大动乱呢？

我这个人啊，实在太难适应这个社会了。

人们劝我不要写日记，否则要丧失一生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

一个人不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偏要逆自己的观点去写东西发表，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我发觉报纸上往往都是吹牛的。报纸是来灌输某种观点的——这种观点往往是真理的反面，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那些舞弄笔杆子的秀才们真是有办法啊，他们有本事把死的写成活的，活的写成死的。他们实在是高级吹牛说谎家，高级骗子手罢了！我正是做过这类骗子手呢！

毛在十年前划了五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几十万的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街道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班无赖、流氓小人则反而上了台，这是一个大大的玩笑，聪明人倒了霉，聪明人都倒了霉……

我冒杀头开除的可能性写下了上面的这些东西。谁偷看到如果向上邀功请赏的话，将是一笔好收入罢！一个无辜的人将被打下去罢了，但千万个人是会跟我走的。

1967 · 5 · 22

几十万大学生、几千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着光阴，更有几万万人在消极怠工，这一次起码逼死了几万条人命，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

书信摘抄

王申酉

编者按：这是王申酉 1976 年写给女朋友的信的摘要。

我十分低微，绝不敢狂言我追求什么伟大的事物。但我总感到人应凭信念活着，应该追求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我不但需要耗费自己一些精力，而且必须求得自己的终身伴侣的理解和同情，当然我不要求对方同样沉重的负担，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只要求在我全力以赴追求有一些价值的东西时，你会对似乎漠视你的幸福的情况抱原谅的态度。如果要求我有完美的、健全的学识，要追求人生有价值，又要我沉溺在琐碎的小事中，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莎士比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说：“……天生注定了做乞丐，空虚的草包倒穿戴着富丽堂皇……”我一生早就注定了宁愿选择做乞丐，也不要富丽堂皇。

我绝不是什么天才，但像我那样想勤奋生活，有着狂热的进取心的人，在现实中会落到好的下场，那倒是不可思议的。我自信自己是为了追求超越于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像知识、真理、正义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我现在的命运实在是我原先想象中的最佳命运了，我对自己命运丝毫不抱悲伤的心情。

我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辉煌的“前程”，没有体面的职业，没有洋房、财产，甚至没有最起码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如果有一点脱离实际的学识吧，但过去我只关心自然科学方面，关心人类在取得对控制热核能的成功方面的进展，关心电子

技术在工业控制方面的成就，关心无线电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新应用……后来，生活迫使我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使我对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产生起浓厚的兴趣，头脑里不断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命运，关心西欧共同体和东欧经合会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关心中国在世界贸易事业中的经济地位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而所有这些既不会给我带来名誉、地位，也不会给我带来财产、利益、更不会给所爱的女子带来任何利益。你周围的人们将会惊讶你的选择的。

人总得付出一种代价，但只是在我们想到这种牺牲会带来崇高的成果时，我们就会甘心情愿地付出这类代价。

我要说，如果在十年前的我碰到了今日的你，那我们在这一点上会有很一致的看法，也许我在对人与人关系看法上更比你悲观得多（虽然当时我还未遭厄运），那时我一心想逃脱这个世界，什么四大皆空、做和尚之类念头很为浓厚。但我的奇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特殊进取性格使我在五年前彻底抛弃了这种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大丰那一年多艰苦的生活真正挽救了我的灵魂。你现在是无法理解我在接受一种新世界观时的狂热兴奋心情的!!!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了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巨大精神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创造出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可惜绝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一点。从此以后我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现象换了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境

界。我想它会把人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我第一次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有规律性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唯一准确的理论。是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说真正变成了一门科学。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才以被真正理解。

从那时以来，我试着用它来分析观察一些问题，深感是准确的。其间也读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其中有攻击、贬低的，还读了不少西方政客的书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仰，反而加强了这种信仰。确实，西方提出的任何社会学理论无法与马克思的理论匹敌。相反，西方不少真正还带些学术气氛、态度客观并正视现实的学者——其中包括最有名望的学者——都无法否认马克思理论的光辉价值。

不论我怎样解释，你总对我在政治动机上抱误解。一开始是那本《兴亡》一书引起的……你表示读了这类权术、手腕的书，可学会一点防身、处世办法，可在人世间少吃一点亏。而我是把它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纳粹德国的历史来读的，里面有大量价值的史料，但此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的视野不广、眼力不深，似乎把历史看成是英雄们头脑的创作作品，他并没有把历史事件的展开深入到更深的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根源。这样的历史作品不会深刻，与一百年前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比太逊色了。至于书中提到的种种权术、奸谋，我

们根本不去重视这种政治斗争方式的本身，更绝不想为自己的行动寻来任何借鉴。相反，我们抱极憎恶的态度。我们认为某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方式归根结底也是由那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重要的并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而是产生这种方式的物质原因。我们正是期望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变更，使这类人与人极残酷的斗争方式永远从人类历史上消灭掉。我们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与这类斗争方式是绝无联系的，我们本质上是光明磊落的，深信自己信念的正确性，根本不需要采取什么阴谋、权术之类来玷污自己的信念。

你不应当把野心家的帽子乱套一个人头上，轻易受舆论的骗。这是在政治问题上抱的低级和幼稚的观点。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及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这段话非常深刻，请你深思。这儿我想起了东尔尼雪夫斯基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们感到亲切；……”他是从被监禁的要塞中写的。像这样的一类人绝不应用个人野心来解释他们的动机，而应用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来解释。

你曾谈到我“懦弱”的性格问题。我想引证一下马克思在1852年因他主编的《新莱茵报》被审判而出庭作的辩护词中的一段话：“至于我本人，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

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都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牺牲。”还要我补充一句话吗？不需要了。

——以上摘自 1976 年 7 月 10 日给 S.D 的信

我是属于历史的人，我想谈谈从什么意义上这样说的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只是西欧才从十四五世纪第一次摆脱中世纪这个禁锢精神、阻碍物质文明发展的黑暗时代，从此它就开始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中心。人类一旦摆脱了这个黑暗时代，就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推动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无可拟的物质精神文明。

但中国却一直为它自身固有的传统束缚着。当世界其他地区进入新的文明之后，它在近几百年一直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之外。这儿有二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历史性的：

中国二千年封建主义的、并且是东方专制式的历史传统，其历史的惰性作用是可怕的。二是地理性的：它处在世界地理上与近代文明的发源处最远的地方，而且其中又为最高的高原及一大批原始国家隔绝起来（美国虽在地理上距西欧远，但它是几乎

全是西欧移民开拓出来的，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

只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大炮轰开了缺口，中国才像马克思所描述的，仿佛像木乃伊那样在接触新鲜空气(指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后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开始第一次从沉睡中动荡起来，开始逐步脱离落后、愚昧与原始的状态。社会提出了变革的课题，甚至像镇压了 1898 年戊戌变法的近代中国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也不能不在 1905 年实行假维新。至少她允许人们自由出国留学。她没有料到这就为中国造就了现代史上一大批革新人才，满清王朝这具政治上的木乃伊正是在这批人带进来的新鲜空气中解体了。本来中国可能在新鲜空气中健康地再生的……

然而，历史是曲折的，中国又被禁锢起来了，一切生机被断绝了。不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何况时代不同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或早或迟发生。只有将人类历史进程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人的生存才会有它应有的价值。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是属于历史的人，我们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关心注意我们在现存环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显然，我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我生存在其中

的具有短暂历史性的、属于地球偏僻一角的地方相适应。……我深切地感到我所经受的一切个人牺牲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被有思想的人们所理解的。我对自己的过去没有什么可懊悔的。甚至对已遭受过的厄运也并不感到难过，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感激这种冲击。因为像我这样狂热进取的人，不受一点挫折，在这种社会里必然会遇到更大的灾难，那时才会真正毁灭自己。这次冲击真正挽救了我，使我按另一种思想方式考虑，真正接受了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使我一生发生了转折，使我有可能会顺利地度过一生。当然，我今后必须像你那样谨慎地生活，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地前进，这不是使自己陷于污泥之中生活，而是为了有更好的条件跟上时代的步伐，把自己造就得更完美起来。请你绝不要陷入到那种庸俗的见识中，以为喜欢读一点历史、哲学书籍，关心一点人类前途命运的人就一定想卷入到政治漩涡里，我不知要反复几百次才能使你相信：我与那类想在政治舞台上像小丑表演的丑角是完全隔绝的，我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就厌恶政治斗争了。你应该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确有许多人是用剑来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同样有许多人是用笔来推动的。每个人只有在符合时代需要、同时又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及个人的能力特长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正是在这种畸形的社会里，关心一点哲理，关心一点人类与社会的进步与命运这种人类健全的心理会变成被人们诬为不正常的心理。造成旁人的恐惧心理，你不是熟悉《怎么办》里薇罗其卡的母亲的个性吗？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政治生

活毫无感受能力，停止精神上的思索，陷入麻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完全堕落为这类人的。我青少年求学时代曾接触过不少有气魄、有才能、有进取性、有思想的青年，他们思想十分纯洁，富有朝气。一踏上社会还感到不适应，但多年下来，在精神境界上完全变了一个人，从许多人身上可找到薇罗其卡母亲的影子，陷于极其庸俗、浅薄的污泥之中，变成十足的社会动物，他们心目中对“幸福”两字的理解是十分浅薄的。我如果意识到你只懂得在我们周围的平庸、浅薄的污泥般世界中的“幸福”的话，那我早会主动与你分手了。正是深切体会到你的意识形态中有着许多不平凡的、高尚的因素，我才有勇气从你身上追求幸福。我期望与你一起做真正的世纪同龄人，能摸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不要以为一个人生活在 20 世纪就一定会有 20 世纪的思想。

上一封信对我们的共同生活前途描写得灰暗了一些，我想应该把未来设想得光明一点。除了我们精神上我相信使你完满、高尚起来外，我也深信在物质上能使你享受到 20 世纪的现代物质文明——而并不是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都能享受到的。我期望你目光放远一些、深一些，我感到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对现状完全丧失了希望，我深信自己的思想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被社会自称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你必须彻底抛弃旧的传统观念才有可能与现存社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人的标准，也才会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愿意在真理面前抛弃谬误的人，你总有一天会完全接受我

的世界观的。并且你将会相信，我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坚定信仰得出。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想以我的行动去触犯现存制度，但信念是无法动摇和改变的。你要从几十年的漫长前途来看、从全人类的命运、从人类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要尽可能摆脱了旧的传统观念给你思想的束缚，这样你才不会把真正的幸福看为牺牲。

——以上摘自 1976 年 7 月 16 日给 S.D 的信

那时我的心中几乎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心沉浸在对人类社会真理的探索中，心中完全是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前途。每天都有思想上的收获。可以说，在这一年多中我真正树立了坚定的世界观，并且我的一生志趣与世界观一样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从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入到社会科学，深感现实社会对我们这代青年提出的社会任务绝不是搞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

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制，我是一头坚强如钢的雄狮。

巴尔扎克说：“逆运不是性格的试金石吗？”其实这话远不全面，顺利更是性格的试金石。

历史上有无数例子，当一个人，一旦拒绝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对自己的意见，他就开始进入堕落的过程。他们必然被

一群阿谀奉迎之徒包围，与真理、现实隔绝起来，这意味着毁灭的开始。

这表面上是她思想里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我与她的恋爱关系上，但恋爱既然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不能不带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烙印。诚如马克思认识到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恋爱悲剧往往是社会悲剧的缩影和反映，恋爱、结婚归根结蒂是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的。像我这一类把生命的过程看作为热忱地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的人遭受这样的结果是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在文革前，我把精力全心全意付在自然科学高峰的攀登上，可能说是竭尽全力、狂热以求了，只是现实使我逐步想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使我考虑起社会问题，考虑起我这条路走不通的社会原因。文革中，把我走这条路的最后希望毁灭了，使我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命运感到绝望，终于使我从政治上去考虑现实社会的本质。这个社会专门压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尤其在较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从原先的感性上升为理性认识，才理解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正在顽固地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属于生产力范畴，直接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我的悲剧完全是社会的悲剧，绝非我个人的悲剧。

确实是马克思的理论像明灯一样把我的思想从牢牢的思想枷锁中挽救出来，使我能摆脱环境加在我思想上的锁链，开始从广泛的历史角度、全球的广泛范围看待现实。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我们的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属世界上最原始、落后的一类，这是任何一个没有偏见，抱着客观态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考察社会必然得到的结论，这个社会只有把自己和外界尽可能隔绝起来，才能维持下去，它对外界抱着致命的恐惧心理。

我从来没有指望过我这一类人在现实社会中会有什么好的下场，甚至在受得冲击前很久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本性与现实社会是不能调和的。人格污辱、酷刑、牢狱、流放，我都遭遇过了，现在的境况实在侥幸。老实说，完全可能终身流放到一个山沟沟里，……不会让我过舒畅安逸的日子的。尽管我小心翼翼，确实不搞阴谋，但我不能担保我今后一不会遭飞来横祸。我从思想上、体力上作好终身吃苦的准备。我在体力劳动中，一年四季赤着双脚，我一年四季用冷水洗澡，不论是三九严寒，亦是如此，硬是折磨自己，磨炼意志。

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肯定要到来的……

然而在我国现时条件下，一切建设性机构都麻木不仁，瘫痪无力，唯有镇压机器在高速运转。故任何鲁莽冒失的举动都丝毫没有意义。

我已经说过：国家没有前途，我们就没有前途，我们凭直觉深信我们代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意志永远是坚定的，精力永远是旺盛的。

当然，你与你家庭的恐惧心理我是完全理解的。这二十多年来始终是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度过，每次运动总意味着大批的人受政治迫害，使人们产生了对政治的恐惧心理。这种局面

是不可能永久这样下去了，而且我深信很快会结束了。……那有一个国家专门狂叫越乱越好，拚命制造矛盾、鼓吹斗争的！

人总是要死的，活着总得为什么，有某种信念……我也是不注重物质条件的人，只要心投意合，一起住茅棚，一生也高兴。心意不合，住洋房花园，一生也没什么兴趣。

在我们看来，精神生活远比物质重要（很高兴，你也有这样的人类志趣，仅这点我就崇拜你了！）在我看来，在这几年中多看几百本书，使自己的世界观奠定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并学习了几门外语，要比多拿几千元人民币更有价值。

——以上摘自 1976 年 7 月 31 日给 S.D 的信

其实我与自己的知心朋友们都确定了这个办法。即使我们的世界观在将来与变革后的社会调和起来，也决不做空头政治家，而是要以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身份加入社会生活，这样自己的政治命运才更牢靠。我们都坚信我们所受的一切政治迫害一定会平反……。中国目前的不正常状态终究会改变！

我比同年龄的人略胜一筹的是外语能力。英、德语已可能使用，日语须加工一下会很快的作用，俄语勉强也能用一下。我深信自己的能力，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摘自 1976 年 8 月 1 日给 S.D 的信

你怎么不理解一个人人类感情的伟大真理：“真正的爱情是把整个身心去爱，是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和追求，它决不可能是那么冷冰冰的。如果一个人在爱情问题是冷冰冰的，怎么能够想象他对工作，对于同志和朋友，是十分热情的呢？”

这段话是《人民文学》1956 年 7 月号在关于文学作品的爱情描写的讨论中秋耘文章中的极有教益的几句话。当时的政治气候还允许他这样揭示这条真理。但他接下去双手一摊，感叹地说：

“很难理解，然而不幸却是事实，在描写热情的深度，爱情的力量上面，我们今天的作家和诗人似乎比封建时代的陶渊明还胆小得多。”下一段话更值得你我深思：“如果在生活里爱情问题确

曾经引起过某些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并且因此而深深地激动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表现了人们的性格，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在文学作品里回避这些描写呢！”

这些论点才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舆论。而现在，在这样折磨人的精神的政治空气中，诚如你说的，人们间世态炎凉，相互间关系残酷，唯有爱情有可能不陷入这类精神锁炼中，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向对方赤胆吐露自己的全部衷曲呢？

虽然我生命历程并不长，但恐怕全上海未必有一个青年像我那样饱尝人世间的甜酸苦辣，像我的人生经历那样复杂、曲折。我确处在社会最低层上，仅仅因为我坚信：“最主要，在高处的事物不一定就高；在低处的也不一定就低。这是大自然这部伟大典籍教给我们的一条明训。”（狄更斯《在美国哈特福的演讲词》）从来对一切横逆持藐视甚至讥笑的态度，对一切攻击污蔑若一阵微风，毫不所动，最多像蛛网一样抹去，从来也没有让其阻挡我，反而是推动我探索知识的真理，努力造就自己的步伐。但也正因为遭到一些庸俗动物们的污辱、伤害，使我养成以感伤、警惕的眼光去看待世人，总是以天真的心理惊奇：这人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坑害我、作弄我、出卖我？

——以上摘自 1976 年 8 月 8 日给 S.D 的信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再得说明一下，你总对我未来表示恐怖。我早反复讲了，我本来就无意介入政治，我的问题绝不涉及集团

性质。自从读了一点社会科学书籍后，更从理论上、科学上深感搞政治冒险，极无意义。像我这类人，我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我根本不应当与政治斗争——无论从我的能力上或性格上。我只求能保存自己本身就有社会价值了。由于我的精神世界多少超越于同时代的青年人，也被裹夹到政治漩涡中去过，将来能用自己的学识与文笔把我们这代青年的生活、思想、斗争忠实地描写出来，使下一代人从中吸取教训，生活得比我们幸福、愉快得多，那我的生活也就算发出最大的光和热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正在患难中不少有思想的朋友们还深切关怀我的原因。

关于你对我问题和前途的顾虑，我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话：这确实不是我的责任。中国目前司法机关极乱，公检法一把抓，许多犯人一关三五年无人过问，人身没什么法律保障。像我这种情况，是无数社会悲剧中的小小例子，他们这帮吃闲饭专事害人的家伙不好好考虑解决别人的问题，落实四年前的政策，反而把责任推在我头上，我确实怨恨你为何连最起码的信任也没有。……说不定今后这些家伙也会在你脸上抹黑，——你唯一的罪过就是在了解我底细后还与我谈恋爱。但我的历史是会有真正的见证人的!!!关于我是怎样一个人，唯一可靠的就是那三个“历史结论”，会永远保留在我的历史档案上，我已向你彻底露底了，我并不认为是罪，有思想的人认为这是我价值所在。

——以上摘自 1976 年 9 月 2 日给 S.D 的信

给女朋友的情书

王申酉

(1976年8月14日)

S. D:

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在相识的第一个月内，尽谈严肃及使人忧虑的东西。本来现在想好好集中精力，谈谈世界观、信仰之类问题，但双方情绪紧张了一个多月，睡也都未好好的睡，吃也都未好好的吃，陷于没有必要的自我伤害之中，再谈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神经肯定紧张，而你读时也许也不会轻松。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当然，这个问题是需要谈的，谈了后可能使我们的感情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共同基础上。

今天这封信专谈音乐问题。

我写这个题目目的在于激起你对音乐的兴趣，希望你多欣赏欣赏音乐，把心中一切愁闷自然地消融在美妙的乐曲声中吧！

音乐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音乐与其他一切文艺形式一样，均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音乐与国家机器法律、观点、道德观点等等其他上层建筑形式有所不同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有一些极其优美的文艺作品甚至在人类经过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后，仍没有失去其艺术的价值和魅力，例如西方奴隶社会产生的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贝德隆》

等作品就是例子，直到现在仍然深深打动着每一代人类的心。马克思对它极感兴趣，也能长篇地背诵它。

当然，也不能像《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的作者约翰逊所说的过了头，以致超出了界限变成谬误：“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兴起来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人过去了，但是人类所能做的只是把荷马史诗的事件重新安排一下次序，重新给他的人物命名，变变样子说出他的思想感情，此外就很少有其他内容了。”

不，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形式也随着发生本质的变化。绝不会是荷马史诗中人物改改名字、重新安排事件先后的问题，而是事件的内容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荷马史诗的文学价值永远没有失却，但其作品思想与现实有本质差别的。

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制约的。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本身在经济基础的制约的范围内有着独立的发展规律。尤其像文学艺术、音乐等等领域，其独立性更明显。而且，如果说在人类的历史刚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类属于人类精神生活范畴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话，那么随着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这种关系就似乎愈来愈远，以致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某部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要经过十分仔细地研究，才能从产生它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根源。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这样，那么音乐就更是这样了。音乐在人类的所有精神财产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与社会的物质变换方式相距更遥远。在人类刚有音乐生活时，看来是与劳动直接相联的，开始是吭唷吭唷的劳动号子，以后是模仿劳动的各种舞蹈。这在原始社会里是正常的现象。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类粗野的音乐早随同那些粗野的生产方式一样成为历史陈迹了。音乐按自身的规律在迅速发展着。许多具有高度魅力的音乐作品在对人类产生影响的持久性与广泛性上也许比一些文艺作品更甚。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到音乐时，提到它“不表达这一种或那一种个别的和一定的欢乐或忧伤……而表达的是欢乐、忧伤本身……没有任何附加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引起那样(指欢乐、忧伤)的动因，……没有按照理性地框进到日常存在的目的关系中去。(《世界是意志和观念》)

这里主要指标题音乐，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这段话是有一定的真理因素的。文学艺术总只表示一种具体的欢乐或忧伤，而音乐可以表达欢乐、忧伤本身，它把人类一切欢乐、忧伤的情感中提炼出精华的、本质因素，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这就使它比文学艺术更具有高尚的普遍性的特点。奥地利音乐美学的代表汉斯力克在《论音乐的美》一文中说：“音乐的内容——即运动者的声音形式”，它“与任何陌生的、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都没有关系。”当然，关系是有的，只是更集中、更抽象、更完美。“音乐是世界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音乐比任何其他人类的一切精神财产更有理由被称为是“世界共同语言”，而且是人类一切精神财产中最高尚的、更珍贵的财富。

“音乐这种艺术比其他艺术更能抓住人的精神，……统一群众的情感，使无数人的意志一致。”一位法国政治家曾这样说过。

“我鄙视这个世界，他们不懂：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我没有朋友，我必须孤独地生活……我毫不为我的音乐担心，这决不会遭受厄运；谁能了解它，谁就能超脱寻常人的难以摆脱的苦难。”（贝多芬《与贝蒂娜的谈话》）

“艺术能联合人类，尤其能联合真正的艺术家们，……”（贝多芬《给恰茹皮尼的信》）

当然，著名的音乐家在他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往往是有一定具体的内容、目的的，甚至连无标题音乐也没有例外。如，贝多芬的无标题作品《第十七奏鸣曲》，有人问他表示什么意思，他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啊！”

“当我获得了一个意念，我就以全力按照艺术的规律来苦心推敲，把它表现出来。”（海顿）

“我不会写诗：我不是诗人。我不能巧妙地运用区分明暗的笔触；我不是画家，我不能用手姿来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不是舞蹈家，但我可以用声音来表达这些：我是一个音乐家。”（贝多芬《给父亲的信》）

“我为什么要创作?——我心中所蕴藏的思想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才作曲。”(贝多芬)

“我认为我不应该写作没有充分感觉到的东西,那样做就像说谎一样。音符难道没有像文字一样明显的含义——或者甚至比文字更明显的含义呢?”(门德尔松)

“作曲家能够把每一种生活状态翻译成音乐的语言。”(舒曼)

但是,当作家一经用音符表达出来内心的喜怒哀乐情绪后,作品就有了普遍的意义。作曲家的感情愈丰富、宽广,他的表达能力愈高妙、愈全面,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情绪就愈抽象、愈集中,也就愈能成为全人类的广泛的精神财富。

苏联音乐理论界评论这类属于全人类的不朽艺术珍宝时指出,他们的作品“是如此深刻和优美,以至每一代新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美。”

还特别想到贝多芬的作品“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或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感染上都是没有界限的。”贝多芬是“真真实实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代人”。

像在其他精神领域中为人类创造过伟大的艺术财产的巨匠一样,为人类创造过大量优秀作品的音乐家,也将为世代代的人所纪念,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作品一样是永垂不朽的,不论那些人类文化遗产最粗暴的糟塌者怎样从思想上和具体行动上摧残他们的名望与他们的作品,历史总会为这些音乐的巨人及其作

品恢复名誉，而那些人类精神财产的毁灭者总将被缚在耻辱柱上遭受人类永远的谴责！

贝多芬在给贝蒂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指出：

“王公贵族所以制造出教授和枢密官，赏给他们头衔和勋章，但他们不能制造伟大的人物，不能制造耸立在这庸俗的世界中的精神巨匠。他们办不到这点，然而人们却必须对他们尊敬。当我和歌德这样的一些人聚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大人老爷必须懂得在我们身上看看那些伟大的东西。”

真正的艺术家同样必然是远远高出于周围庸人的世界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次现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罗丹《艺术论》）不能设想一位能给人类增加高尚精神财富的艺术家是能与现存社会同流合污的！

我再来谈谈列宁这位一贯主张要充分全面接受资产阶级一切真正的精神遗产的革命家如何狂热地爱好和崇拜优秀的音乐作品的事迹吧！从中对比一下现实，可以看出多么强烈的问题啊！

列宁一生极爱好欣赏音乐，甚至在参加紧张的革命活动、在流放期间、在流亡国外期间、直到掌握政权以后，他从没有与音乐生活隔离过，他自己也极喜欢唱歌。

青少年时，列宁爱听 A·鲁宾斯坦的歌剧《尼罗》，A·达尔戈梅斯基的《婚礼》，П·柴可夫斯基的《画》、《在喧闹的晚会上》、《我和你在一起》。

列宁在大学读书第一次流放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剧院听歌剧。

1901年在慕尼黑歌剧院里“非常愉快地”欣赏德国作曲家F·阿列维的《犹太妇女》（又名《大主教的女儿》） 1923年在伦敦流亡时听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

列宁喜欢比捷的歌剧《卡门》里火热的音乐，常请一位同志C·N古谢夫唱，每次同志们聚会，总少不了他为列宁唱《斗牛士之歌》。

1904年，列宁在迎接即将到来的与沙皇政权的决战时，建议同志们一起去看《卡门》。

列宁非常爱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1915年在瑞士流亡时在苏连堡常请人用钢琴弹这曲子，还在日内瓦建议女秘书“你应当学习这首曲子。”

1913年在瑞士听肖邦的前奏曲和……《林中女王》和《安宁》，贝多芬的一些奏鸣曲：《爱格蒙特》《科里灵兰》《悲壮奏鸣曲》，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89浪漫曲和咏叹调。

列宁在1908年(?)流放在西伯利亚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时，大唱爱情歌曲，例如歌剧《黑桃皇后》中，他特别爱唱其中涅列茨基伯爵的咏叹调“我爱你，我无限地爱你……”以向自己的战友兼妻子表达自己的感情。有好几个月他几乎暂时放弃紧张的脑力劳动，与自己的终身伴侣在甜密的爱情中，在优美的情歌中渡过。

列宁对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是那么推崇，以致对高尔基说过：“我再不知道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了，我准备每天都听。奇妙的、非人间的音乐。我永远怀着骄傲也许是天真骄傲地想：瞧，人们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来！”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 1919 年冬的苏联，当时内战、外战正酣，前线情况吃紧，饥饿和伤寒威胁着人们，燃料严重缺乏，每一块碎木片都要精打细算。剧院的费用昂贵得惊人，有人提出要关闭莫斯科大剧院。列宁对这个俄国最古老的歌剧文化基地的生死问题极为激动。此问题在人民委员会（即中央政府）会议上提了出来。人民委员会一个报告人加尔金尖锐地攻击莫斯科大剧院为谁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排演些什么戏？全是资产阶级的歌剧——《卡门》、《茶花女》、《奥涅金》、舞剧《神驼鸟》、《睡美人》等等。这对宣传鼓动工作有什么好处？！用这些柴火多开一个澡堂还合理些。至少对工人的健康更有益！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把问题提交表决，但表决前他作为一个顺便一提的小意见，简单地笑着说了二、三句话。“我又觉得，加尔金同志对剧院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有点幼稚。剧院与其说是为了宣传，不如说是为了使工人们在一天的工作之余得到休息。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遗产，我们现在就送入档案馆，未免早了一些……”结果没有人举手赞成关掉大剧院。大家在电影《列宁在 1918 年》中看到该大剧院中演出的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极优美的《天鹅湖》就这样没有被毁灭！

关于列宁要听的《第六交响乐》，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笔记本中为构思这作品时写道：“第一乐章全部热情、信心、渴望着活动。终曲是死亡—消沉的结果。第二乐章是爱情，三，失望，四，沉寂的结束。”

确实，这些西方古典音乐大都反映了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对中世纪封建阶级斗争的热情、胜利和试探、消沉的心理，但一般是反映了进步人类的感情，一旦这些作品产生出来，就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以致列宁会带大家去听歌剧《卡门》来迎接 1905 年的革命。

读了上述内容，对照一个前十年中现实中发生的变化，我想总给人带来一个判别是非的标准吧：应怎样看待人类优秀的音乐作品在现实中遭遇吧！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动了一场攻击无标题音乐，也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运动，其中对列宁所推崇的西方古典音乐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最刻毒的攻击。第二天的《解放军报》还指名攻击了列宁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总而言之，这场运动攻击的矛头，不论发起者头脑里是怎样想的，正是他们口头上称效忠的马列主义创始人。他们早已关闭了全国无数个“莫斯科大剧院”式的文化基地，还对一切音乐家，像对其他一切艺术家一样，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有国际声誉的马思聪的逃亡的，有国际声誉的傅聪的父亲傅雷（巴尔扎克的著作全是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的自杀……这类例子是无数的。

现在的舞台上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啊!根本不可能是新的东西,而是倒退到最原始的状态去。舞蹈是什么?全表演在中世纪原始的体力劳动时的动作,音乐是什么,毫无美感……普列汉诺夫大概是在《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类社会里的艺术水平能够对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里的人产生吸引力,而反之毫无吸引力。他举例:西方欧洲文明社会的人不会对非洲黑人部落里的野蛮、原始的粗野舞蹈产生兴趣,只能感到恶心难受,但相反,西方最文明国家的音乐能对全人类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像我一类在精神意识方面高于现存社会很多人怎么可能对山沟沟里原始生产方式中带来的所谓“音乐”产生什么兴趣呢?

只有有共同信念、共同的思想发展水平才能在音乐上有共同的欣赏能力。让我讲述一只极优美的故事吧!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故事从略)

我为这篇故事所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却。历来有过无数关于友谊的动人故事和传说,但没有一个故事中述及的友谊有比这高尚动人的。世间的人与人“友谊”多半是出于利害关系或权宜之计,只有建立在深切的、高尚的共同精神生活、情趣上的友谊才是真正高尚的,这种友谊才能真正突破世俗的贵贱观念,跨过社会地位的鸿沟。这故事也同时说明了音乐艺术的高度魅力,它确能沟通最高尚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古以来音乐就是人类的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们的共同语言。

我的极为可爱的姑娘，我这封信就我的外行——音乐的问题发了一通言论，实在也没有认真系统整理过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路，只是随便谈了一下。如果给我一段时间和书籍上的便利，我可以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观点对音乐问题专门写一篇论文。其战斗性与学术价值是够压倒这十年中一切打着马列主义幌子来疯狂攻击人类最高尚的精神财富之一——音乐艺术的狂犬乱狺。

尽管这儿写得十分粗糙，但我的论点是明确的、是不可动摇的。在这儿可以看出，只要对迄今为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结晶的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有了坚定的信仰和透彻的理解，那么就会对社会上一切问题——甚至包括象音乐这样一个似乎与社会科学相距甚远的问题——抱有相当坚定和正确的看法。

我写这封信的这个题目具有极明确的目的。首先是要求你深刻理解音乐艺术的崇高意义。没有音乐就没有生活，不知那位音乐家这样说过。你必须在生活中实践这句话，绝不能把音乐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说人类思想的最高结晶是哲学，那么人类感情的最高结晶便是音乐，你同意我这句话吗？

我限于环境，又生不逢时，对无数人类的音乐遗产可说是一窍不通。什么《D大调协奏曲》、《B小调幻想曲》之类根本不懂。但从中学起接触了不少西方古典歌曲，在长时期里也自学了不少歌曲，很喜欢唱贝多芬、莫扎特、舒曼、柴可夫斯基、舒伯特、格里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比捷、托赛利、卡普里、

德沃夏克、格林卡等音乐巨人创作的歌曲。当然，现代一些世界名歌、国内名歌也同样喜欢(但总不及前者)。

我向来总是一个人在空旷处独唱，迄今从未有过一位听众(我记忆中仅一次在公园里对一位女伴唱过唯一一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无论在我顺利的日子里还是在悲痛的日子里，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而且在最欢乐和最悲伤的日子里，也正是我狂热从音乐中寻找抒发感情的手段时刻。在结识你的第二天得到了吉他琴，满足了我的夙愿，它将成为我终身的伴侣。

我这信中所以把音乐问题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谈，就是为了把你从音乐问题上所束缚着的旧传统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我想到你总不敢理直气壮地声称爱好西方音乐，仿佛那种音乐是“腐朽”、“黄色”的代名词。根本不是那么事!那不过是山沟沟里原始生产方式的长期熏陶下造成的对人类精神文明的顽固仇恨心理而已!真正爱好音乐吧，我的姑娘!你的嗓子不错呢!

我特别喜欢《外国歌曲 200 首》的续篇。你如能为我借到，我必集中全力选优抄录之，其中有大量极优秀的歌曲。前述比捷的歌剧《卡门》中的二首歌曲《斗牛士之歌》、《哈巴提括舞曲》是我十分爱唱的歌曲，可惜前一首在续篇中，被人将它搞掉了!

当然，除了西方以外，东方的一些国家，如印尼、朝鲜、印度也有不少的好歌。国内也出过不少好歌——如《五朵金花》的插曲，《冰山上的来客》插曲等等……都应尽力搜集。

好吧!这次信就到此将结束。像我其他信件一样,我的目的是把你的精神世界从一切陈腐的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真正认识到生活中固有的美,并有勇气追求美、欣赏这种美!

下一封信也将谈轻松的题目,初步决定谈旅行的题目。

王申酉

76年8月14日

附录一

王申酉被十次抄家后 残留的书籍目录

《毛泽东选集》

《列宁选集》(1—3卷俄文版)

《共产党宣言》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俄文版)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的?》(俄文版)

《哥达纲领批判》

《工资、价格和利润》

《民粹派的经济内容与司徒卢威书中反映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战后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的衰落》

《美国对外政策》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

《核时代的美国战略》

《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方向》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
《苏联农业透视》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国际金融知识》
《国际贸易知识》
《揭开商品价格之谜》
《国际联盟史》
《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邹容》
《甲申三百年祭》
《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的结果》
《回忆与思考》
《外国对中国的研究》
《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
《苏联犯罪问题资料》 《中日贸易会话》
《日本“结构改革论”》
《南斯拉夫与新共产主义》
《第二国际的兴亡》
《南斯拉夫资料》
《南斯拉夫战后经济发展中的投资》
《铁托主义的实践》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
《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
《戴高乐将军之死》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关于美国内外政策的报告》(英文版)
《太平洋战争史》
《阿登纳回忆录》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西欧共同市场问题》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观点》
《东方国家的土地关系》
《工业文明的土地关系》
《现代与解放了的国家的发展道路》
《六国语文(英、法、德、俄、汉、日)辞典》
《汉英词汇手册》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英俄辞典》
《俄华辞典》
《俄汉物理专业词汇》
《袖珍牛津德英、英德字典》
《俄英电子学与物理学词汇》

《俄汉大辞典》

《汉德词典》

《日语汉字读音手册》

附录二：

血写的嘱托

——王申酉和他的《供词》

金凤

1977年春天。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江南繁花似锦，万紫千红。人们经过十年漫长的噩梦，刚刚痛饮欢庆十月胜利的美酒，庆祝一个残酷的时代的结束，热切盼望着美好的新的时代的降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此刻却在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

4月27日下午。天空阴霾密布，瓢泼大雨倒灌似地直浇下来。普陀区体育场上，正在举行从“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群众公判大会”。黑压压的16000群众，肃立在阴风斜雨中。

一位身穿褪色蓝布学生装、面目清秀端正的青年，双手反铐，被押到会场。他浑身湿透，面色苍白，目光深沉，神态安详。他坦然环视会场，期待命运会对他作出公正的判决。

但是，他猛烈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声无情判决，不由得全身震动，炯炯双目喷射出悲愤已极的烈焰。不允许上诉，不容他申辩，他被两名法警紧紧挟持，上了囚车。半小时后，到了刑场。雨停了，天空透出蔚蓝的光辉，地上汪着一洼洼积水。积水中反映着蓝天、白云。他下了囚车，朝前走了十几步，最后

几眼看了明净的天空，苍翠的大地，向他这样深情地挚爱着的祖国、亲人和一位可爱的姑娘告别。枪声响处，他凛然倒下，年方31岁。

第二天，两个当工人的弟弟才收到判决书。他们赶到监狱，检点遗物，除了一条破旧的棉被，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几本马列著作。在一本用粗糙的草纸精心包好的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扉页背面，赫然跳入他们眼帘的，是不幸被杀的哥哥用工整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下的一千多字的“本书内容提要”，左下方写有日期：“1977年4月26日”。“1977年4月26日”，这几个普普通通的阿拉伯字母啊，此刻陡然放大，直刺两个弟弟的心胸，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透过扉页，他们仿佛看到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在囚室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思考着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们欲哭不敢流泪，欲嚎不敢出声，捧着哥哥的绝笔，恰似捧着一颗炽热的跳动的心！

他是怎样的一个青年？他为什么会有这等惨痛的下场？

1980年秋天，我和上海新闻界的几位同行，看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看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将近十年所写的“学习总结”、“我的大学生活”等几十份“检讨”和“思想总结”，看了他给女朋友写的十几封倾诉心声、洋洋万言的“情书”，看了他在监牢中写的六万多字的《供

词》，看了审讯他的全部记录和判决书。不夸张地说，我们大约看了上百万字的材料。我们访问了他的弟弟、同学、老师、女朋友，拜访了审讯他的公安局和法院的同志，拜访了准备为他平反的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还看了监禁他的监狱和枪决他的刑场……

我们力图描绘他短促而充实的一生，力图写出他追求真理、为马克思主义献出年轻生命的一生。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写下他，是因为他生前曾迫切希望“把我们这一代青年所经历的生活、斗争的一切用笔记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在回忆前一辈人的悲剧时，理所当然在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使生活更美好！”

悲剧的时代扼杀了他的愿望。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们怀着悲痛心情勉力实践他的遗言。自然，我们不敢奢望能表达得和他自己一样准确、生动、深刻。下面文中括号所引用的，都来自他的日记、书信和“供词”。

爱因斯坦的《致后人书》和他的理想

1962年秋天。17岁的少年王申酉，以480分的高考成绩（当时，满分为600分）考入上海市著名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跨入华东师范大校几步，迎面是一条碧波荡漾的小河，两岸垂柳拂面。绿荫深处，是一栋栋设备完善的教学楼、实验室和藏书几十万册的图书馆。稚气未脱的王申酉抑制不住狂喜的心情。

从今天起，他就要在这环境优美的重点大学度过有意义的五年大学生活。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工人子弟来说，是多么幸运和难得！

他的父亲是上海闸北工商联的勤杂工人，母亲是火柴厂的女工。他是他家祖祖辈辈和所有亲戚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解放了，他不再像哥哥一样去当童工，五岁上了小学。小申酉是多么喜欢读书啊。只是，他家是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不到一百元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小申酉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有零用钱可以去买自己心爱的书籍。

孩子们久已盼望的春节到了。长辈和亲戚给了申酉兄弟一点“压岁钱”。去买诱人的糖果吗？去买更诱人的花炮吗？不，小申酉早已想买一本书。光他一个人的“压岁钱”还不够买一本书，怎么办呢？小申酉忽闪了一下大眼睛，给弟弟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把弟弟们吸引住了。“你们说，这个故事好听不好听？”

“好听，好听！”弟弟们拍着小手叫着。

“还要不要听？”小申酉故意逗弟弟。

“要，要。”弟弟们叫得更欢了。

“这个故事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本有趣的书中来的。这本书里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你们要不要买？”

“要，要！”天真的弟弟终于把他们的“压岁钱”全都交给哥哥，小申酉凑足了钱，买了《三毛流浪记》和《小公鸡历险记》，高高兴兴地给弟弟讲起来。

王申酉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了。他跟着大人走亲戚，一言不发，只顾坐在一旁看书。姆妈要他烧饭，他捧着本书在炉子旁看着，看着，饭烧焦了也不知道。为了夜里看书不肯熄灯，他不知挨了父母多少骂。可他一有零钱，就买节干电池装上小灯泡，钻进被子里面看书。

他成了黄埔区图书馆的“老读者”。放学回家，放下饭碗，立即上图书馆。他爱看《水浒》、《三国演义》、《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巴达克思》、《烈火金钢》等这些描写英雄人物的书，特别爱看《牛虻》，他看了将近十遍，几乎可以背出来。牛虻那坚毅如钢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是这样地感动了他，他那时绝对不会知道，他今后一生的命运也将如牛虻那样曲折坎坷。他也爱看关于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哥白尼这些伟大科学家的传记。他钦佩居里夫人把毕生精力献给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他更敬仰哥白尼、布鲁诺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书籍陶冶了他的情操，一点点地铸造着他的性格。1958年8月5日，14岁的少年王申酉咬破指头，用自己的鲜血在他第一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充满赤子之情的一句话：“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现在，王申酉考进了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踏上通向科学殿堂的第一步，他怎能不异常兴奋呢？他想起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家里整天吃甜菜、南瓜烧粥的艰难日子。现在家境依然艰难。父亲没有零用钱，甚至伸手向他从几元的助学金里借七八角钱。他

多少次寻思，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自己的家庭改变贫困的命运？只有“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的有限的一部分）”。他立志在将来“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我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这个愿望应当说是崇高而又实际的。

大学的学习紧张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顽强的努力。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住在上海市区，寒暑假也常在学校度过。除了啃他的自然科学，他还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奥赛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斯汤达尔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还看了老子的《道德经》，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五蠹》，屈原的《离骚》、《哀郢》，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他还看了许多中外艺术理论书籍：《艺术哲学》、《阿波罗艺术史》、《西洋美术史》、《近找美术思潮论》、《意大利及其艺术》、《法兰西艺术》……可以说，他终日遨游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同学们都叫他“怪人”。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什么要看这许多文学、艺术和历史书籍呢”

王申酉说：“一个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的人，是个盲目的人。我一定要用人类最美好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同寝室的八个同学，他家最穷苦，他生活得最寒酸。但他在精神上比别人充实。他自傲地说：“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就会像石像一样，不必向人低头”！

他最热爱的还是自然科学。1963年8月12日，他的大弟弟接到交大附中的入学通知书。他兴高采烈地接弟弟到华东师大来玩，还用每月仅有的三元助学金给弟弟买了一个日记本、一个活页簿和一支钢笔，鼓励弟弟好好学习：“蒸汽机的发明是个伟大的革命，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现在世界已进入电子时代，不掌握科学知识，怎么建设祖国呢？”

1963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抄了世界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8年8月10日写给五千年后人们的一封奇异的书简：《致后人书》。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在1938年10月派人投入纽约东北郊的费来辛草场深井中，用水泥封固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这封不寻常的信显然异常地牵动了王申酉的情思，他一字不差地抄在他的日记上：

“我们的时代富于创造思想。我们的发现本应该可以大大地使我们的生活轻松愉快。我们利用电能横渡大洋。我们使用电能来减轻人类的烦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利用电波很容易地把消息传递到全球各处。

“但是，虽然有着这一切，我们的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是完全无组织的。人们必需生活在忧患中，担心被从经济生活中抛出，失去一切。除此之外，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们每隔一个长短不等的时间，就要进行互相杀戮。因此，每一个想到未来的人必然都生活在经常的惶恐中。

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读上面这几字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8年8月10日”

这位科学巨人概括了20世纪人类的主要成就，也概括了主要的社会问题。王申酉想，五千年后，人们一定会耻笑我们今天的无知和愚昧。这封信引导他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生。

他当然不会脱离今天的现实。

1964年4月16日午夜。王申酉躺在床上收听自己组装的一个矿石收音机。突然，无线电传来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申酉激动得在心中高呼：“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升腾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勤奋地学习着，学习着，准备将他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事业。

晴朗的天空飘来乌云

1964年，校园中读书声渐渐少了。从北京传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声音。华东师大和全国不少大学一样搞起了“教学改革”。学生一会儿下厂劳动，一会儿推粪车，倒马桶……课程几乎被砍掉一半，理论力学被砍掉，第二外语被砍掉，连英语过关考也取消。“毛选”学习增加到每周十小时，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全被政治学习占用。甚至连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也不放过，不是政治学习，便是体力劳动。一个学生已不能保证每天八小时的专业学习。

王申酉思前想后，实在想不通。这样做，对系统的完整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王申酉十分苦恼。

一天，他参观了上海市著名劳动模范王林鹤所在的工厂。他很钦佩王林鹤的成就。但他马上想到，王林鹤试验高压电桥失败的次数太多，不就是因为文化太低吃了亏，才在30岁上了科技大学？！他不明白，让学生多钻一些业务知识有什么不好？“学习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工人阶级的大事呀”，这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在心里也在日记本上大声疾呼：“要有一颗火热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心，就要有一百分之一百的懂，而不允许有一万分之一的不懂！”

然而，他不能说出声来。“白专道路”的棍子随时随地都可能劈头打下。他只能在1964年的日记中偷偷倾诉：“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本学期学的东西，不夸张地说，如果省去一概浪费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学习效率远不如一二年级学的深度、广度，实在叫人心酸。大学五年，学到的是啥东西呢？总算感谢上帝，教学改革来晚了两年。如果早来二年，那我五年大学几乎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的衰灭。”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今后的不幸命运，然而，诚实无畏的青年王申酉仍然坦然直书：“我个人也许因这本日记落到他人手中而去劳动教养，甚至送牢狱，甚至上断头台，都不要紧。但中华民族的后退使我不能瞑目！”

不久，他终因不安心工厂劳动受到严厉的批评，被迫写了“深刻的”检讨。

他的16岁的侄女写了一封信给他，落到政治辅导员手里，认定这是王申酉在“谈恋爱”，要他“彻底坦白”。王申酉照实说：“这是我的侄女”。谁知反落下“与16岁的侄女谈恋爱，道德堕落”的“罪名”。难道这是讲老实话的结果？！

为了改变团干部对待他“极其阴沉的面孔”，王申酉主动放弃一个月几元的微薄的助学金，使自己落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他衣服褴褛，身无分文，寄封信要特地跑卫生科退药瓶，买根针要

翻半天抽屉，买份报纸要用邮票垫付，笔记本用草稿纸订，星期天回家来去步行，横穿整个上海市……他的生活如此困难，又失窃衣服，却无人关心、过问。

清晨，晨风吹来，石缝中的小草在阳光中摆动着，滚下一颗颗露珠。高高的白杨树上，翡翠似的几片叶子在颤动。校园依然充满生机，大自然依然率真、美丽。可是，人们却似乎戴着面具，不能相互窥视一下真面目。除每周 10 小时学习“毛选”，还要每周花半天到一天时间“暴露内心思想”。每周年级会、班会、小组会起码开五六小时，政治生活的旋风将每个人刮得昏头胀脑。王申酉不断提出疑问：“这是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办法吗？”

夜，是宁静的，月光柔和地照着华东师大的校园。银灰色的月光下，王申酉在操场的一角用不很熟练的小提琴奏出迷惘、沉思的旋律。他曾从一些旧报纸杂志中了解到，当时还年幼的他 1957 年的形势和 1958 年“大跃进”的情景。他隐隐感觉到，解放后 15 年的建设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和“反右”、“反右倾”的思想压抑，直接造成以后三年的举国灾害。而现在，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人崇拜不又是个致命伤吗？他那稚气的眉宇间开始添上忧郁的神色。

1965 年秋天。上海郊区崇明岛一个铁木竹农具合作工厂的洪炉车间里，王申酉正和工人一起打铁。汗水不住滴下来湿透他破旧的衣衫。他随学校前来参加学生的“主课”——四清运动，已有三四个月了。艰苦的劳动、繁忙的工作使王申酉忧郁空虚的

心灵一时似乎充实起来。他感到他与工人一个心眼，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彻底的无产者”。他愿为劳苦大众真正解放贡献自己的一生！

初冬一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王申酉已是第四次写入团申请书了。好多同学已在四清中入团，王申酉劳动肯干，工作积极。可是，团组织的大门尽管对有些人敞开着，但对他却狭小得像一条缝，入团成为王申酉人生道路上难以跨上去的极高的一步。团组织要求入团的青年经常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别人的思想。王申酉偏偏不会！团组织要求入团的青年必须对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特别热情。王申酉却从内心深处讨厌这些，他怎么能入团呢？他只好一人在江边漫步，任凭江水打湿了鞋袜。他披着破棉袄在雨中漫游，任凭雨水打湿了头发。他发疯似地干重活，使自己炼就一副硬骨头，敢于傲视压在他身上的困难，学会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不皱眉头。

工人很喜欢和信任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而团组织却对他关紧大门。

政治指导员那一向冷冰冰的目光突然变了，他一次又一次找王申酉谈话，甚至攀着他的肩膀，要他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后来干脆提出，要王申酉把自己多年记的日记“交出来”！王申酉大吃一惊。他把日记当作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记下自己的一切真实思想，从来不把日记给任何人看，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他们有什么权利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天真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被人偷看过了。是和他住在一屋的班长干的。他对王申酉每天晚上写日记发生怀疑，趁王申酉不在时偷看了日记，发现王申酉对“教学改革”的不满情绪。“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使班干部甚至把王申酉写来代替人名的英文缩写字母怀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代号，当天上报系总支和学校党委。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可是件了不得的“政治事件”。

在“再去搞些材料”的指示下，政治指导员把王申酉支开，两个团支部委员一个望风，一人抄写，偷偷地摘抄了王申酉的日记，送到学校党委。校党委一面指示做王申酉的“思想转化工作”一面派人“外调”，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以及和他接近的中学同学的档案材料，跑了半个多月，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的任何痕迹。可是，政治指导员并不就此罢休，一次次找王申酉谈话，希望他交出所有的日记，企图从中“突破”什么难以到手的“材料”。这使王申酉十分难堪。他终于决定：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他觉得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他躺在被子里偷偷地哭了。他不敢放声大哭，只好拼命往被里钻。那些年代我们的“政治工作”竟逼得一个纯洁无辜的青年到走投无路、痛哭失声的地步！而王申酉所如此珍爱的日记，终于成了他一生不幸的种子。

崇明岛的长江边，伸向江中的石堤顶端的一堆乱石上，王申酉眺望着水天相接的远方。头上，阵阵江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

脚下，滔滔江水冲激着石块，激起层层浪花。天空一片澄碧，远处飘过几片帆影，无数问号像浪花似地在他头脑中起伏：

他参加四清的那个企业，明明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怎么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联呢？

有人“学雷锋”口头上讲得头头是道，看着别人淋雨，却连伞也不肯借一把，这样的“学习”有什么用？

工作队员白天学焦裕禄心情激动，晚上打扑克几乎通宵。工作队员全体出动参加运土劳动，可敬的班长同志却迳自关在屋里蒙头大睡。他向组织反映，却受到警告，说是“对党离心离德”！难道当面拍马屁才是“同心同德”吗？

打铁工人辛辛苦苦干到半夜12点，一个月只有20来块钱收入。这样贫穷的生活，落后的生活方式，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

“个人奋斗”会造成对人民的损失，碌碌无为，平凡地度过一生难道不会对人民的损失？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吗？……

水波激起的浪花越拍越高，王申酉回头望去，但见江水浩茫，自己的前途也是一片茫茫。他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北京大学“六月一日的大字报”。他明白这场斗争将席卷整个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争的声势又将重演，也许将涉及到更大的方面。

他走出小镇，踏进昏暗的夜，坐在一条狭小的木桥上，在昏暗的夜色独自冥想着：

“难道彭真、邓拓、吴晗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

“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20岁的王申酉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思虑重重的疑问。

“中国将倒退至少10年！”

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丽娃河依然波光粼粼，湖边垂柳婆娑，校园景色依然十分秀丽，全校却已停课，一片的混乱和狂热。

他走进物理大楼，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写他心爱的日记，但空间都被大字报塞满了。偌大的师大，不，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他感到一种狂暴的情感在袭击着他的心：“这种大字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办不可吗？”

他坐在宿舍窗前的桌子旁，抬头望出去，只见楼下路边有一群在烈日下锄草的老头子。他们衣服整齐，穿着皮鞋，戴着手表，显然是学校的教授、学者。但他们的衣服从里湿到外，一颗草要锄六七下，时而停下来擦擦汗珠，但又不敢休息。这在过去能想像吗？老教授替学生宿舍打扫环境卫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王申酉想：“世道要大乱了。在中国历史上，现在这一段将怎样载入史册”？

6月29日，天下起雨来。风雨声敲痛了躺在长风公园亭子里王申酉的心。他默默思索着：“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

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新开辟的“锄草室”。在这里，人们狂热地批判着解放后十七年的“旧世界”。王申酉看了一篇又一篇《燕山夜话》，看了一篇又一篇的“大批判”文章。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提起笔来，在日记上奋笔疾书：“我敢于说说自己发自内心的话。一些别有用心的批判者，别有用心地拼命咒骂邓拓等人，扣上各种各样帽子，骂出最刻毒的词句，对他们的文章提出难以想象的解释和歪曲原意的引伸。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我相信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无论是邓拓也好，周信芳也好，他们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有多少鼠头獐目的人物的心藏着卑鄙的目的，但口是心非，口上拼命吹捧现实，吹捧当今，人云亦云，毫无骨气地盲目崇拜。我相信，‘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恶劣影响是严重弥漫着中国的。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信任’、‘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谈‘无限迷信’呢？今后将成为什么世道呢？中华民族将是怎样的呢？我，一个21岁的青年，就敢于对现实提出怀

疑。我是一个血性青年，不是无聊的应声虫！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人！”他愤然走出“锄草室”。

初夏的深夜，倾盆大雨打得树叶哗哗作响。王申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几次下床，披衣倚窗观看雨中夜景。只见对面长风公园前，有几盏夜灯在晃动。难道也有人夜不成寐，冒雨夜游？他渴望与人交谈，探索这场自上而下、人为地发动的“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但是，哪里有自由交流思想的对象和场地？他只能在日记中自我探索：

“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文艺界、文教界、科技界进入了瘫痪阶段，当然也蔓延到其他各界去了。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走入到稳定的状态，难道就是这样循环下去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8年的‘共产风’不是争了朝夕吗？终身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味道。父母都是工人，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因而我是硬挺过来的。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专门吃卷心菜叶子，一个时期专门吃甜菜烧粥，一个时期专门吃南瓜、冬瓜。咸菜豆腐、萝卜干成了珍馐美肴。一次去学校路上啃大饼时，一个40岁左右的壮年汉，竟向我讨吃一点。那时人就不能不为生存而斗争。这是群众觉悟不高吗？不！是干部觉悟不高吗？不尽是！最根本的还是犯了一个极左的大错。有点良心的人都是看得见的。有些人说了些真话，功劳再大也被削职为民了。

“本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遭受到沉痛打击的他们会永远牢记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在无论下手干什么事时回忆一下这场悲

剧，从而作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起点。但是，刚刚从大萧条中苏醒过来，就已经又得意忘形起来了！

“如果再执迷不悟（看来极可能），那世道将更乱下去，历史将倒退！国家不幸啊！”

王申酉深深痛苦着。

1966年8月4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学者，在校园里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二级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王申酉奉命和同学们在师大一村、二村巡逻，防止有人自杀。他整夜坐在历史系教授吴泽家门口，心里暗暗对那些老教授说：

“死不得啊，为什么要死呢？”

王申酉十分苦闷。但形势逼人。他不得被卷进这场风暴。他参加了校内的静坐示威，又赶到市委门口，和北京红卫兵一起坐了整整9小时。但班级红卫兵组织却不吸收他这个“红五类”子女。

9月中旬，他和全校同学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临出发时，他和几个资产阶级子弟一起被赶出队伍，押回上海。到家后，他的当工人的父亲和母亲连声问他：“你见了毛主席吗？”

“你是红卫兵吗？”他无言对答，只能在日记中连写几个“大惭”！

“大惭”！他脸色憔悴，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终有一天要“革”到他头上来。

形势危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自卫措施。他违心地起草了揭发批判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长达一百四十多张纸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全校。多少人围观传抄，还有人印成小册子向全国散发。王申酉内心却十分痛苦。他一向认为常溪萍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干部。他暗暗决定，只等这场风暴过去，他一定向常溪萍赔礼道歉。可惜，这一善良愿望注定不能实现。常溪萍遭到聂元梓一伙的残酷迫害，已经含冤去世。

1967年1月，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王申酉这时已看透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编子！”

这一年，全国各地内战，武斗升级，愈来愈乱。一天，王申酉回到家里，拿出报纸上批判爱因斯坦、牛顿的文章，愤慨地对弟弟说：“这样伟大人物，人类最杰出的一部分人竟然受到批判！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话锋一转，他直指江青：“这个争风吃醋了十几年的女人发疯般地摧残人类文明，对人类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弟弟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他却坦然地说：“我估计，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所谓，百分之七的人见风使舵，死心塌地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热爱大自然的王申酉在最后一阵萧索的朔风中发现柳枝上开始露出一粒粒绿芽，内心抑制不住无限的喜

悦，他默默欢呼：“满园春色关不住！不管人世社会怎样，春总是美的，她总不吝惜点缀人间的美！”

恼恨的是这个人间社会啊！学校里有人打派仗，有人谈山海经、吹牛、睡懒觉、下棋、玩牌、谈恋爱，而全国正在大乱。上海市民默默地看着大街上雪片似的“告急”传单，映入眼帘的是斗大的血红的“血”字，外加斑斑点点的血迹，只是当作“外国奇闻”般地看，交谈着。不过，更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愈来愈下跌的经济生活、孩子的教育以及远方亲人的安全。

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人孤独地在孤独的房间里，面对孤独的墙壁孤独地坐着。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人无聊地在无聊的环境里写几个无聊的字。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整整两年泡到汤里去了！”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日记：

“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人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国家现在是怎样了呢？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他焦虑着国家的命运，对当前的现实极度不满：

“十年前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

他的哥哥担心地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了，否则会丧失一生的。倔强的诚实的王申酉说：“我冒杀头、开除的可能性写了上面的这些话。谁偷看到向上邀功请赏的话，将是一笔好收入吧。

一个无辜的人将被打下去罢了，但千万人是会跟我走的！”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矛头直指千万无辜群众。王申酉被隔离审讯、抄家。他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几百本书籍和一些无线电零件以及他从14岁开始写的8本日记全被抄走，当作“反革命”的“罪证”。无情的皮鞭打得他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天地难容”……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成百名学生被“隔离审查”，30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

1968年1月29日，正是春节除夕。王申酉被送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在三楼的一间牢房里。同牢的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他们很快成了知己的朋友。王申酉向赵贵泉学德语，赵贵泉向王申酉学英语。王申酉的母亲每月给他送去大量草纸。他们用草纸当课本，互教互学第三门外语。一年零三个月

的囚徒生活，王申酉没有白白度过。他掌握了德语的初步知识，还把《毛主席语录》翻成英文。

1969年4月，他被“教育释放”，回校“监督劳动”。他看透了一些野心家在登台表演，决心缩回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在认真攻读无线电专业知识，在顽强地恢复俄语学习，自学第四门外语——日语。

在艰难困境中，好学不倦的王申酉热切注视着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关心人类文明的发展。1969年7月中旬，他的大弟弟申荣收到他一封信：

“7月20日晚上，你一定去看看月亮。阿波罗号将第一次载人登月，这真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

7月20日，他的弟弟果真看了一刻钟月亮。自然，他凭肉眼，什么也看不出来。

过几天，王申荣又收到哥哥寄来的《参考消息》，上面有阿波罗号载人登上月球的报道。王申酉信上说：“7月20号夜里，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整个欧洲和美洲高兴到发狂的地步。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真值得庆贺！可悲的是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除了能看到《参考消息》的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思想禁锢到麻木的程度！”

1970年，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一打三反”运动。华东师大一名女学生吴美娣看到报纸上“大力提拔革命干部”的社论，情不自禁地在报纸上批上“鱼恋鱼，虾恋虾，乌龟恋的是大王八！”

这可不得了，她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出来批判。王申酉十分同情吴美娣，暗中写了个字条支持她：“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王申酉立即受到工宣队的点名警告和批判：他学习业务是“走白专道路”；他学习外语是“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书籍，英、德、俄、日文书籍和各种辞典全被没收。他被勒令：不准再看业务和外语书籍，只准努力“学习‘毛选’，好好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王申酉气愤地写了“我的自白”、“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反复表达了他想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愿望。工宣队认定他是“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他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教育”。

王申酉所有的同班同学都毕业分配了工作。留校八年的王申酉再次被宣布为“敌人”。

明灯照亮沉沉的黑夜

苏北大丰干校一年多的流放生活，是王申酉一生中的转折点。

1969年底，中华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成千上万座“大学校”——“五·七干校”。数以百万

计的“走资派”和“臭老九”们被送到这里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华东师大此时已改名上海师大，干校办在远离上海几百公里的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黄海滩上。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被送到这里“监督劳动，接受改造”。

在这里，他要干最重最脏的活，还必须定期向“监管小组”汇报思想。对劳动，王申酉已经习惯了。不管是甬河泥，出猪粪，锄地，插秧，挑粪，挑茅草还是打扫厕所，他都默默地干得又快又好。

除了劳动，王申酉还能做什么呢？干校的生活，是这样的枯燥乏味，连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玩起“争上游”和“工兵掘地雷”这样的游戏。王申酉是连玩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囚徒”，唯一可以由他自由支配的是思维。思维是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也难以禁止的。

王申酉的神经中枢在激烈地运行，即使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

“为什么我不过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更价值的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无情的迫害却不断落到我头上？”

“做学生追求点知识，当工人追求点技术，当教师多追求点传授知识，当学者多追求点学术研究，为什么是罪恶？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个社会事实上存在着那么多的缺陷和阴暗面，为什么每当人们流露出一点真情实感，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就随之而来？”

“这个‘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四年，社会动乱，民生凋敝。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出路在哪里？……”

“为什么？”“为什么？”王申酉苦思冥想，找不到答案。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有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很少有人光顾。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王申酉却到图书馆抄了几乎全部社会科学书籍的目录，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他决计充实自己，发誓要窥视和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王申酉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读书的呢？白天，他更加拼命劳动，避免“监管小组”找他的麻烦。清早，他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在田头一站个把小时，口中默念着德文单词，他希望能逐步学会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午，别人都午睡去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不休息，到阅览室看书。晚上，放下饭碗，他夹着书和笔记本，钻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面有不少正在霉烂的土豆，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

在这间小屋子里，王申酉把烂土豆扔了出去，清理出一席之地，开始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攻读《资本论》一至三卷。他埋头读书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和寒冷。他回宿舍睡觉时，常常是半夜时分了。

王申酉从阅读《资本论》这部划时代伟大著作中，获得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精神享受。这部伟大著作对王申酉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决不是如一团乱麻，也不能凭任何伟人的个人意志去操纵，而是有内在的固有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地分析人类历史进程唯一正确的理论。他了解到，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它们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在王申酉艰难探索的人生道路上，马克思的著作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多年摸索的黑沉沉的夜。他感到无比兴奋，迷茫的眼光顿时明亮起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今变得一目了然，偌大的地球一下子像缩小了许多。他决计要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

《资本论》他看了两遍。他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即使在回上海休假的时间，他背了一个补了又补的书包，每天都在黄埔区图书馆度过，中午啃几只大饼当午饭。

然而，要真正掌握《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演说，并以此来观察现实世界，必须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料。在那个一切与外部世界隔绝、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只有《参考消息》偶而还透露一点外部世界的信息。但王申酉连《参考消息》也被禁止阅读。他只能偷偷地摘录一些经济资料。

一个初春的夜晚，同宿舍的人都已入睡。王申酉正躲在蚊帐内，在手电筒微弱的光下摘抄着《参考消息》中一些国外经济资料。“监管小组”的人一跃而起，猛扑到他床头，大声喝问：

“王申酉，你在干什么勾当？”

“把东西交出来！”王申酉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参考消息》被夺走了，枕头内和书架上的书籍、笔记本被抄走了，连塞在枕头芯中的一叠“摘录”也被抄走。

第二天，王申酉被拉到干校的操场上批斗。

“你老实交代，偷看《参考消息》和抄录其中材料，有什么反动目的？”

“我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收集些材料，没有反动目的。”王申酉平静地回答。

“毛主席著作和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你为什么不看，要去看《资本论》？”

“规定的我都看完了。”

“你为什么偷偷地学德文？”

“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我学德文是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著作。”

“那就是说，你对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列著作不相信。你这不是怀疑马列主义在中国遭到了篡改吗？你是妄图否定马列主义！”

纲越上越高，帽子越来越大。王申酉以沉默对之，不屑一顾。他站在那里，干脆默默背起德语单词，任凭他们怒吼。他的“顽固态度”激怒了这些好汉。当天下午，一批大字报刷了出来，给他戴了一顶吓人的帽子：“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王申酉一笑置之。他这时，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面对这一场场批判而面不改色。这场“风波”加重了王申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困难。他被迫转移目标，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读历史书籍。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阅读了《哲学史简编》、《哲学史讲演录》、《世界通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等。他把全部心思沉浸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停地看啊，抄啊，写啊，几乎忘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痛苦和歧视。他的学习达到了“发疯的程度”，连干校领导见到他母亲时也说：“那里阅览室的书让他一个人包了”。但他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任人们怎样批判，还是狂热地发疯似地学习。

王申酉深信，人在逆境里，比在顺利的环境更能锻炼意志和品格。他非常喜爱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的一节诗：“走你的路，任凭他人去说。你要屹立得像一座坚稳定的塔，它的高顶在狂风中决不动摇。”他决心对一切横逆迫害抱蔑视甚至讥笑的态度，对一切攻击污蔑若一阵微风吹过，毫不在意，最多像讨厌的蛛网一样，随手拂去，从来也不让它们阻挡自己探索真理的步伐。

在干校还有两个所谓“反动学生”小黄和小薛，他们都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坐过监牢，残酷的政治迫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们消沉、悲观、“看破红尘”，准备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王申酉很不同意他们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他们不敢随便接近。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王申酉和小薛在食堂看书。王申酉看看周围没人，又到门外看了一下，回到食堂拉了小薛到后门外小河边的草垛旁，开始了他们到干校将近一年后第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被厚厚的乌云遮盖着，小河像一条白色的缎带伸向远方。四周静悄悄的，一只名叫“阿黄”的狗蹲在一旁，似乎代表“监管小组”瞪着眼睛默默地监视着这两个遭受屈辱的大学生。

“谈谈你现在的想法”，王申酉直截了当地说。

“我越来越感到现实社会里没有真理、正义可讲，我再也不搞政治了”小薛沮丧地说。

“不对，马列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团乱麻，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客观真理，你只要认真去读一下马列著作就会晓得。”

“从牢里关了三年出来，也想充实一下自己。我打算先学好一门外语，同时收集一些解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料，然后再系统地读点马列的书。”

“不”，王申酉急切地说：“先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学其他，才会对社会有正确的看法。我过去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一直看无线电方面的书和学习外语。到了干校后，自然科学书不让看，被迫狠下心来学习了马列的一些著作，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现象。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现实社会总归会按照历史的固有规律变革的。那个不可一世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吗？”王申酉愈说愈兴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林彪虽然垮台，可是”，小薛看看周围，不敢再说下去。他把话题一转，还是转到学习上来：“据说我们这种人是内部控制的，不管你学习马列多么卖力，好心的人也许说你是书呆子，

刻毒的人反认为你是别有用心。你在这里不就受到这种批判吗？再说，即使世界观真的变为马列主义的了，又怎样呢？”

王申酉平静在回答：

“我也听说组织上要把我十年、八年地改造下去，这又有什么呢？歌德说过：‘追求伟大事物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又能给我以自由。’我追求真理的自由谁也剥夺不了。正因为马列主义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被糟塌得不成样子，我们才要学习，才要去弄清怎样被歪曲篡改的。譬如现在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从何复辟？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虚伪的。又如报纸上批唯生产力论的文章，狗屁不通。我如果好写文章，保险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

王申酉见小薛神情紧张，笑了一笑说：

“我给你开张书目，你还是认真看点书吧。”

不久，王申酉找小黄也长谈一次，也开了一张书目给他。王申酉对小黄说：

“像你这样的人消沉下去太可惜了，你不要太悲观，把这些书认真读完，一定会振奋起来。我们的处境比当年司马迁的处境好多了，他在那种屈辱的情况下，还写了伟大的《史记》，对中华民族作出杰出的贡献。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后代作一点事。”

当时，王申酉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除了吃饭，几乎剩不下钱。他还花一角四分钱买了一个练习本送给小黄，在最后一页，特意抄录了青年马克思关于选择职业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从此，这三个被流放的大学生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时还探讨一些社会问题。

一天，王申酉和小黄在一起割草。地头休息时，听到干校的高音喇叭在广播：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了……王申酉听了，对小黄说：

“这句话不对。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搞一个工业革命，还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我想，农村公有制不变，可以按目前的生产队为单位，上交一定的粮食指标，允许生产队用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各生产队可以竞争，这样农业可以上去。工厂要由厂长、经理负责，进行成本核算，按各厂自己的盈利自定工资、奖金，进行竞争。这样，工业也能上去，一定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

小黄听了，一言不发。王申酉所设想的，正是当时所批判的。可是，我们写到这里，不能不感到惊异和万分惋惜。王申酉的这些设想（除了他还不敢破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农村和工厂所进行的改革，是多么吻合

啊。可是，他是在 1971 年那个动乱时期提出来的 呀！我们难道不钦佩他的真知灼见？！

然而，王申酉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解剖现实社会，走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每月，他只有 15 元生活费，光吃饭就得花去 13 元 4 角。他的工人家庭并没有力量补贴他。他穿的衬衣是从前几批“五·七战士”回上海时丢下的破衣服中捡来的，裤子是弟弟穿破了他拿来补了再穿的（他在坐牢时学得一手好针线活），一件棉袄不知打了多少补钉，床上的被子、被单稍一用力就会撕破。为了购买抄摘读书笔记的纸张、墨水和笔尖，他将多次抄家后残存的那些科技、文艺书籍统统送进旧书店。然而，他穷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他一年四季洗冷水澡，赤着双脚劳动，在连续迫害和折磨的逆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

他处境的难堪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请看他在 1972 年过春节时的痛苦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上海师大“五·七干校”，总算照顾民族传统，在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放假几天。那些“五·七战士”在熬了那么漫长枯燥的劳动惩罚的苦日子后，一个个兴匆匆地赶回家去和家人团聚，欢度佳节。然而，王申酉回到家里，看到的是生病的父亲和痛苦的母亲，是他们对这个竟在大学泡了十年而不能毕业分配的“不孝儿子”的冷言冷语和白眼。

过春节嘛，一个工人的家庭也总要请些客人来家或到别人家作客。母亲有意说给王申酉听：“家中有这样的宝货，还有脸请

人来或到别家去?”王申酉马上表示,春节三天他都在黄埔区图书馆度过,每天保证在晚上8时前不回家,中午午餐自理,晚上8点后回家吃饭。

年初一大清早,这里那里响起了鞭炮声,人们即使在那倒霉的年月也愿意用鞭炮声来表达一点可怜的欢乐,驱逐一年的晦气,祈求来年的幸福!王申酉连这点欢乐也难以分享。他背着一个补了又补的书包,急急地赶到黄埔区图书馆。感谢上帝,图书馆春节没有关门。偌大一个阅览室,只有王申酉一个人。图书馆管理员带着诧异的眼光看着这位“老读者”。

中午,图书馆休息两个半小时。天上正下小雨。王申酉背着书包在马路上溜达,最后走进文化站对面的红星医院。幸亏急诊室没休假,居然找到了化验室的一张椅子。他连忙坐下,心想可以免除冒雨在马路上散步两个半小时的恶运了。不料刚坐下十几分钟,两个保卫干部走来,看到他那副身穿破棉袄、背着破书包的模样,顿起怀疑,立即详细盘问。王申酉一无证件,二又形色匆忙,更不好说出实情,不由得说话支支吾吾。两个保卫干部便拉他一起去派出所说个明白。王申酉怕拒绝了后果不好,只好破着头皮,随他们到西藏中路派出所。到了这里,王申酉只好说了实话,说到家中不欢迎他回去,他无处可去,才在医院歇脚……他们笑了,王申酉心中却在流血。但怎样证明他的身份呢?王申酉从破书包中寻到一张公费医疗证,他们才算把他放了。他在

雨中又淋了半个多钟头，才等到图书馆下午开放。他买了三个大饼，算是压惊和充当大年初一的午餐！

年初二中午，王申酉走进南京路一家饭店。这一天他过得比较“愉快”。营业员看他一个人坐着，又不叫菜，以为他是在等人，没有管他。其实，他望着黑板上写的菜单，心中盘算着，自己交完伙食费后，袋里剩下的钱大概还不够叫一个菜！两点半饭店关门，正好赶上图书馆开门。

第三天，他又找了另一家饭店。

“监管小组”规定他要到学校汇报他怎样度过这几天假期，他没有去。他实在舍不得可以买十个大饼的车钱，他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汇报。

这是怎样痛苦而屈辱的日子?!王申酉在图书馆中找到了他渴求的书籍，把这些都置之度外了。

在大丰干校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王申酉阅读的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大约有几千万字，写了100多万字笔记，还抄了27万字的《世界通史》和厚厚一本《马克思传》。他写钝了十几个钢笔尖，用去十几瓶墨水。

这些数字，难道不是王申酉以惊人的毅力拼命学习马列著作的最好见证?他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刻苦学习，像海绵吸水一样，孜孜不倦地吸收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他从内心深处坚信它的正确性，竭力以它为武器考察一切社会问题。他彻底抛弃了

过去那彷徨、动摇、苦闷甚至悲观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对小黄说：

“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逆境中坚持追求真理

1972年6月，父亲中风瘫痪。王申酉被批准回到上海，照料父亲。他的人生道路已经确定：他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收集资料，研究社会问题，看看自己在这个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下，怎样使自己的一生过得对人类最有价值。

但第一步便遇到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书籍和资料。他家中所有的书籍、资料全被抄走。学校图书馆没收了他的借书证，使他无法从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借书。有参考价值的“内部书籍”他更没资格问津。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起了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被安排到学校绿化组劳动。

他慨叹自己像破了的袜套或挤了汗水的桔子皮那样遭人践踏。他家离学校十多里，上学时一直住在学校宿舍。但这时他名义上已经毕业五六年，是个“待分配的学生”，学校拒绝给他宿舍。

他不得不每天蒙蒙亮起身，双脚横穿过上海市，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一天繁重的劳动下来，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回家，已是万家灯火。再要在晚上看书，精力实在难以为继。

走投无路的王申酉被逼在学校第三宿舍楼梯底下一间堆放清洁工具、只有四平方米的暗室安身。他搬进一个旧书桌，又从垃圾桶边拾来一张破席，自己装了一支三度光的小灯。晚上，他便蜷伏在微弱的灯光下，顽强坚持着他对真理的追求。

绿化组的人都把他当作“危险人物”离他远远的。唯独一位中年女工对他颇为同情。她看到他衣衫虽然褴褛，劳动却很卖力，平时举止庄重，只是一个劲看书。出于好奇，女工问他：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王申酉简单地回答：“有一点政治历史问题。”

女工问他家中情况，王申酉一一回答。女工听了，禁不住深深叹息，脸上露出怜悯的神色。

王申酉看她有一副好心肠，大着胆子说：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忙？”

“请你帮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我没有借书证，借不到书。没书看，比不吃饭还难受。”女工不禁肃然起敬。这小伙子戴了政治帽子还念念不忘看书，足见他有抱负，不像个“反革命”。她慨然应允了。

这位中年女工冒着风险，利用她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相熟的关系，把一些外文原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送到王申酉手中。王申酉多么感激她啊。当女工叫他一声“小王同志”，王申酉更感到万分亲切和温暖。在那个年月，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称呼他啊！

一次劳动的间隙，王申酉对女工说：

“你知道吗，我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许许多多受迫害、受屈辱的人的命运。”

女工听了，不以为然：

“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你苦还没有吃够吗？”

王申酉神色肃然地回答：

“我有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反常，将来一定会改变！”

这位女工听了，非常紧张，小声嘱咐他以后不要这样随便说。

一天晚上，当这位女工把王申酉所要的书送到他的小天地时，保卫组的人竟对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把污水泼到这两个无辜的人身上。女工被定为“帮凶”。王申酉的心痛苦得收缩起来。他自己对遭受迫害与污辱已“习惯”了，他万万想不到又连累了这位在患难中帮助他的这位善良的女工。他愤慨，他申诉，“罪名”更加重了。

1974年5月27日，王申酉被第二次遣送到师大在上海郊区的奉贤县“五·七干校”去“监督劳动”。

“在命运的当头痛击之下，我头破血流，决不回头”，王申酉带着这样的信念，背起了简陋的行装。

在这里，他一天劳动9小时，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他仍然坚持阅读马列著作，一边读书，一边默默思考着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例如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为什么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仍不能发展起来？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强大，能那么长久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他还在考虑西欧共同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考虑中国当时的经济形态及其在上层建筑的反映。

1974年秋天，他随同干校的教师们去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了半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他访问了大队和生产队会计，和社员们交谈，听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情况介绍，还参观了大队办的企业，通过生产队会计，他得到这个生产队近十年生产和分配的详细统计表。他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社会机体的细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作客观分析，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生产队内部。社员收入多年来没有上升。社员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一个生产队只有一部手扶拖拉机。在这样的经济共同体里，几百个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几百亩土地上，只能

继续简单再生产。王申酉断定：“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

王申酉一再要求学校把他分配出去，不要什么，他愿意分配到遥远的边疆和山沟中去！分配之前，他仅仅希望能与大家一样，半天劳动半天学习。阅览室中马列著作很多，他恨不能一口吞下去。他从1973年起，才得到每月48元工资。他向校方提出：如果组织上认为我半天劳动贡献太小，我十分同意分配前在这儿（干校）的日子里只发一半工资，每月24元就够我用了。我甚至设想，将来实在没有地方肯收容我这个‘包袱’，我愿意一生在这儿拿24元。他只求得到一点读书的时间。

对这些起码的要求，校方一概置之不理。

尽管他政治上、工作上都陷入绝境，但他精神上不断充实，思想上更加奋起。有人说他“有野心，一个黄鱼脑袋的平民百姓却考虑应该由总理考虑的问题。”他认真反驳：“决不能说平民百姓考虑了国家大事就是有野心。”他执拗的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刻苦的人来说，世界是自己的，是美好的，完全有向人类贡献自己才能的责任。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会因我存在而更幸福一些——即使它是那么微小。”

王申酉那双敏锐的眼睛，时刻关注着祖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

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常在上海图书馆看书的王申酉看到一种希奇的景象，成堆成堆的青少年捧起一叠叠线装的法家书籍死啃起来。他的心里不觉不寒而栗。报上连篇累牍

地批孔老二，王申酉一眼看穿江青一伙不过是借这场丑剧，“把矛头指向总理”。他对朋友说：

“他们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倒比对了，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仅仅在两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才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溃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一丝一毫的进步意义。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还丝毫没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样子，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更元耻可恶了。他们攻击总理是‘党内的儒’，这是最无耻的污蔑。他们政治品质的堕落已到了登峰造级的地步。”

白卷英雄被大肆宣扬，王申酉极端鄙视。他对弟弟和同学说：

“交白卷成了英雄，大学成了文盲俱乐部，如此摧残科学文化，真是历史的大倒退！”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王申酉认为小平同志学识渊博，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干，短短一年

就打开了局面，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他心内庆幸“形势不错。”

这一年夏季，“四人帮”借评《水浒》为名大作文章。王申酉洞悉这一伙魔鬼的诡计：“靠捏造小说的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是计穷智尽了！”

王申酉十分景仰周总理。他钦佩“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光辉的功绩。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他任劳任怨，一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个头脑里考虑国际国内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地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并且安排了忠实继承自己志愿的战友作接班人。周总理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76年1月8日，无线电中传来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正在奉贤干校“改造”的王申酉听到后呆住了。他一向说自己是“不流泪只流血的人”，但那一晚上，他把枕头哭湿了。

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同志不久又被打倒。王申酉这时被调回上海，安排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他深深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常常独自在人民广场上徘徊、思考。他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在柜台里暗藏着不公开出卖的总理

遗像，立即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他常常满眶热泪地凝视着总理遗像，好几次从睡梦中哭醒过来。

3月5日和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接连两次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王申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打电话责问报社。

天安门事件一发生，王申酉极其兴奋，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希望。他情不自禁地称颂“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世代代的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尽管“四人帮”惊慌失措，王洪文亲自指挥镇压群众。王申酉坚信：“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天安门广场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周总理的白旗。升旗的人马上被抓走了。王申酉气愤地对弟弟说：

“任怎样残酷的镇压，人民不会沉默！”

王申酉和大弟弟申荣在人民广场上散步谈心。大弟弟好心地劝他：

“你的年纪已过三十，还没分配工作，不要再惹什么麻烦了吧。”

王申酉摇摇头说：

“我的世界观已经定了，绝不会改变。你知道吗？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以后，有一个21岁的捷克青年在布拉格广场自焚。他的死很值得捷克人民每年都纪念他，在他自焚的广场献上鲜花。每当我想起这位青年，我就热血沸腾。有一天，为了捍卫真正的马列主义，需要我像他那样献出年轻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停了一会，王申酉又难过地对弟弟说：

“我是不愿牵连你们的。但在我们这个封建影响很深的社会里，你们一定会受到牵连。如果这样你们不要怨恨我，要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

面对哥哥这样英勇献身的精神，他的弟弟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有暗暗地替哥哥担心。

1976年七八月间，“四人帮”猖狂地最后一跳，发出了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围剿”。王申酉写信给他在内蒙当工人的小弟弟解平：

“周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已到了我不能容忍的地步。目前的形势如不改变，我绝对不对它抱任何幻想。如不改变，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已完全降落在这个勤劳善良的民族身上，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都应正视这个现象，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抑止在人们心头的话总有一天会奔放出来，‘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这是王申酉在“四人帮”覆灭前夕对中国政治形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他的预言很快为不久后发生的惊人事变所证实。

一阙甜蜜、忧伤、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在王申酉不幸、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命运为他演奏了一阙甜蜜而忧伤、深沉而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不了解王申酉的人，认定他孤僻，冷漠，成天沉默寡言，钻在书堆里，不通人情世故，是个“怪人”。真正接近他的人，会看到他极端诚实，十分忠厚，内心的情感异常炽热，丰富，细腻、深沉，是个热情澎湃的人。他爱生病的贫穷的父母，从小发愤读书，总想努力改善工人家庭窘迫的命运（但命运却偏偏使他连累了年老的双亲）。他爱当工人的哥哥、弟弟，从学习和思想上帮助他们，提高他们。他爱他的朋友，不惜自己承受最大的政治压力，努力保护他们（几个朋友都先后分配工作）。在朋友们沮丧、消沉的时候，他从思想上开导他们坚持学习马列主义。他更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的追求执着到近于固执的程度。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热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熟读《马克思传》，常常幻想有个像燕妮那样的爱人，能帮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得更快，意志永不衰退，感情永不枯竭。

在现实生活里，他早就认定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青年是“吃苦的一代，不应该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小事”。他只想有一张吉他，让它孤独地慰藉自己寂寞的心灵。

1976年6月，一个女子和一张吉他同时走进他充满忧虑的生活。姑娘身材颀长优美，面貌姣好，是无线电厂的一名女工。她1966年初中毕业，随后进了工厂。她喜欢读书，关心时事，追求人生的高尚情操，希望找一个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她的有头脑的理想伴侣。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姑娘由介绍人(王申酉的中学同学)陪同，来到东台路口，和王申酉见面。王申酉穿得很朴素，一件白色的两用衫，一条蓝色的布裤，眉宇间自然透露出一股英气，举止十分文静。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马路，随便闲聊着。

姑娘知道王申酉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知道他暂时在校办工厂劳动，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分配工作。但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深谈，只是一般地谈到大学生的经历和遭遇。

王申酉却想试试姑娘的志趣和胆量。他笑着问她是否知道复旦大学一位名叫胡导钧的学生的事情(胡导钧曾经反对张春桥，被定为“1516分子”遭到批斗)。姑娘点点头说，这个人很有胆量，敢反潮流!王申酉紧接着说：

“你是否害怕和这一类人来往呢?”

姑娘震惊了。她曾经暗暗同情过上海复旦大学一些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她在梦中也曾爱慕过牛虻这样的英雄人物。但当这样的人物真的站到她面前时，她却不敢相信，暗暗胆怯了。

王申酉有礼貌地伴送姑娘回家。路上，他又执拗地问：

“假如我像那些人，你害怕吗？”

姑娘壮着胆小声回答：

“我不怕！”

王申酉笑了，笑得那么纯真，那么开朗。他害怕姑娘作出别样的答复啊。受到姑娘这个回答的鼓舞，他约姑娘三天后在老西门碰面。

三天后，在老西门，他兴匆匆来了，给姑娘带来两束洁白、芳香的栀子花。姑娘含羞地接过花，花香扑鼻，姑娘的心微微颤动。王申酉又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很勇敢的革命者为了寻求真理，献出自己生命。他的女朋友把他最喜爱的栀子花散在他的坟墓上……

这个故事是不是王申酉编出来试探姑娘的心呢？当他们感情发展得更深一层时，王申酉这样问过姑娘：

“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

“我落难了，你会跟我吗？”

姑娘心里掠过一丝恐惧。他为什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过，几次交往，特别是她收到王申酉那一封封内容深刻、文辞优美的

情书时，她已深深被王申酉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吸引了。她毅然回答：

“我会跟你的。你现在不也在落难中吗？落难时你本不该找朋友啊！”姑娘调皮地说了一句。

王申酉说：

“我就是要在落难时找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王申酉把写了的一份简历交给姑娘。姑娘接过来，迅速地看下去：17岁上大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生”，坐牢，两次上千校，等待分配……姑娘的脸色变得苍白，轻轻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不小心，三番两次招惹是非？”

王申酉平静地回答：

“我年轻不懂事，急于求上进，看了一些马列著作，有些话憋不住，只好与笔墨打交道，想不到遭到飞来横祸。”

他坦率地谈了他的经历。当他说到两次在干校的遭遇时，他幽默地说：

“为了多看几本书，不知挨了几多打，几乎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己己！”

他又十分兴奋地对姑娘说：

“我在干校认真读了两遍《资本论》，我的世界观才真正确定下来。当我的生活中受到无数挫折心灰意冷时，正是马克思的

《资本论》拨亮了我的眼睛。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第三次见面，他给姑娘带来了芬芳的白兰花，又推荐姑娘看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遗产》。他还给姑娘带来他从德文翻译的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名著《往那里去》的译文，那是他写在几本练习本上的。他告诉姑娘，这本书写的是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残酷地迫害原始基督教徒以及他最后灭亡的故事。他很喜爱这本书，一面看一面随手翻译，并把译文送给他心爱的朋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译这样内容的一本书？聪明的姑娘懂得他的心意，含羞地笑了。

王申酉多年追求的理想伴侣，似乎在姑娘身上朦胧地出现了。他多么渴望和这位姑娘经常见面，倾吐他的情思。然而，社会给予王申酉的时间是那么少。每次见面，总是匆匆说一会儿，就要分手。王申酉还在挤一切时间读书和思考许多严肃的问题。

他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一天下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南市图书馆。他和姑娘见面后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在花前月下的悄悄蜜语，而是奇特地安排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常常，王申酉下班后坐在阅览室看书，姑娘从工厂匆匆赶来，也坐在他身旁默默地看书。图书馆关门后，两人才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谈。他们谈彼此的爱好志向，谈看过的一些书和当前的时局……他们仅仅游了一次虹口公园，在鲁迅墓前停留很久。他十分崇拜鲁迅，背了鲁迅许多诗。当他背到那一首著名的《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沉重地说：

“总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一声惊雷的。”

姑娘情不自禁挽住王申酉的胳膊，他竟涨红脸庞。在政治上、思想上那样勇敢的他，在爱情上显得多么胆怯啊！

他们之间情感、思想的交流，更多是靠“笔谈”。王申酉与姑娘相识不过70多天，他给她写了13封信，好几封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这些信很少表露露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而是王申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说理透彻的政论，是他抒发个人胸怀的优美动人的散文，有的还是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专论。这些信信手写来，如天马行空，感情奔放，文笔酣畅，知识渊博，见解深刻。

“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建立终身伴侣关系，那就必须使彼此像透过水晶那样洞察对方的心灵。尽管我们都有充分权利保持各自人格的独立，但必须使双方在信念上，让两颗心按一个节奏跳动。”王申酉一开始就把他的心坦露在姑娘面前。

7月10日，王申酉在第三封信中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情趣以及对理想中的终身伴侣的愿望。

“我十分低微，绝不敢狂言追求什么伟大的事物。但我总感到人应当凭信念活着，应该追求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我不但需要耗费自己的精力，而且必须求得自己的终身伴侣的理解和同

情，当然我并不要求对方分担同样沉重的负担，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只要求在我全力以赴追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你会对似乎漠视你的幸福的情况抱原谅的态度。如果要求我有完美的健全的学识，使人生有价值，又要我沉溺在琐碎的小事中，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莎士比亚在一首 14 行诗中说：“天才注定了做乞丐，空虚的草包倒穿戴得富堂皇”。我一生早就注定了宁愿选择做乞丐，也不要富丽堂皇。”

他对姑娘真诚地倾诉他的心声：

“我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辉煌的“前程”，没有体面的职业，没有洋房、财产，甚至没有最起码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如果有一点脱离实际的学识吧，但过去我只关心自然科学方面，关心人类在取得对控制热核能的成功方面的进展，关心电子技术在工业控制方面的成就，关心无线电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新应用……后来，生活迫使我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使我对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产生起浓厚的兴趣，头脑里不断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命运，关心西欧共同体和东欧经互会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关心中国在世界贸易事业中的经济地位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所有这些既不会给我带来名誉、地位，也不会给我带来财产、利益、也不会给所爱的女子带来任何利益，相反要冒许多风险。”

是的，这些考虑曾使他在幸福的追求中畏缩不前。只是想到人活着，应有足够的追求幸福的勇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你对

人的价值标准能抱有与一位法国文学家蒙台涅同样看法的基础上”。接着，王申酉引了这位文学家在《论我们之间的不平等》中的一段话：

“但是，关于人的估计，真是奇怪，除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以本身为标准的。我们赞美一匹马，因为它的力量和迅速，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一只鹰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领。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地根据他本身的价值而评价一个人呢？为什么估价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周身都包藏起来呢？”

王申酉从心底希望他心爱的姑娘能透过蒙在他身上的污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他不无自豪地说：

“我为了自己的信念和志趣作出了莫大的牺牲，在所不惜，以至被现实宣布为“敌人”。但人总得付出一种代价。只是在我们想到这种牺牲会带来崇高的成果时，我们就心甘情愿地付出这类代价。”

笔锋一转，王申酉谈到他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十年前我一心想逃脱这个世界，什么四大皆空做和尚之类念头都是侵袭过我。

“但我奇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进取性格使我在五年前抛弃了这种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大丰那一年多艰苦的生活真正挽救了我的灵魂。

你是无法理解我接受一种新世界观时的狂热兴奋心情的!!!

“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了我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制造出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从此以后，我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现象换了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深信它会把人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我第一次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有规律性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的唯一准确原理。”

“像你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的固有人性造成的，而是历史发展某种阶段的产物，它是社会的物质状况决定的。我们不应只着眼于人与人这种交往方式的残酷性，而应进一步深入到产生这种情况的物质生产方式、整个经济基础的现状中去寻求根源。随着整个物质生产方式、整个经济基础的变更，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会改变的。”

“你不过是你周围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世界观不是你固有的，而是你所在环境的产物。”

“你总带着警惕性的怀疑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尽管你自称‘交际很广’，但你在精神世界上是孤独的，真正孤独的。你向任何人紧闭你的心扉，你比我更孤独！”

姑娘看到这里，微笑了。这个人好厉害的眼力，他的确看透了姑娘的心。她在中学毕业时也曾有过人生的理想，追求高尚的事物，但踏入社会以后，生活无目的地度过，思想平庸了，脑子生锈了。王申酉这个人，像闪电击中她的心。

“真正的爱就是使对方崇高起来”，这是王申酉十分喜爱的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中的一句名言。姑娘也看过这本书，这使王申酉十分高兴。怀着这样的愿望，王申酉在7月16日的信中，又问自己心爱的姑娘进一步倾诉自己的心声：

“我是属于历史的人……只有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人的生存才会有它应有的价值。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是属于历史的人。我们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注意我们在现存环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显然，我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我生存在其中短暂历史性质的属于地球偏僻一角的地方相适应。

“我深切地感到我所经受的一切个人牺牲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被有思想的人们理解的。我对自己的过去没有什么可疚悔的，甚至对已经受过的厄运也并不感到难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感激这种冲击。这种冲击真正挽救了我，使人按另一种思想方式思考。不是使自己陷于污泥中生活，而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把自己造就得更完美起来。

“请你绝不要陷入那种庸俗的见识中，以为喜欢谈一点历史、哲学书籍，关心一点人类前途命运的人就一定想卷入到政治漩涡里。我不知要反复几百次才能使你相信，我与那类想在政

治舞台上像小丑那样表演的丑角是完全隔绝的。你应该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确有许多人是用剑来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同样有许多人是用笔来推动的。每个人只有在符合时代需要，同时又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及个人的能力特长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我期望与你一起做真正的世纪同龄人，能摸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不要以为一个人生活在 20 世纪就一定会有 20 世纪的思想。

“我深信自己的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被社会自称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你必须彻底抛弃旧的传统观念，才有可能与现存社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人的标准，也才会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愿意在真理面前抛弃谬误的人，你总有一天会完全接受我的世界观的。你将会相信，我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坚定信仰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想以我的行动触犯现行制度，但信念是无法动摇和改变的。你要从几十年的漫长前途来看，这样你才不会把真正幸福看为是牺牲。”

姑娘一生中从没有见过思想和经历这么丰富的人，他的谈吐引人入胜，学识那么渊博，看了马克思这么多著作，能分析社会各种问题。但是，姑娘还是替他的前途担心。她对王申酉说：

“你这人很有才华，17 岁就考上大学又看了那么多书。你还是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搞业务吧。”

王申酉淡然一笑：

“现在能搞啥业务？我看的尽是社会科学的书。”

王申酉知道姑娘心中有矛盾、犹豫和动摇，他写信给姑娘进一步解释：

“像我这一类把生命的过程看作为热忱地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的人遭受这样的结果是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社会专门压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可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我在较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从原先的感性上升为理性认识，才理解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正在顽固地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的悲剧完全是社会的悲剧，绝非是个人的悲剧。”

“这个社会的秘密就是竭力摧残人的人格，要人们降低到狗的水平相互乱咬。我所以尝遍了人世间的酸辛，就在于我为了保持人格，不愿做猪狗的勾当去咬人。”

“对我的人生价值的评价，让历史去判断吧。我坦然自若地承认，我在现存官方世界的眼中，确是‘社会渣滓’。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想过会在现状中得到更好的结局。我还是坚定地走这条‘渣滓’的路。我只是根据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7月31日，他又写信给姑娘说：

“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肯定要到来的。”

“我已经说过：国家没有前途，我们就没有前途。我深信我们代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意志永远是坚定的，精力永远是旺盛的。”

当然，王申酉的情书不可能都是这样的政治言论，他也向姑娘倾诉过他的无限爱慕之情：

“吸引我的，你的容貌和丰姿、仪态和风度，特别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你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信念上，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上要比一些人高尚得多。”

他引用了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的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以为他在姑娘身上第一次找到理想形象的现实化身。而且，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像她那样为他过去的命运表示过那么深切的同情、担心，更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对他未来的人生斗争的命运表示那么深切的忧虑和关心。

他又引用了明代诗人朱彝尊的词《忆少年》：

“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这首词描写一个青年偶然透过垂帘看到一位理想形象后又无法相见的心情。王申酉每次和姑娘见面，总渗透着人间现实给他们双方心灵设置的垂帘而引起的对未来的惆怅和担忧。他似乎预感到他们恋爱结局的不幸。

但他还是倾注着全身的爱，浇灌着理想的爱情之花。岂料一只罪恶之手正伸向这朵含苞欲放的蓓蕾。

学校保卫组的人先是假惺惺地劝说王申酉：找个女朋友结婚成家吧。8月，王申酉诚实地向学校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恋爱情况，要求早点分配工作。保卫组的人竟赶到姑娘做工的工厂，当着姑娘和厂里同志的面，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动，道德败坏，五毒俱全，你不要受他欺骗。”

这对姑娘无异是晴天霹雳。在那种年月，一位纯洁的姑娘听见这些吓人的字眼，怎能不失去勇气 and 希望？

王申酉发现姑娘不像过去那样热情了。在他的追问下，姑娘隐约地透露了师大保卫组那个人的谈话。这对王申酉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悲愤地想：这些人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坑害我，作弄我，出卖我？

但是，王申酉心胸坦然。他想，既然问题复杂化了，闹到姑娘单位去了，那不论将来与她的关系前途如何，都应向她彻底地谈谈自己的世界观，让她对自己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他认为既然与姑娘一起翻过共同的生活之页，如果给姑娘的心中留下疑问，未免遗憾。

9月5日，王申酉下班后在乍浦路桥边等着姑娘，两人相约在9月11日再见。到那天，王申酉将把一封详尽地谈自己世界观的长信交给姑娘，让姑娘依据它，作出正确的抉择。

9月7日到9日，他连续三个晚上给姑娘写信。

9月10日凌晨，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刚响了四下，王申酉匆匆起床，胡乱吃了点早饭，匆匆赶路。他一定要赶在9月11日之前，把信交给他心爱的姑娘。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再也回不到这幢旧石库门的小阁楼，再也见不到卧床不起的父亲和病魔缠身的母亲。

他那里知道，他已暗中被严密监视。

6点20分，他走进师大防空办公室的休息室，坐在南面朝窗的桌子旁，打开黑色封面的练习簿，接着昨天的思路，奋笔疾书。

他正写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身为共产党人，是以搞共产主义为终生目标的。但是不论他们有意无意，他们清醒地知道，在现时的中国经济状态下是无法立即……”

“王申酉，你在写什么？”

一声喝问，把王申酉全神贯注的思路打断了。他掉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经常监视他的工人在怒视着他。

他慌忙把练习簿合上，嘴里回答：“写东西”。

“写什么东西，给我看看！”那人声色俱厉。

王申酉答：“写信”。

“写信？信也要看！”这个工人边说边走过来，伸手就抢王申酉的信。

王申酉紧紧把信拿在手中，气愤地说：

“我写给女朋友的信，怎么能给你看？”

可悲呵，197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使横遭“四人帮”篡改，字面上明明还保留着公民有“通讯的自由”。可是，“全面专政”的理论和现实，又使他们公开践踏宪法，什么也不顾了。

那个被派来监视王申酉的工人蛮横地要来抢夺王申酉写给女朋友的私人信件。王申酉急忙把信撕碎，边撕边朝自来水池里丢，用自来水冲……

那个人见抢不到信，哇哇直叫：“抓反革命！”

一名学校保卫组的干部冲进室内，只见王申酉身上的旧衬衫已被撕破。他神色凛然，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就这样，王申酉仅仅为了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没有写完、更没有寄出的情书，又一次被“专政”并且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

9月10日下午4时，扣押着王申酉的一辆吉普车呼啸朝普陀区公安分局疾驰而去。

王申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段壮烈的生活！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供词》

警车飞快地越过人头攒动的上海闹市区，直驱普陀区拘留所。经过笔直的走廊，穿过几道铁栅栏，王申酉被投进17号囚室。

当晚，审讯在预审室开始，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罪”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状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度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集中在1976年？”

答：“我自己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国家有了指望，我的思想和他完全合拍。1976年批判邓小平，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所以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里都讲了。”

……

王申酉面对着审讯人员，问一句，答一句。一谈到马列主义理论，谈到社会情况，他神采飞扬，滔滔不绝。频繁的引证，深思熟虑的见解，众多的理论术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名称，审讯人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些书名、人名，他们实在不知道，只好“不耻下问”，让王申酉写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审讯的进行。他们所要求的是让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在王申酉看来，这当然谈不上什么攻击。他是在讲马克思主义，讲真理，讲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真理必

须旗帜鲜明，何须隐瞒？客观事实有目共睹，只须有勇气说出来。经过一个多月 20 次的审讯，办案人员认为，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1976 年 11 月 18 日，一个初冬的早晨。王申酉又一次走进预审室。根据办案人员的要求，他要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作为一份全面的“亲笔供词”。他来到靠窗的一张简陋的长条桌旁，面西而坐。窗外，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自由天地。他看到，两株榆树在寒风中肃立，旁边还有两丛没有开花的月季。一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混杂在一起，实在难以忍耐。现在，他能坐下来，静静地开始思考。他的脑子在急速地转动，两眼却贪婪地注视着窗外那两株榆树和月季，他仿佛看到花树丛中孕育着勃勃生机，心境逐渐宁静起来。十年的惨痛经历和亲身感受的那些不寻常的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浩瀚宝库中八年驰骋所得来的启迪和收获，这一切，又都与他对祖国、对中国人民深深的爱，与对姑娘纯洁爱情的热烈追求紧紧地相结合，与自己的一腔热血相融汇而奔腾不息。现在，他的眼光又转向多年来注视着广阔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这些年来反复思考着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命运，回到十年动乱横加在国家、民族和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十亿人民身上的那些深重的灾难……

他的耳畔回荡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精辟讲话，他的脑海又一次被《资本论》明亮的阳光所照耀。他飞速地翻阅着历史的画卷，从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想到清末的百日维新，从太平天国的

农民革命想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回顾了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怎样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后发生解体的过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

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典籍可供翻阅，一切全靠惊人的记忆力，全靠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靠多年生活的积累和思想的积累，靠深入的观察和明晰的分析。随着汹涌的思潮，他的笔下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六天中王申酉写了六万多字的“亲笔供词”。

王申酉使用的纸，是办案人员供给的统一公文用纸，上头印着“亲笔供词”四个字。在“犯人”两字的后边，他痛苦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在公文纸的第一页上这样写道：

“我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提纲〉①开场白；②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③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④对苏联历史的看法；⑤对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⑥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⑦对双方关系的看法；⑧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第⑦点和第⑧点没有来得及写。以下是原信的回忆。”

王申酉的信的确是在恋爱关系濒临破裂时向他深深爱恋着的姑娘坦率地陈述他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一封情书，如今却要当作“亲笔供词”重写出来。这种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罕

见的。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尤其令人难于想象。王申酉熟读中外历史和哲学的著作。他虽然万万没有想到这份“亲笔供词”即将成为定他罪的主要依据和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但他也许抱着文王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而作《春秋》、司马迁囚蚕室而写《史记》的悲愤心情，来重写出他的一封没有写完、也永远送不出去的“情书”。这不仅仅是对他心爱的姑娘的“情书”，也是他对他热烈挚爱着的祖国的一封“情书”啊！然而又不仅仅是“情书”，它确实确实是一份“亲笔供词”，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供状”！

他所要叙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他的世界观。犹如向他亲爱的女友倾诉自己的心声一般，他精粹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概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我不能不带着极其狂热的感叹心情回顾《资本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这部著作的划时代功绩，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述的，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探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他自豪地宣称：“我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接着，他主要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个论题结合社会实践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它建立的必要历史条件和前提是什么。

在六万多字“亲笔供词”的后半部分，王申酉谈到建国以来的中国社会。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他说：“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对以后经历了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高速度和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国民经济的破坏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惆怅的情感。”他批判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批判了1959年的“反右倾”。他十分钦佩彭德怀同志，他这样写道：

“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中央政治局，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

王申酉肯定了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方针的正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严厉抨击了“文革”时的种种怪现象。他谈到工业状况：“形势非常令人担忧，钢产量十年徘徊，

而日本在这段时间的增长了三四倍。农业情况更糟，1970年粮食产量是24,000万吨，据说只达到1957年的水平。他认为“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变革。外贸方面，197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占全世界进出贸易总额的0.5%!每个中国人只用五美元与外国做交易。中国远未进入世界市场，中华民族从经济上远未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王申酉写道：

“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30年前描绘的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与中国现时的在世界上显露出来的经济面貌多么格格不入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现时状态，如被上帝那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往情况是多么可怜，精神交往的情况就更可怜了。中国人民何时能脱离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状态，而能与全世界人民自由地‘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啊?!难道中华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民族特性，永远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民族必然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趋向相对立吗?难道我国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推进和推动这种历史趋向吗?是谁把我们用无形的万里长城与世隔绝开的?!”

王申酉以犀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批林批孔运动”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评《水浒》是捏造小说情节来打倒周总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明

确地要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搞的一批“新生事物”的极左本质，他描绘了按照“四人帮”那一套口号搞下去，中国将出现何等可怕的情景！他写道：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确。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帅被解除军委领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无生机与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像面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他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写道：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1958年以来，除了1962—1966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桥们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原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20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看来历史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

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全部是复述他给女友的信，是他经过十年探索，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变革迫在眉睫的结论，早在毛主席病重、“四人帮”乘机猖狂作乱的7月时，他就写信告诉了女友。现在，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预见，变革将在各个领域内广泛而又深入地展开。王申酉，一个身陷囚室而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把他对社会的看法和结论在“亲笔供词”上写下来，还会有什么犹豫？难道他不应感到十分自豪？！这不正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威力？！

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悲剧

夜深了，充塞着形形色色刑事犯罪分子的囚室沉静下来了。走廊里的25支灯泡的昏黄灯光，透过铁栅照射进来，一直照到王申酉的枕边。

刚刚过去的六天六夜，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现实社会的紧张脑力劳动之中，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在十年浩劫中，他遭受的只是极其残酷的连续不断的迫害和空前严酷的思想统治，从来没有机会全面地系统地论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分析现实社会。在现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出于特

殊的需要，他写完了这封特殊的书信。他明白，这仍然是一封不能送出的“情书”。但他那颗诚实的心，却不能料到，这洋洋六万言，办案人员以及最后判刑的法官都没有认真地读读它。不管怎样，此时此刻，王申酉如释重负，只感到是一次巨大的精神解放。他毫无羞愧地对自己说：

“我的思想面貌已完全坦露给政府了，可以说五脏六腑都坦露了。我决没有，也不想政治上搞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世界观决定了这一点。”

他期待，有关方面可以决定对他的正确处理。

但是，王申酉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据以镇压人民的“公安六条”此时依然是“最高法典”，由“公安六条”启动的专政机器仍在飞速运转。王申酉尚未书写六万言以前，预审已告一段落。11月23日，他的“亲笔供词”还未写完，结论和逮捕报告已经在同一天写好，一共归纳了“九大罪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吹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三面红旗’、‘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邓斗争’”等等。当天，逮捕报告送往上海师大。第二天，师大原党委常委开会，在“防扩散”借口下，没有看任何材料，就同意逮捕法办，并建议判处死刑！

而这时候王申酉的心，已经从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历史性巨变中，汲取了新的血液，新的力量。在那金色的十月，他从囚室走廊的广播中欣喜地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讯。

这一个多月，他浑身充满了对伟大祖国、对自己光明前途的憧憬。他的思想冲破铁窗，远远飞去。他似乎看到，在欢乐的田野上，农民正在喜庆丰收；在巨大的厂房里，机器正在飞速运转；在他热爱的大学图书馆里，学生们正在翻阅最新的科技书籍；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探求自然的奥秘……哦，他多么渴望飞出去，回到自由的人间，去劳动，去读书，去进行他心爱的研究工作。他不能再接受任何不祥的念头。

他铺开纸，提起笔，就着走廊中投射进的昏黄的灯光，飞快地写了一份给拘留所的报告：

“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我深切在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看到报上报道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

“因此，我也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党和政府再给我一次挽救机会，不判刑，戴个帽子，管制几年考察我。我一定会一个人发挥二个人的力量好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全部力量。”

他又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

“父母亲：请你们用我十月份到期的存款买以下书籍（剩下的钱供家用），可去福州路、河南路图书发行公司购买，务必买

了送来，一定要买来(另带一套《毛泽东选集》来)。《资本论》第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列宁选集》第1—4卷，《马克思传》，《论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回忆录》，《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再买一支钢笔带来。”

任何一个有点正义感和法制观念的人，对于这样的请求应该同意的吧，对于“在押犯人”阅读马列著作总不应该拒绝吧。然而，严酷的事实却是，没有人理睬王申酉的正当要求，连家书也被扣压。王申酉哪里知道，中风的父亲病势沉重，母亲忧愁得已精神错乱，他在内蒙工作的弟弟已被拘留，朋友小黄回上海刚刚结婚，即被株连而拘留在同一所牢房里。他心爱的姑娘也被传讯，被迫交出他写给她的全部书信。王申酉所开的那长长一串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本也没有送到他手中，他本期望在牢中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啊。他白白地在兴奋和希望中期待着，期待着……他哪里会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现代迷信还紧紧禁锢着某些人的头脑，“两个凡是”正在流行。十分凶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1977年初，从北京传来一系列的文件和电话通知，用的仍然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对极少数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1977年3月，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说：

“今年一、二月，我们准确的集中打击了两次，这样做效果很好。今后我们还要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对于资本主义这些势力的泛滥，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要坚决镇压。”

会上决定“五一”节前要召开公判大会。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的人员到各区、县选择公判的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了！

时间是这样的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如被审判人对区法院判决不服，可上诉到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复核审理上诉案件。

可是，上海市高级法院和上海市普陀区法院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的审判员竟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而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分局到3月9日才正式向区法院起诉。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午，上海市高级法院、普陀区法院的审判员连续提审王申酉五次，还是围绕“攻击罪”审问。

问：攻击言论谈得具体点。

答：攻击各方面形势不好，文化大革命使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不快，经济停止不前、迟缓。

问：每个问题怎样攻击？

答：为彭德怀万言书辩护，对文化大革命有悲观情绪，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搞周总理的。

问：为什么攻击集中在 1976 年？

答：1976 年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思想和邓完全合拍，所以在给弟弟和女朋友信中说自己感到邓有魄力，国家有希望。后来批判邓小平感到自己也失望了，情绪抵触，这样就攻击了上述几方面。

问：你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马列著作中来的。

问：你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

答：是为了能够对社会现象得出比较清楚明确的看法。

问：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后来不让我看，所以才看社会科学，感到讲的确实有道理。

问：你是怎样来推动历史的？

答：我是用笔来推动社会前进的。

问：你讲过去有人用刀剑来推动历史的？

答：我是从恩格斯讲的话套用过来的。

问：你讲过军人就是穿军装的农民？

答：是有过，是毛主席著作中的。

请看，这是些多么愚蠢的问题啊。其实，审讯不过是做做样子。

3月10日，上海师大党委正式写了建议判处王申酉死刑的报告。

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普陀区委书记董镇同志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批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意见一并报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3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1977年4月5日上午，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党员干部大会上说：

“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1977年5号文件精神和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典型案例，发动群众讨论，召开公判大会。对诋毁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开完会回来，晚上睡不着觉。他想到自己曾被某领导同志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对政治案件判刑从严。那末，王申酉这个案子判“死缓”恐怕太轻了。上报市委审批时如果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

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他想来想去，王申酉这案件要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十五贯》中的况钟，在大理院已批准两个青年死刑，他只须依法执刑时，感到情况有异，不顾丢掉乌纱帽的危险，深入调查，终于抓住真正的凶手娄阿鼠，挽救了两个无辜的青年的生命。而我们共产党的法院负责人，为了揣摩、迎合政治气候和上级某些领导意图，为了自己不致被戴上所谓“右”的帽子（并不危及他的官位），居然不惜推翻下级党组织和法院党组的决议，不顾事实的法律，送掉一位优秀青年的宝贵生命！这是多么可悲又可恨的事啊！非常明显，王申酉如果被判“死缓二年”，到了1979年，他是一定会无罪释放的！

却说4月6日上午，这位高级法院负责人，召集党组成员开会，他传达了昨天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精神，他说：

“根据市委的精神，昨晚我睡不着觉，感到如不杀王申酉，恐怕对不起老人家（指毛主席）。我建议改变上次党组讨论时对王申酉判处死缓的决定，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

按照惯例，第一把手的意见常常是拍板性的意见，何况提出的理由又是那么“神圣”！王申酉的命运被草率地决定了！

原来上报市委的王申酉案的请示报告已经打印好了，刑一庭的同志将第一页标题“判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第三页罪状中的“罪行严重”改为“罪大恶极”，重新打印。按规定手

续，应当由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在案件审批表上签署党组决定。但匆匆忙忙，这位副院长竟漏签了！

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原来写给女友的万言书和以后在公安局预审科写的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判刑的根据就是区法院上报的“九条罪状”！

法院党组的一位成员后来承认：“我是直接负责这一工作的，我没有审查案件的全部材料，只是按照认定的罪行抽查了认定罪行的所谓根据，便以感情代替政策，对所列的罪行全信无疑，并据以判刑了。”好一个“以感情代替政策”，人命关天，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心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呢？

最后决定性的一幕拉开了。1977年4月7日，在丁香礼堂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的公判案件。

高级法院汇报案情，会上分发每人一袋材料。会上有原市委领导同志的插话，现在根据纪录摘录一些他们的谈话。发言者用甲、乙、丙表示。

甲：从政治来看，要研究。有的问题情节很严重，不杀？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乙：还有政策问题，要研究。有的处理轻一点，发现后仍能交代和不交代的要有区别。

甲：政策很重要，该杀的要杀！

丙：要解决劲头不足的问题……这批案件要比一上批案件震动更大一点。不严不能大治。不镇反不能走向大治……

他们的谈话精神，最终决定了王申酉的命运。

一天会议，他们讨论和决定了高级法院汇报的 58 个重要案件和 68 个罪犯的判刑（包括死刑）。除了汇报时间，平均三、四分钟讨论一个案子！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怕也难找出相似的例子！王申酉的案子，排列在第 12 名。高级法院刑一庭的同志汇报时，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判处王申酉死缓”和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的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那位高级法院党组书记松了口气。他庆幸自己幸而把“死缓”改为“死刑”。因为在市委讨论的 58 个案件中，有 16 名罪犯的量刑加重了，其中 9 名由死缓或无期徒刑上升到“死刑立即执行”。

会后，高级法院将这 58 个公判案例交各单位群众讨论，这是所谓“群众专政”的形式，还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4 月 23 日上午，上海市高级法院同志到衡山宾馆去向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书记汇报群众讨论公判案件的情况。这位市委书记又说：

“要狠狠杀，要严，才能刹住这个风。只要政策对头，情况明，就决心大。”

下午，市委常委又开会讨论群众公判案件情况，又把五个案件的量刑升高了，有两个“死缓”改为“死刑”。

同一天，原上海市委书记签发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对王申酉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批复”。

4月27日下午，在普陀区体育场三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区法院宣读了“判决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30分钟后，立即执行。而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28日才送到区法院。

人们可以为了所谓政治需要而践踏法制到如此惊人的地步！

现在，人们已经无法知道，王申酉从听到死刑判决到停止呼吸这30分钟内，他究竟想了些什么？他是否想起了他少年时代就热爱的舍身成仁的民族英雄岳飞和文天祥，想起近代史上英勇就义的秋瑾和邹容，想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李大钊和蔡和森？他是否想到他年老的工人父母和受到他株连的兄弟，是否想起他心爱的姑娘？他是否想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想起饱灾难但必然有着光辉前途的伟大祖国？……这一切，他已经不能再告诉我们了。但是，他早在日记里从历史的角度作过这样的预言：

“无论世界采取什么最卑鄙无耻的压制，用虚伪的事物堵塞真实事物也好，绝对也阻挡不住人的认识，真理总是会被认识的!!!”

“也许人类历史上的某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甚至是几百年有过短暂的停留，甚至倒退，但都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历史旅程上的极微小的挫折，时间上不过一瞬罢了。代替这种现象的必然是前进，必然是前进。事实证明，世界历史必将这样发展，而且正

在这样发展。我欢呼这样发展，我疯狂地高举双手同意：世界这样发展、发展、发展——

“即使我下一秒钟即将长眠，永恒地长眠!!!”

他还说过：

“人是应该为信仰而活的，我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王申酉的话不幸而言中！他为追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献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献身，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献身，也为坚持反对现代迷信终于献出自己年轻的宝贵的生命！

假如他今天还活着……

198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同志公开平反。受株连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平反。他的中风瘫痪的父亲已送医院治疗，他可怜的母亲至今还不知道他已死去。他的女友在他牺牲后的一天曾悄悄看过他的父母，又悄然离去。

她的母亲跪在她面前，求她忘掉这个不幸的朋友。她被迫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子，生活十分痛苦。她箱子里至今还珍藏王申酉的照片。王申酉的朋友小黄已考入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当研究生，如今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人们终于对王申酉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广泛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书籍，树立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解放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实践，进行科学的探索，作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本正确的结论。他对“左”的一套给以理论上的分析，他所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运用上层建筑的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的大生产，扩大社会分工，扩大与世界的经济交往，为社会主义创造坚固的物质基础。他所设想的工业、农业的改革，是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精神的。他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探索刚刚开始。他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十次抄家、十年重体力劳动、被剥夺看书权利)坚持探索，坚持信念，收集尽可能得到的资料，通过艰苦的思维劳动而进行的理论工作。“四人帮”曾经虚伪地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桂冠抬得很高很高，似乎全中国只有一两个“马克思主义者”。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是仅凭读几本马列著作，引用一些马列词句就可获得这一称号。信仰马克思主义，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便可以而且应当算作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王申酉正是这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他的著作(这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他的理论见解只能散见在他的谈话、书信和日记中，集中表现在他六万多字的“供词”中。

当我们仔细翻阅他的“供词”，我们不能不惊叹他思考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确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思考和正在实践着的。但他至少比我们早想到五六年，而且是在黑暗中独自探索而获得的科学性预见。

他一辈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真正的无产者，对劳动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怀有最深厚、强烈的爱。他反对个人迷信，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他早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7月，他就惊人地预见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使中国社会倒退至少十年！”他最强烈地反对和蔑视“四人帮”，早已从历史的角度预料到他们的覆灭。

假如他能活到今天，他也许将和他的朋友小黄一样重新返回他心爱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中国的科学技术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也许沿着他自己已开辟的道路，作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正如他在1976年8月1日给他的女友的信中所写的：

“我与自己的知心朋友们都确定了这个办法。即使我们的世界观在将来能与变革后的社会调和起来，也决不做空头政治家，而是要以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身份加入社会生活，这样自己的政治命运才更牢靠。我们都坚信我们所受的一切政治迫害一定会平反。中国目前的不正常状况终究会改变！”

可惜他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我们何等痛惜国家失去这样宝贵的人才！

他早已说过，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那十分沉重的历史遗产——野蛮落后的封建残余势力可悲地夺了他年轻有为的生命。幸喜这个可诅咒的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我们也将如王申酉那样高举双手，欢呼历史必将这样发展、发展、发展!!!

附录三：

反思和启迪

金凤

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朱正同志编好了王申酉的狱中《供词》、日记、书信摘编以及编写的《血写的嘱托》，来信说，看了这些血泪文字和王申酉惨遭枪杀的照片，他“感同身受”，他允诺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出版。我大大松了口气，以为可以不辜负王申酉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嘱托，可以告慰于王申酉了。

不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横扫中华大地。总书记胡跃邦首先落马，出版部门也遭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遭查封，朱正同志被撤职。他不胜遗憾地通知我，王申酉这本书不能出生了！我有什么办法？只能让心灵忍受对不住王申酉的熬煎！

书稿退回，躺在书柜，一躺又是十年，我的痛苦的心渐渐麻木。这期间，深圳一家出版社来信说感兴趣，来人带走书稿和照片。半年之久，毫无消息。我连忙托人将书稿追回。只是，丢失了王申酉宝贵的照片。我气得要命，却也无可奈何。打官司吗？我赔不起时间和精力。

1988年年底，女儿告诉我，请人邵燕祥介绍丁东先生来看我。据说丁东对一些思想先驱的文章很感兴趣。

几天后，丁东和郭小川同志的儿子郭小林一起来看我，带来他编辑出版的《寇准寻梦录》和文章中坚硬遭杀害的青年《遏乐克》文集。交谈之下，我认为丁东确有诚意，不几天便将王申酉书稿交给他。他担保尽快出版。这一次但愿好梦成真！

书稿如能在今年(1999年)出版，屈指算来，离王申酉1977年遇害，将是整整22年！

呜呼，22年，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用了22年时间，时间够长的了，不少革命者从青年熬到两鬓见白。22年，一个呱呱堕地的婴儿也会长成英俊挺拔的青年，应该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

我简直纳闷，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并写入党纲和宪法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不允许出版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分析，现实社会得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有结论的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作？这个国家不让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似乎还说过得去，而不让出版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献出生命的王申酉的文章，就真的令人百思不解了。莫非马克思主义的传搞还是只能“照本宣读”，只能按照原文规定的范围、框框，不能越雷池一步？多少年来总是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可是当有人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联系中国实际得出要求变革的结论，却仍被视为异端邪说。莫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仍只有身居礼堂之上的少数人才能拥有或在悼词中才能出现，区区小民

是绝对不允许沾边的。唯有如此想，才能解释王申酉的遗著好此难以面世。

好在如今终于能够出版了，不能不说是值得庆幸的事。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首先引起青年朋友的注意。因为，被迫当了14年大学生(世上罕见)的王申酉一前曾迫切地希望把他这一代青年的经历的生活和斗争用笔记来来，告诉后一代青年，让他们了解前一辈人的悲剧，理所当然能珍惜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应该说，现在的青年特别是几百名大学生的生活，和王申酉相比，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真有天上地下的差别(当然，大学中还有特别贫困生)。他们是否能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勤奋好学，自学地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如申酉那样刻苦攻读呢?他们是否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自愿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致力国家富强、改善人民生活的远大目标?王申酉的大学生活对当代青年应该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王申酉品格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在当时政治高压气候下坚持独立思考，将自己真实思想记在日记上。而当他的日记被同班同学班长偷看并汇报组织后，政治辅导员竟要求他交出日记作为他加入青年团的条件。要知道，入团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一件事，王申酉也迫切希望入团。但是，他坚持了他的独立人格，不作交换，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后果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他从此被目为落后甚至“反动”学生，“文革”中日记被抄，他正式

被戴上“反动学生”帽子，坐牢一年多，毕业不分配工作。但他并不后悔。今天来看，他的人格是何等难以能可贵，同时也显出当时那种政治思想和青年工作的可悲可鄙！他们竟让学生干部偷看偷抄同学日记，并据以定罪，他们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一竟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听话的驯服工具！这真值得当今仍在从中青年工作的同志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要当青年的朋友，不能当青年的“敌人”。不要再去培植听话的庸才和奴才，而须克意经营如何多出如王申酉般独立不羁的人才！最近逝世的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时，数学几乎得零分而中文英文特好，清华校方被格录取。他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但狂傲不羁，当时他攻读的清华汉文系有文秘多名教授。但当汉文系研究所希望他才研究生的，他竟然说清华没有一个教师能当他的导师！创建去英国、法国学习回国只有二十七岁，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仍聘请他当西南联大汉文系教授。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出人才！试想青年钱钟书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一是他很可能考不上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他那要“目空一切”恐怕是当作“落后学生”处理了。何能长成参天大树？

文章扯得离题了。却说王申酉被迫放弃自然科学的学习转而钻研马列原著，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完全抛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这种教条式的学习，而是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用以观察、思考、分析现实的

中国社会。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 1976 年 9 月被捕后写的六万多字的《供词》。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只要认真读过马列原著，再来看一看王申酉的《供词》，都会感叹身如逆境带着“反动学生”帽子的王申酉，竟如此熟悉马克思主义，精通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苏联、中国的革命以及对现实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如此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的研究集中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通过何种目的和手段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他手头并无马列书籍，也无任何现实资料，一切全凭他惊人的记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数家珍，引用原著几乎一字不着，他竟然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建党立国的四室，几天内写出洋洋洒洒六万多字的马克思主义供状。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深深引起我们这些在王申酉年长得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扳思和深思。

我们也曾刻苦攻读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衷心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心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很明白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我们服膺《新民主主义论》，为安哥拉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1949 年又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欢欣鼓舞。1954 年党中央向全国宣布过度时期总路线，并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宣传过度时期总路线，即在 15 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纳领至少在工业化这一点是完全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懂得钉从手工业生产的农业国转变为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国家至少需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可是，过渡时期不到两年即 1956 年，便完全用行政手段完成三大改造，立即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顾生产力的条件。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使绝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心惊胆战，噤若寒蝉，不敢自以淡是，总是自以为非。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许多干部内心不能苟同，口头上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三年经济困难作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概括了客观事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呼声。正式文体却又删去这句至关重要的话。随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十分不理解，跟不上形势，却要努力跟上形势。眼看从党中央副主席到基层党组织直至生产队干部统统被打倒，眼看邓拓、老舍、吴晗、田汉等大批文化名人被残酷斗争直至含冤去世，我们心如刀割，却又不敢吭声。如此小心翼翼，大家还被关入“牛棚”或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还坐牢十年。

纵观我们的心态，是如何愧对王申酉啊！王申酉敢于冲破“左”的束缚和个人迷信的桎梏，敢于独立思考，在“文革”开始不到一个月便敏锐提出，这是一场大灾难，必将使中国倒退至

少十年。在 1976 年 7 月他又敏锐提出：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不到两个月，“四人帮”果然垮台了！我们却早已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只因多“驯服工具”当得太久了，不敢独立思考，几乎也不能独立思考。为什么呢？只怕“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无情地专政“到自己头上啊！和王申酉相比，我们缺乏的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我们懦弱而且生怕祸及全家。”

王申酉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在“供词”中《引用资本论》的序言，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依次发生的经济形态都是属于历史性的范畴，不能跳过或超越某种经济形态发展阶段，但能缩短它，减少它的阵痛。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它自然不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愿望，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充分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之胶彻底抛弃它，可以在它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之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要作的地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王申酉还引用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作的导言指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其作用以前不会发生关系。王申酉还根据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考察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认为苏联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失去历

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经济生活起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德国更不成熟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其历史作用，它一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王申酉认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有益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因此，王申酉十分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重视扩大分工，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商品生产大大发展。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也非常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他引用一些资料，说明 1972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 43 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0.5%！而美国是 12%，日本是 6%。他慨叹中国的经济还晃典范的自给自足经济，还未进入世界市场，中国民族从经济上说还未显然地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

这些都是王申酉思想的闪光点。试想，他当时背着“反动学生”的沉重包袱，大学毕业十年不分配，留在学校监督劳动，一般人就会从精神上被压倒。他被十次抄家，甚至剥夺到图书馆借书的权利。每天从事极繁重的体力劳动，每月的菲薄收入。在这样艰苦至极的条件下，他尽管收集资料，勤奋阅读，刻苦探索，思考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他的思考所达到的高

度和不少科学性预见，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中国多么需要王申酉这样的理论工作者啊！

可悲的是他竟然在粉碎“四人帮”后被捕，由于“两个凡是”的作祟，牺牲于“文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碾压之下，微观他的判刑过程，完完全全是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制，草菅人命！一千多年以前的盛唐时代，贞观之治，一年处决犯刑不过一百多名，唐太宗李世民要调阅犯囚卷，务求按律处决，不让冤案发生。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居然6分钟内便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件。王申酉不过是在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表述他的政治观点，信未写完，也未发出，居然以此定罪。而且原定死缓，匆匆忙忙又改为立即执行，只因法院院长怕犯“右”的错误，这种无视法理专凭政治气候政治需要的审判，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和优秀的人才，用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

改革开放后才提出依法治国，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也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社会条件，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应认真实行。如此才能保证不再出现王申酉、遇乐克的悲剧。